

賴長楊 著

古代史學家傳 上

中外名文傳記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史学家传

(上)

赖长杨 主编

目 录

前言	赖长扬 (1)
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二	赖长扬译 (1)
班 固传	
——《后汉书》卷四〇	赖长扬译 (36)
荀 悦传	
——《后汉书》卷六二	赖长扬译 (79)
班 彪传	
——《后汉书》卷七〇	任宝菊译 (89)
杜 预传	
——《晋书》卷三四	刘精诚译 (99)
陈 寿传	
——《晋书》卷八二	任宝菊译 (117)
司马彪传	
——《晋书》卷八二	任宝菊译 (121)
裴松子传	
——《宋书》卷六四	赖长扬译 (124)

范 晔传

——《宋书》卷六九 赖长扬译 (132)

沈 约传

——《梁书》卷一三 任宝菊译 (162)

萧子显传

——《梁书》卷三五 任宝菊译 (176)

魏 收传

——《北齐书》卷三七 赖长扬译 (181)

李延寿传

——《北史》卷一〇〇 赖长扬译 (208)

房玄龄传

——《旧唐书》卷六六 黄正建译 (215)

李百药传

——《旧唐书》卷七二 任宝菊译 (234)

颜师古传

——《旧唐书》卷七三 任宝菊译 (252)

令狐德棻传

——《旧唐书》卷七三 任宝菊译 (258)

姚思廉传

——《旧唐书》卷七三 任宝菊译 (266)

吴 兢传

——《旧唐书》卷一〇二 任宝菊译 (271)

韦 述传

——《旧唐书》卷一〇二 任宝菊译 (274)

刘知几传

- 《旧唐书》卷一〇二 …………… 任宝菊译 (280)
- 李吉甫传
- 《旧唐书》卷一四八 …………… 曾贻芬译 (296)
- 苏 冕传
-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 曾贻芬译 (308)
- 杜 佑传
- 《新唐书》卷一六六 …………… 曾贻芬译 (310)
- 刘 昫传
- 《旧五代史》卷八九 …………… 曾贻芬译 (324)
- 王 溥传
- 《宋史》卷二四九 …………… 曾贻芬译 (329)
- 薛居正传
- 《宋史》卷二六四 …………… 曾贻芬译 (337)
- 宋 祁传
- 《宋史》卷二八四 …………… 曾贻芬译 (343)
- 乐 史传
- 《宋史》卷三〇六 …………… 曾贻芬译 (357)
- 刘 攽传
- 《宋史》卷三一九 …………… 曾贻芬译 (361)
- 欧阳修传
- 《宋史》卷三一九 …………… 姚汉荣译 (366)
- 司马光传
- 《宋史》卷三三六 …………… 曾贻芬译 (385)
- 范祖禹传
- 《宋史》卷三三七 …………… 曾贻芬译 (416)

李 焘传

——《宋史》卷三八八 曾贻芬译 (430)

袁 枢传

——《宋史》卷三八九 曾贻芬译 (444)

郑 樵传

——《宋史》卷四三六 曾贻芬译 (451)

徐梦莘传

——《宋史》卷四三八 曾贻芬译 (455)

李心传传

——《宋史》卷四三八 曾贻芬译 (459)

刘 恕传

——《宋史》卷四四四 曾贻芬译 (464)

欧阳玄传

——《元史》卷一八二 崔 蓉译 (471)

宋 濂传

——《明史》卷一二八 曾贻芬译 (478)

陈邦瞻传

——《明史》卷二四二 曾贻芬译 (489)

王世贞传

——《明史》卷二八七 邱文龙译 (492)

王 祎传

——《明史》卷二八九 曲安京译 (498)

高世奇传

——《清史稿》卷二七一 曾贻芬译 (503)

毕 沅传

- 《清史稿》卷三三二 曾贻芬译 (511)
- 王鸣盛传
- 《清史稿》卷四八一 何双生译 (518)
- 钱大昕传
- 《清史稿》卷四八一 曾贻芬译 (522)
- 阎若璩传
- 《清史稿》卷四八一 何双生译 (528)
- 顾炎武传
- 《清史稿》卷四八一 何双生译 (532)
- 汪 中传
- 《清史稿》卷四八一 何双生译 (540)
- 王先谦传
- 《清史稿》卷四八二 曾贻芬译 (546)
- 万斯同传
- 《清史稿》卷四八四 曾贻芬译 (550)
- 赵 翼传
- 《清史稿》卷四八五 曾贻芬译 (556)
- 章学诚传
- 《清史稿》卷四八五 曾贻芬译 (561)
- 魏 源传
- 《清史稿》卷四八六 何双生译 (565)
- 顾祖禹传
- 《清史稿》卷五〇一 ... 于天池 李书译 (568)

前言

每个正常的人都有自己的记忆。信息在记忆中储存，经验在记忆中积累，希望在记忆中萌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判断现实而决定自己的行动。

人类也有自己的记忆。把个人的记忆记录下来，公之于世，它就被人类所共享。这些记录的汇聚，就成为了人类社会的记忆。

历史，究其本质说，就是人类对往事的记忆。个人的记忆储存在头脑之中。人类对往事的记忆，数千年来，主要储存在历史著作当中；史书是人类记忆往事的主要形式。

千百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亲见，因历史著作我们得以知晓。治乱兴衰、天灾人祸我们未必都能经历，因历史著作我们得以体会。社会将怎样变化，世界将趋向何方，我们不能确知，因历史著作我们可以推知其大略。历史使人积累知识、增长才干、萌发希望。

人类很早就重视对往事的记忆。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最初以口耳相传，继之以结绳、刻木的方式，保持和巩固对往事的记忆。当文字产生之后，文字记载便成了人类记忆的主要形式。大约距今 3700 多年以前的商朝，我国就出现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此后，记载历史就具

备了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始末诸要素。至少在春秋初期，在单纯记录时事的基础上，逐步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现作者立场和观点的方法。事实的记录加上写作者的论断，便具有了历史著作的基本特征。这种著作的最早代表，就是《鲁春秋》（后人称为《春秋》或《春秋经》）。这以后，由于西周王朝的衰颓，“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原先只能被官方利用的资料流传到了民间，私门学者在传授的过程中，产生了数种不同的授课记录，这就是今天还能看到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后人也将它们以历史著作看待。战国，尤其是汉代以后，迄于清代，历史著作大量产生，《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历史名著相继问世。经两千多年的积累，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拥有历史著作最丰富的国家。

与丰富的历史著作相对应，我国古代史家辈出，犹如星光满天。大体而言，在春秋以前，历史学家都在史官当中，之后，虽然史官制度仍得以延续，但就完成历史著作的总量看，非史官身份的史家要多于有史官身份的史家。而且一些史家虽有史官身份，其著作却不是以史官身份发表的。

历代史家对保持、整合、加深各类对往事的记忆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略而言之，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拓展记载的范围，强调记载的重点。从《鲁春秋》起，从总的趋势说，历史记述的内容都在不断扩大。《鲁春秋》仅把记载内容限定在诸侯间的访聘、会盟、征伐、城筑和一些自然现象方面。至司马迁的《史记》，则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生活史的完整画卷，人类生活的

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如帝王、贵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以至农工商贾，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记述。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之上，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刑法、军事制度、天文、历法、学术、典籍、地理等状况，在其十志之中都得到了较详实的记载。范曄《后汉书》增加了七个类传，专记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房玄龄《晋书》多载有用之文，如《裴颀传》载《崇有论》，《摯虞传》载《今尺长于古尺论》，《鲁褒传》载《钱神论》。郑樵《通志》有二十“略”，更把虫鱼、草木纳入了记述范围。

一些史书则强调某些侧面。如果说二十四史一类的历史著作，注重的是对社会整体情况的反映的话，那么专门史则是对社会某些方面的强调。有强调某一类人物的，如汉朝刘向的《列女传》，齐梁慧皎的《高僧传》，宋朱熹的《宋名臣言行录》，宋朝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侧重历代社会制度的沿革；有的则注重一代制度，如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徐松所辑的《宋会要辑稿》等。

记述范围的拓展，有利于信息积累的多样化；记述重点的强调，则有利于信息的提取与利用。

第二，记述方式的多种探索。

我国古代创造了三种记述历史的方式，即三种史书体裁。最初出现的是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将所发生的事情有次

第记录下来。《春秋》、《左传》、东汉荀悦的《汉纪》、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使用的编年体。第二种是司马谈、司马迁共同创造的纪传体，即用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去记述历史。它以本纪记载能左右国家大局的人物，写政治上的大事；用表格和对社会起过特别作用的人物及大事；用列传记述各种特出人物的活动，它们协同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反映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系统。自班固《汉书》以下的历代“正史”，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形式。第三种体裁是南宋袁枢第一个明确提出的纪事本末体。这种体裁以事为主干，着重于事件发生、发展及其结果的叙述。隋朝以后，已经出现了实际上采用本末体写成的史书。但一般认为这一体裁创造于南宋的袁枢。本末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二是“一书具一事之本末”。

以上三种体裁对储存信息和提取信息各有优劣。编年体可避免重复储存信息，有利于掌握一时之势，但容易遗漏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纪传体有利于包容广阔的社会内容，但“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这是它的短处。本末体能清晰地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不利于全面了解历史人物。

我国古代史家经探索而创造出的这三种史书体裁，其出发点虽不尽相同，但在条理记忆、尽力服务于信息的提取、利用却是一致的。它们各有优劣，所以也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不必厚此薄彼。

第三，我国古代史家重视记述的准确可靠，不断进行历史的整合。人需要消除错误的记忆，输入新的正确记忆，不

断重建和完善知识框架。历史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也要求他们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历史。

直书存真是一个正直史家应具备的起码品格。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齐国太史、南史都是后人称道的这方面的典型。它强调的是将事实变为文字这一环节不能失真。

至少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家就注意了对史料的鉴别。他提出了“考信于六艺”等审查史料的方法,即不把符合“六艺”的材料通通抛弃,将战国时期的伪史作了一番大淘汰的工作,确立了我国历史“自黄帝始”的系统。后来虽然三国、六朝时期譙周、皇甫谧等人拾秽纳诟入史,建立荒诞的古史系统,到底在史学中要求审查史料、写信史是主流。南朝的裴松之甚至论到碑铭不实、真假相蒙的问题,他所作的《三国志注》更“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之后,唐代的孔颖达、长孙无忌,尤其是刘知几、啖助和柳宗元,对历史资料提出了许多辨伪的意见,增添了甄别史料的方法。至宋代,辨伪求真的风气非常盛行,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郑樵、朱熹、洪迈等一大批学者,对伪书伪史进行了一番大扫荡。明代辨伪之风虽然衰歇,但也不是无追真求实之人。卓出的晚明学者胡应麟将识伪辨假的方法条理化了。他在《四部正伪》一书卷末总结了八条审核伪书的方法。清代嘉庆以后,疑古辨伪的精神高涨,做出了巨大成绩。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揭穿了《古文尚书》是伪作;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证明《左传》和《春秋》实在是不相干的一部书;崔述《考信录》把三皇五帝至夏商周及孔子、孟子的事全加考证,推翻了不少伪史。钱大昕、赵翼、王鸣

盛被今人称为三大考史家。他们所著的《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对相应的史书作了细密的疏理，成绩斐然。

考信求实是我国古代史家直书存真精神的延伸。历代辨伪与造伪并存，并出现了各种经重新整合的历史著作，但得以留存下来的。总是史家认可、人们也愿意相信的东西，给人类留下了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对往事的记载。

第四，咀嚼事实，总结经验。对一个人来说，在头脑中只能储存事实，那是智力低下的表现。只有以记忆事实为基础，从事实中抽绎出经验乃至规律，才是成熟和完善的智力。这包括一系列分析、综合、演绎的过程。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对历史进行思维的权力。历史家则是人类社会分工从事对历史进行思维活动的专门人员。我国古代史家对此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对历史进行思维，是人类对自身记忆功能提出的要求之一。它分两个层次。其一是知其所以然，即解释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其二是以前者为基础，预测具体事件的发展方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在这两个方面，古代史学家（当然包括那些确有历史素养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杰出的表现。司马迁写《史记》，就是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为宗旨。杜佑著《通典》是为了“将施有政，用义邦家”，“为来今龟镜”。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希望统治者“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们标志着我国

古代史家在历史思维方面达到相当的高度。

第五，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学理论。

从世界范围看，史学的发展有两个源。其一是希腊，其一是中国。相对希腊为源的史学说，我国史学一直到清代，都是在完全封闭而彻底独立于外国的情况下发展的。就我国国内说，史学与其它学问比较，其民族特色与传统无论内涵或外在形式甚至不亚于经学。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史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用成果本身来表达对史学的理论认识，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种倾向。纪传体的创造者司马谈、司马迁对这一体裁的优点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述；袁枢对本末体的优点也不做更多的说明，但他们毅然采取相应的体裁写史，没有明确的认识是不会去做的。这类情况，在我国古代史学上例子很多。史家的理论主张都贯注于相应的具体著作中去了。

史学的理论阐述偏重于对史学操作过程的指导，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种倾向。《公羊传》、《谷梁传》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教人的是“一字褒贬”的方法。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主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法。一直到清朝乾嘉时期产生的我国第二部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才提出了层次较高的问题来进行研究，但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如什么叫“史”、什么叫“史学”，史学有什么特点等等，古代史家根本不愿去触及。

一方面历史著作汗牛充栋，一方面史学的基础理论贫乏，这是我国古代史学的实际状况。但这并不能说古代史家对史学理论没有贡献。《史通》、《文史通义》还须深入研究，而大

量的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史学理论，更有待进一步挖掘。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粗浅地描述了我国古代史学的概貌，目的是提供一个认识我国古代史家的资料。其中一些史家，因为本书体例和容量的关系，本传未收入这一册书中；有些史家，为人类历史的留存作出了贡献，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却没有被纳入“正史”，甚至被完全忘记了，仅在这里一并加以说明。

参加本书写作和翻译的，有曾贻芬、任宝菊、孙越、马季凡、赖长扬。因为水平有限，其中必有不少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赖长扬

1992年10月15日于北京

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二

【说明】司马迁（前 145—？），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父司马谈是汉代第一任太史令。在家庭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下，司马迁自幼受到古代文化的陶冶，为继任史官打下了坚实基础。父亲去世之后，司马迁决心继承他的遗愿，写完父亲已经动笔了的史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事件；为了毕尽自己的事业，他隐忍苟活，接受了宫刑。这不能忍受又必须忍受的残酷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极大的影响了他的写作。司马迁最终完成的史书当时称为《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通史。《史记》采用的体裁后人称为纪传体，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部份。本纪主要是选择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为主体，与政治上的大事，连续而集中地展示三代至汉武帝时期的兴衰更迭。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本纪和表都是以时间为顺序，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书是以事为类，主要记录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具有专史的性质。世家是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

的人物及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种体裁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述人类社会史的体系。这是《史记》的首创。此后我国所有“正史”，虽各有变通，但其基本表达形式都采用了这种纪传体。《史记》贯穿着“实录”精神，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历史的实际联系。因此，就整个《史记》说，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至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把历史再现为一幅幅色彩斑斓、威武雄壮的活生生的图画，洋溢着感人肺腑的巨大艺术力量。司马迁是我国“历史学之父”，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

在遥远的颛顼时代，任命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任命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陶唐氏与有虞氏相交的时候，让重、黎的后人继承重、黎的事业，重新掌管与天、地有关的事务，一直到夏朝和商朝都是这样，所以重、黎氏世代代管理天、地的事情。重、黎氏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人。当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失去了管理天、地事务的职掌而成为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史事。周惠王与周襄王承继之间，司马氏迁到了晋国。晋中军将随会逃奔魏地，司马氏因而进入了少梁。

从司马氏离开周室迁到晋国，（其宗族）就分散开了，有的在卫地，有的在赵地，有的在秦地。在卫地的，当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地的，以传授剑术的理论而出名，司马蒯聩是他们的后人。在秦国的是司马错，他与张仪争论，于是秦惠

王派他率兵伐蜀，灭了蜀国，因而就地戍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在武安君白起手下做事。这时候少梁更名叫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白起坑杀了赵国兵败长平的军队，回去以后二人都在杜邮这个地方被赐死，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担任了秦王的铁官。当秦始皇的时候，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为武信君的将军而去攻取朝歌。诸侯们相继为王，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朝讨伐楚霸王时，司马卬归降了汉朝，汉朝以他原先的封地建立了河内郡。司马昌生了司马毋泽，司马毋泽为汉（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毋泽生了司马喜，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去世后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了司马谈，司马谈担任了太史公。

太史公司马谈在唐都那里学习天文，在杨何那里接受《易》（的教育），在黄生那里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是在建元、元封年间担任这个职务的，他责备学者们不彻底理解各家的思想而被各派师法所困惑，就论述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说：“为使天下达到同一目标而有一百种设想，归宿相同但道路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这些都是努力于治理社会的，只是他们学说的思路不一样，有的能省察有的不能省察罢了。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学术，众人忌讳重大的吉凶预兆，便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但是它条理的季节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儒学学者博学但不得要领，劳而少功，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难以完全遵从，但是他们讲叙的群臣父子之间的礼仪，罗列的夫妇长幼之间界线，是不可变改的。墨学学者的节俭难以遵从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事情

不可尽用，但是他们所说的强本节用的道理，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格而缺少恩情，但是他们理顺的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让人简朴而容易失去真实，但它强调名称与实在的区别和联系，是不可不省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展开和闭合都没有形状，哺育万物，它的学术构成，遵循阴阳家对四季顺序变化的主张，采纳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吸收了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针对不同的事物而变化，建树习俗办理事务，没有不恰当的，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实施，办事少而见效多。儒学学者则不然，认为皇上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就要拥护，君主在先臣下应该随后。这样一来，君主就烦劳而臣下就轻松了。至于对重大问题的主张，则远离贤人，废黜智慧，放弃这些而仅用自己的学术。我们知道，精神耗费多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凋敝；精神和形体很早就衰颓了，想要与天地一样长在久存，这种事情还没听说过。

阴阳家主张，四季、八卦位、黄道的十二度、二十四节令各有处理的原则，而说（对这些原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然，所以（我）说他们“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春天播种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则，不顺应就无法制订天下纪纲，所以（我）说“四季的顺序变化，是不可错过的”。

儒学学者，他们以（《礼》、《乐》、《尚书》、《诗经》、《易》、《春秋》）六艺为原则，阐释它们的疏传成千上万，一辈子也不能把它们弄懂，一年内连对其礼法也

不能全搞清楚，所以（我）说他们“博学而不得要领，劳而少功”。如果说他们罗列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讲述的夫妇长幼之间的界线，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变改的。

墨家学者也崇尚尧、舜，他们阐述自己的德行说：“堂屋（屋基）只要三尺高，土阶只要三级，盖房子的茅草不要剪整齐，木椽子不要修整；用土锅烧饭，用土碗盛羹，吃粗米，喝菜汤；夏天穿葛藤制的衣服，冬天穿鹿皮衣。”他们为人送终，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悲哀。他们教授丧礼，固执地要用这一套作为万民的表率。所以天下如果都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不同时代发展了，做的事情就不必相同，所以说“（他们的）节俭难以遵从”。总的说来他们主张的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的原则。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废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关系，不划分贵贱，只依据法令来决断，就使得亲近亲人、尊重尊贵的恩情断绝了，这可以为一时之计，而不能长久作用，所以（我）说它“严格而缺少恩情”。若说到尊重君主、小看臣下，说明名份和职掌不可以相互逾越，虽然让一百个学派（来论辩）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烦琐，使人不能理解他们的本意，他们只根据名来判断事物，经常不合人情，所以我说名家“简朴而容易失去真实。”假若说到他们主张的引名责实，处

理错综复杂的事情不犯错误，这些都是不可不省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叫无所不为，它的具体主张容易实行，它的言辞难以理解。它的学术以虚无为根本，以因循自然为功用，没有既成的形势，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能够彻底推求万事万物情况。它不先于物也不后于物，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一定的法则又没有凝固的教条，只因时事的变化推行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界线又没有凝固的界线，只因事物的情况决定兴起或废弃，所以说“圣人没有机巧，只是遵守顺应时变罢了”。虚是道的常理，顺应它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一起到来，让他们各自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确实名实相符的叫做端（正），确实虚有其名的叫做款。不听叫做款的这种人所说的话，奸就不会产生，贤德和不肖之人就自然分开了，白色还是黑色就显现出来。（剩下的事）就在你想怎么使用了，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于是遵循最基本的法则，混混冥冥（任其自然）；照耀天下，反复往还不计较名称。大凡人有生命是因为有精神存在，所依附的则是形体。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了就会凋敝，形体和精神分离开就会死亡。死去了的不能再恢复生命，离分了的不能再结合，所以圣人看重（神与形）。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躯壳。不先确定精神与形体（的关系和地位），就说“我有（理论）去治理天下”，请问根据什么呢？

太史公司马谈已掌管了天文事务，就不负责民众的事。他有个儿子名叫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龙门山之南黄河的北岸以耕牧为业，十岁时就开始诵读古文。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南游江淮，上会稽山，探寻禹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和湘水；又北涉汶水和泗水，在齐、鲁的都市讨论学业，观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和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到蕃县、薛城和彭城时司马迁旅费缺乏，就取道梁、楚返回了。这时候司马迁当了郎中，奉皇上之命出使巴、蜀以南，巡视了邛、笮、昆明等地，回到长安复命。

这一年，天子汉武帝举行了汉朝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但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在洛阳，没有能跟随武帝去执行封禅的职事，在悲愤中去世。（司马谈弥留之际，）司马迁刚好从西南回来，在黄河与洛阳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从远古开始，就曾经在有虞氏和夏朝的时候立功扬名，职掌天文的事务。到后代就衰落了，难道要从我这里断绝么？你继任太史，就是延续我们先祖的事业了。现在天子承接千年的统绪，封禅泰山，而我不得随行，是我的命（不好）呵！命（不好）呵！我死去之后，你必定要当太史；当了太史之后，不要忘了我想写的著作呵。孝道，是从服事亲人开始，经过为皇上做事，最终达到卓然自立；扬名于后世，使父母显荣，这是最大的孝。天下赞扬周公，说他能宣扬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讲解《周南》、《召南》等《诗经》中的国风，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一直追溯到公刘，以尊崇（周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之后，王道残缺，礼乐制度衰落了，孔子修旧起废，论述《诗经》、《尚书》，作《春秋》，学者们至今都把他当作

典范。自从获麟年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就绝灭了。现今汉朝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不少），我身为太史而不记载评论这些，废弃了事关天下的文字，我太害怕（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了，你一定要时刻想着这事呵！”司马迁低着头泪流满面地说：“儿子虽然不敏捷，还是要请求父亲允许我将父亲已经整理好的史事加以裁断，不敢有所缺漏。”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便在朝廷的石室金匱藏书中搜集材料。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五年是太初元年，这年的十一月甲子日是朔日，早上冬至，改（原用的颛顼历而）行太初历，在明堂中颁布新历，祭祀诸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我的父亲说过：‘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出了孔子，从孔子至现在已经五百年了，一定有继承发扬孔子事业的人（出来），以《易传》为本，继承《春秋》，以《诗经》、《尚书》、《礼》和《乐》为基础。’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这话的意思不正在这里么！作为儿子我怎么敢推让呢！”

上大夫壶遂问：“过去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说：“我听懂仲舒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被破坏了，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加害于他，大夫干扰他。孔子知道当时社会不重用他，自己的理论得不到实行，于是就评论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曲直，作为天下法式，贬损诸侯，批评大夫，以阐明君王（应该做的）事情罢了。他老人家说：我与其写抽象的理论，还不如（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能充分显现（我的思想的）事实之中。《春秋》上阐明了三王的法则，下理清了人事的纲纪，阐明疑惑难明的事理，明白是非，确

定犹豫，赞美善行憎恶丑恶，推崇贤人轻视不肖之人，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兴起被废弃（了的制度），这是君王最重大的法则。《易》叙述的是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变化之道；《礼》为人确定规则，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可以施行；《尚书》记载了先王的事情，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政治方面；《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等，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讽谏；《乐》是快乐所以产生的根据，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协和；《春秋》分辨是非，所以它的长处在学习对人进行管理。所以说《礼》是节制人的，《乐》是启发协和的，《尚书》是记事的，《诗经》是表达意愿的，《易》是阐述变化的，《春秋》是讲义理的。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有数千，万物的聚散之理都在《春秋》（中说明了）。《春秋》之中，弑君有三十六次，亡国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还是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丧失了根本。所以《易》中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故，是由来已久的’。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在自己的面前有言就听不见，自己背后有贼人就不能觉察。为臣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坚持大政方针而不知道它（如何）恰当，遇到事情变化了而不知道对它（如何）权衡。做君主和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承担首恶的罪名。做臣下和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义理，一定会陷入篡位、弑杀君父的死罪。事实上他们都自以为是在做好事，但是不知道义理，一旦把道理讲出来他们就不敢推卸罪责了。不通礼的意

义的大旨，就会（坏）到君主不像君主，臣下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程度。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下不像臣下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原则，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的过错来责备他们，他们是只好接受而不敢反驳的。所以说《春秋》是礼的意义的本原。礼在事情发生之前起阻止作用，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才施行，所以法的功用显而易见，而礼所起的阻止作用就连那些禁止（败坏行为）的人也难以明白。”

壶遂说：“在孔子那时候，上没有明君，下面的人得不到任用，所以他作《春秋》，把平铺直述的文章用礼义作为标准加以批评取舍以垂示后代，当作一统之王的法则。现在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得以各守其职，万事具备，都各自遵循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原则行动，先生所要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生说得对，也说得不对，道理不能这样说。我听我的父亲说过：‘虑戏非常纯厚，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繁盛，《尚书》里有记载，礼、乐创造出来了。商汤和周武王的兴隆，诗人们吟咏歌唱。《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行，推崇三代的德行，褒扬周室，不仅仅只有讥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如今圣明的天子，获得了符瑞，进行了封禅，改了历法，变了服装的颜色，受天命而政清人和，恩泽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相隔数国的国家都派人来叩击塞门，请求进献珍宝晋见皇上的，不可胜言。臣下百官努力歌颂皇上的德行，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况贤能的士人，倘若得不到任用，是有国家的人的耻辱；皇

上圣明，德行得不到传扬，是官吏们的过错。并且我职掌史官，倘若废毁了皇上的圣明盛德不记载下来，灭没功臣、贤大夫的建树不加以叙述，毁弃了我父亲的话，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叙述以往的事情，整理与它们有关的传世材料，并非是创作，而先生把我写的东西比作《春秋》，那就错了。”

于是司马迁开始写作。十年之后他因为为李陵投降匈奴的事辩护而遭到灾祸，被囚禁起来，就喟然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呵！我的身体短少了已经是无用之人了！”他退一步深思说：“《诗经》和《尚书》透露出来的忧愁屈怨，是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思绪呵。”于是，他叙述从陶唐氏以来、到汉武帝获麟那年为止的历史；他把黄帝作为历史的开端。（全书目录，）本纪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表的次序是，《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代》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书的次序是：《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世家的次序是，《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

《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列传的次序为，《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刘

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的余绪，承继了被断绝了的三代的事业。周朝的学说衰落了，秦朝抛弃了古文，焚灭了《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匱的玉版、图书散乱。汉朝兴起之后，萧何整理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建立章程，叔孙通拟定礼仪，文章学术就文质兼备有所进步，散佚了的《诗》、《书》常常接踵出世。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讲黄老之学，而贾谊、朝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理论，公孙弘崇尚儒学而显贵，百年之间，天下的遗文古事没有不集中在一起的。太史公是父子相袭掌理编纂史书的职务，司马谈曾说：“呵哟！我的先人曾职掌这事，在唐、虞之世就有名气。到了周朝，又重新典理此事。所以司马氏一族世代以来都主管天官，到了我这一辈，要

恭敬地记住这事呵!”(于是司马迁)网落天下散佚了的旧事,考察帝王事业兴起的线索,推究它的发端观察它的结果,审视它的兴盛追究它的衰落,议论和考证事迹,略述三代,记录秦、汉,上从轩辕黄帝起,下到当代为止,著作了十二本纪,写出了历史的主要线索。有同时的,有异世的,年代有差别不易辩明,就作了十表。礼、乐制度历代有增有减,律、历有改变,关于兵书、山川、鬼神和天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为了表明其承敝通变的情况,就作了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极星,三十辐条共同装在一根轴上,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合(着帝王),忠诚、信义、推行天道以事奉主上,所以作三十世家。申张正义卓绝不凡、不让自己失去了时机、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很多),所以作了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名为《太史公书》。其序文大体说,这部书是为了网落遗失补充六艺的;它构成了一家之言,协调了对六经不同的解说,整齐了百家杂乱的意见;这部书的原本藏名山,副本在京都,以等待后来的圣人和君子们(观览)。这些都是书中的列传第七十、司马迁的《自叙》所说的。(现在),《太史公书》有十篇缺失了,只剩下目录而没有正文。

司马迁受腐刑之后,担任了中书令,这是个受人尊敬很受皇上宠信的职位。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给他写信,用古代贤臣的标准责备他。司马迁回信说:

少卿先生:以前有辱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努力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推贤进士,意义殷勤诚恳,仿佛是怨我不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而让俗人的言语左右了我的

志向。我是不敢如此去做的。我虽极其愚钝，也曾经从侧面听说过长者遗风。只是我身残处秽受着感情的折磨，动辄得咎，想加倍地检点自己，所以精神抑郁而跟谁也不说什么。谚语说：“可为作之，令谁听之？”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鼓琴，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像我这样一个本质上已有亏缺的人，虽怀着随侯珠、和氏璧一样美好的才能，德行跟许由、伯夷一样，最终也不能得到荣光，只不过足以使人发笑而自己使自己遭受到玷污而已。

本来很早就应回您的信，不巧遇到我随皇上从东方归来，又被不足道的事情所纠缠，与您相见的时间很短，匆匆忙忙没有一点机会得以完全说明我的意见。现在少卿先生遭受到预想不到的罪罚，过一个月，已经是接近季冬，我又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恐怕先生您猝然之间不能与我见面了。如若是这样，我就终究不得把我的忧愤烦闷向接近我的人抒发，而与我永别者的魂魄将怀着无穷无尽的私恨。请求您允许我陈述我浅陋的看法。我很久没回信给您请您不要埋怨我。

我听说，修身的人是智慧的聚集之所，喜欢施舍的人是仁的开端，收受与给予（恰当）的人是义的，（懂得）耻辱的人是勇敢的基础，立名的人是人的作为的最高追求。士人具备了以上五种德行，然后就可以依于社会，被列入君子之列了。所以就灾祸说没有比追求功利更使人痛心的人，就悲伤说没有比伤了心更使人痛苦了，就行为说没有比侮辱先人的行为更丑恶的人，而就耻辱

说没有比受宫刑更大的耻辱了。受了宫刑的人，没有什么可相比的，不是一个时代是这样，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了。昔日卫灵公与雍渠同车，孔子去到了陈国；商鞅依靠景监面见（了秦孝公），赵良就感到寒心；赵谈做了参乘，爰丝满脸不高兴，自古以来都以这样的事为耻辱。有中等才能的人，有事与宦臣相关，就莫不伤心气恼，更何况慷慨之士呢！现在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怎么可以让刀锯之余（的我）去推荐天下的英雄俊杰呢！我依赖承继先人的事业，得以待罪于皇上的辇毂之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自思：对上说来，我不能怀忠效信，得到献奇策、出大力的赞誉，与皇上搞好关系；其次，我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使岩穴之士得以显露；就朝廷之外说，我不能作为军队的一员，去攻城野战，建立斩将搴旗的功勋；就最低要求说，我也不能累日积劳，取得尊官厚禄，为宗族结交达官贵人。以上四方面，我没有一样事是做得到的；我苟合取容，对各方面都无所贡献，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经侧身于下大夫之列，陪着外廷议论些细枝末节的事。不在那时候引进维纲护纪之人，竭尽我的思虑，现在我已亏损了形体为打扫清洁的奴仆，在猥贱的人当中，这时如果想昂首扬眉来论列是非，不是太轻视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了吗！呵哟！呵哟！你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啊！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而且事情的本末是很难辩明的。我少年时自负于不羁之才，长大了后没有得到家乡人的称赞，皇上因为我

先人的原因照顾我，使我得以凭浅薄的才学，出入于防卫周密的宫廷之中。我认为头上戴着盆是怎么也看不见天的，（不可有更大的奢望，）所以我断绝了和宾客之间的往来，忘却了家室的生计事业，日日夜夜想竭尽我不成器的才力，一心一意致力于我的职守，以讨得皇上的欢心。但事情有完全违背主观愿望的。我与李陵都在朝廷供职，素来不是朋友，兴趣爱好各不相同，从未有过举杯戏酒殷勤款待的欢聚。但是我观察他的为人，认为他是无可争议的奇士，他事奉长辈遵循孝道，与士人相交以信为本，面对财物表现廉洁，取得与给予都以义为标准，对身份职别表现出谦让，对下人很客气，常常想奋不顾身以赴国家的急难。这些高贵的品德都是他平素间所积累起来的。我认为他有国士之风。为臣的人出生入死不顾自己一生的长远之计，赴公家之难，这已经奇特了。而今一件事情办得不妥当，那些苟且偷生护妻保子的臣子们紧跟着就牵连生事造谣中伤，我实在是心痛极了！而且李陵率领的步兵不到五千人，深入敌人后方，足迹经过了匈奴的王庭，垂饵虎口，往西向强大的胡人挑战，仰对匈奴的亿万之师，与单于连续作战了十多天，（就李陵军队的人数而言，）杀掉的敌人之多已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匈奴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穿毡制衣服的君长们都震恐了，就全部征集左右贤王属部，征发凡是能骑马射箭的百姓，倾一国之力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绝，救兵又没有到，士卒伤者相堆积。但是李陵只要一呼唤已疲劳的军队，战士们没有不奋起的，

他们弯着身子流着鼻涕，抚着流血的伤口暗自饮泣，拉开没有上箭的弓，顶着雪亮的刀刃，面对北方与敌人死战。李陵还没去世之前，有使者回来报告，汉朝的公卿王侯都捧酒祝贺皇上。几天后，李陵战败的事被奏闻于朝廷，皇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政时很不高兴。大臣们忧愁恐惧，不知计从何出。我不自量个人卑贱的地位，见皇上惨切悲恻，真心想用我忠实诚恳的愚陋报效皇上。我认为李陵平素间与士大夫相处就同甘共苦，所以能让人为其拼死，虽然是古代的名将也超不过他。他虽然陷于失败，但看他的意图，是想得到机会而报效汉朝。事情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所摧毁战败敌人的事绩，功劳也足以显露于天下了。我心里怀着这个意见想上陈皇上，但没有门路。恰好遇到皇上召问，就根据这个思路推崇李陵的功劳，想以此开扩皇上的思路，堵塞小怨小忿引起的不实之辞。我还没完全说明，皇上没很好考虑，就认为我是在攻击两师将军而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下发到司法官审问。我的拳拳忠心，终究不能自陈。因为认定我诬上之罪，最后就让狱吏们去议论量刑。我家贫穷，所有的财产不足以自赎其身，朋友们没有来救援的，左左右右亲近的人都不为我说一句话。身体不是木石，我独自与法吏为伍，深深地囚禁在监牢之中，向谁去诉说我满腹的心酸呵！这些事都是您少卿先生亲自见到的，我的行为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李陵既然投降，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被推进了蚕食，再次被天下人看笑话。太可悲了！太可悲了！

事情不容易给俗人说明白。我的先人没有享受剖符丹书的功勋，做掌管文史星历的史官，地位与卜人巫祝相近，只是供主上所戏弄、当着优伶一样养畜着罢了，为社会所轻视。如果我伏法就诛，若九牛失去一毛，与蝼蚁有什么区别？而且社会上又不把我的死与为气节而死等量齐观，不过认为是我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只好就死罢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平日里自己立志造成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最好是不辱没先人，其次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其次不辱没义理名份，其次不辱没辞令，其次是屈体受辱，其次换了服装受辱，其次是带枷绳被杖击受辱，其次是剃去毛发打上金印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折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侮辱是腐刑，这就到了极点了！《传》上说：“刑不上大夫。”这话是说士人的气节不可不磨砺，（以图上进）。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到落入陷阱之中，就只能摇尾乞食，它的威风被欺诈制约了。所以士人们知道，即便是画地为牢也不能入，即使是木头做的狱更不能跟他对话，做出这种决定是因为道理太明显了。现在我手足交叉，被绳捆索绑，暴露肌肤，受棒击，被禁锢在环墙之中，这时候，看见狱吏就低头撞地，徒隶出现我就心中恐惧，这是为什么？威风被权势所制约了。到了这个时候，说没有受辱的人，就是所谓的勉强装样子罢了，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而且，西伯，是伯，被拘于牖里；李斯，是相，被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是王，在陈地被桎梏；彭越、张敖南面称孤，或系于狱或狱大

罪；绛侯诛杀了吕后一党，权倾五霸，结果被囚在关押有罪官吏的牢狱中；魏其，是大将，穿上了赭色的衣服，颈、手、足三处都上了枷锁；季布（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成了朱家的钳奴；灌夫受辱之后只好居住在家里。这些都是身居王侯将相、名声远扬邻国的人，到了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不能自杀对自己进行裁决。在茫茫尘世之中，古今都是一样的，怎么能不受侮辱呢！这样看来，勇敢和怯弱，是人所处环境和地位决定的；强与弱，是形势所使然。道理确实是这样的，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且人不能及早规范自己的行为，已经落到置身于鞭捶之间时，才想引荐有节操的人，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古人所以难以对大夫施用刑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就人情说没有不贪生怕死、思念亲戚、眷念妻子儿女的，而被义理所激发的人却不然，他们有不得已（而不畏死、不思念亲戚、不眷念妻子儿女）的时候。我是不幸的，太早地失去了双亲，没有兄弟间的亲爱，独身孤立，少卿先生把我当作您最亲近的人怎么样呢？而且勇敢的人未必都是为殉节而死，怯懦的人钦慕义，就没有什么地方不以义理来激励自己！我虽然怯弱想苟且偷生，也很知道去就的界线，为什么会陷入一狱囚禁的耻辱之中不能自拔呢？而且即是奴婢侍妾也能引咎自裁，何况像我处于这种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所以隐忍苟活，被淹埋在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怀恨自己的心愿有没有实现，鄙视被世事所淹没而我的文采不能传扬给后人。

古代富贵的人而名字被磨灭了的，不可胜记，只有

倜傥非常之人得以显身扬名。大概说来，西伯被拘之后而演绎了《周易》；仲尼受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就赋了《离骚》；左丘失明，就写了《国语》；孙子的脚受了膑刑，就写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世间就流传了《吕览》；韩非被秦国所囚，就作了《说难》、《孤愤》。《诗经》的三百篇，大约都是贤圣的发愤之作。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人的思想有郁结之处，弄不通其中的道理，所以叙述往事，思考未来。像左丘明眼睛看不见，孙子被断了脚，终究得不到任用，只好引退写文作书以抒发自己的悲愤，想留下文章以自表其志。我私下里很不恭敬，近来以没有才气的文辞自托，网罗天下的佚闻旧事，考证事实，探寻成败兴坏的道理，总共一百三十篇，也想以此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的变化，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草创未就，恰好遭遇了这场灾祸，可惜它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毫无愠色地接受了极刑。我将此书写完之后，要把它藏之名山，留传给能在通邑大都扬播的人，那么我就补偿了受辱所遭到的责难，虽被戮杀一万次，难道还会后悔吗？但是这些话只可以跟有理智的人道，难以给俗人言。

况且背负侮辱的人不容易安居，地位低微的人遭到的诽谤最多。我因为说话不慎而遭遇到宫刑之祸，再一次受到乡党的讥笑和指责，辱了先人，还有什么脸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虽然是百代以后，我所造成的污垢只会越积越厚的！所以，我肠一日而九回，在家里坐着就感到飘飘浮浮若有所失，出门则不知道自己到什么

地方去。一想到自己的这一耻辱，汗就没有不从背上往外冒浸湿衣服的。身虽为皇上内廷之臣，还不如自己引退深藏到山岩洞穴当中去呵！所以姑且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以此来疏通我的大惑不解。现有少卿先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不是和我个人的愿望相违么？现在我虽然想雕琢自饰，用美妙的言辞自我解嘲，也是没有益处的，社会上不会相信我的辩解，只不过取得羞辱罢了。总之到我死那天，是非才能明确。书不尽意，所以只是大略地陈述我浅陋的看法。

司马迁死后，他写的《太史公书》才有一些部份流传出来。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师法、陈述《太史公书》，于是此书才全部公布于世。到王莽的时候，访求司马迁的后人，封他为“史通子”。（赖长扬 译）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诸侯之相王，王印于殷。汉之伐楚，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怵，毋怵为汉市长。毋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

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故天下共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成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

谓之款。款言不听，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扼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舐史记石室金匱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牦，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知，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坠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圜墙圜。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

《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禅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

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瑄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郤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鄺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太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

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同,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

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託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以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柰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外我廷

未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闾茸草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首！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叩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沫，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

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以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墙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贖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蛄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诟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有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捶，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

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入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捶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

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班固传

——《后汉书》卷四〇

【说明】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东汉前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班彪去世之后，他因感父亲所著的《史记后传》“所续前史未详”，就“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被人告发私作国史而下狱，经其弟上书说明了他著作的意旨才免于罪，被任为兰台令史，迁校书郎。他在完成了部份东汉史书写作之后，奉诏继续编写西汉史，完成了著名的《汉书》。

《汉书》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格局。班固改变了司马迁立纪的本意，完全以皇帝为中心，一帝一纪，确立了纪传体本纪“书君上以显国统”的后代“正史”的模式。他还抛弃了《史记》“世家”体例，将皇帝以下的人物尽纳入列传之中，以时间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以边疆各族传，以“贼臣”王莽居传末；整齐了列传的标题。他新创了三个表，其中《百官公卿表》很有价值，是我国“正史”专篇记载官制的滥觞。《汉书》的志，取法于《史记》的“书”而有很大的发展，对典章制度的记载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在内容上《汉书》以“博洽”著称。其中尤以“十志”卓越。它们详细地记载西汉封建专制政体的国家职能，叙述了高祖草创、文景修饬、武帝强化和完善等历史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和虚伪。另外，《汉书》文辞富赡，句多排偶，整齐工丽，文章温文尔雅，严谨蕴藉，也是可诵可读的文学作品。

在思想上《汉书》以神化王权和封建等级秩序为首要任务，又在一些方面能够以人文主义的观点去考察、总结西汉历史的兴衰成败，表现出了一种“二重真理观”。从总体看，《汉书》基本上被“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神学目的论所桎梏着。这些都大大限制了他进步史观的伸延，也就压抑了他在学术上的更大成就。

班固字孟坚。他九岁时，就能写文章、诵诗和赋。长大后，逐渐博贯群书，对九流百家的著作，没有不彻底钻研的。他学习没有一定的老师，不为章句之学，只是抓住学问的主要意义而已。他生性宽和容众，不以自己的才能去压制别人，诸位儒生因此而敬慕他。

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因为至亲的关系以骠骑将军的名义助理国政，开东阁，延英雄。当时班固正年少，就上书给刘苍说：

将军您以周公、邵公的德行，屹立于本朝，承继了美好明智的策略，建立了威武灵祥的称号，过去是周公（有此殊荣），今天是将军，《诗经》和《尚书》所记载的，没有第三个人有此事了。《传》上说：“必有非常之人，然

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班固我有幸生在这清明之世，安乐地处在视听范围之外，私下用蝼蚁般短浅的目光，悄悄地观察国政，真诚地赞美将军担负着千载以来的重任，踏着先圣周公的足迹，摆开舒展美好的姿态，雄据贵宠的地位，博贯一切事务，服膺《六艺》、区分黑白是非，求善无厌，甚至对狂夫的言语也加以采择，不违背对民众的诺言。我看见您新开了幕府，广泛地延揽俊杰，四方的士人，（匆忙归附，）甚至穿颠倒了衣裳。将军应当详细考察唐尧、唐汤对皋陶、伊尹的举荐，让无论远近都不偏废，隐居的一定得到显达，寄希望于总揽贤才，聚集明智，为国得人，使本朝获得安宁。（达到了这一目标，）将军您就可以养志和神，悠游庙堂，光辉的名字在当代传扬，巨大的影响在后代将连绵不尽。

我看原来担任过司空掾的桓梁，是老成博学的读书人，在州里德高望重，已经七十岁了，能够从心所欲，行为不逾越法则，是参予助祭清庙的最佳人选、当代的俊美之士。京兆祭酒晋冯，从小修身，头白了也不改初衷，他好古乐道，默默地坚持，具有古代美好的行为，社会上的人没有赶得上他的。扶风掾李育，通晓经典行为卓著，教授一百个学生，客居在杜陵，住的茅屋，连阶梯也是土造的。京兆、扶风两个郡相继请他为官，因为家贫，他几次都借故有病而辞归了。温故知新，议论通达明晰，尊循廉洁原则，行为和才能都兼备，虽然是前世的名儒，国家所器重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和现在的韦贤、

平当、孔光、翟方进比的。应当让他们主持考绩，由此而让他们参预更多的事务。京兆督邮郭基，他孝顺的行为在州里很著名，经学方面受到老师同学的赞扬，政务方面的成绩有绝然不同于人的效果。如果郭基能到将军身边，让他做您秉笔的僚属，那么进一步他将会如鸿鹄高飞有大用，退一步说他会在危急之时奋不顾身为国像杞梁一样战斗而死。凉州从事王雍，躬行卞严一般的节义，倘若增强礼乐方面的修养，凉州的达官贵人们就没能超过他们的了。古代的周公一举兵就有三国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安排在后面呢。”请将军尽快开府理事，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广闻博学，才能绝伦，能够吟诵《诗经》三百篇，奉使对答如流。（韦贤、平当、孔光、翟方进、王雍、殷肃）这六位先生，都有卓越的行为绝代的才能，他们的道德高尚闻名当代，如蒙将军征纳任用，作为将军您的辅佐，这就是孔子感叹山梁的雌雉一样，正遇上了他们的活动的好时候呵。过去卞和献宝，被施加了刖刑；屈原尽忠报国，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但和氏璧却千年以后也放射出光芒，屈原的文章万代以后也受到赞赏。但愿将军继续发射照耀细微的光明，发扬周公那种太阳偏西了还来不及吃饭的勤恳精神，屈尊委威，不耻下问，让茫茫尘世之中，永远再没有卞和、屈原那种遗恨。

刘苍采纳了班固的意见。

父亲班彪去世以后，班固回到了家乡。班固认为班彪所续的前朝史不详细，就潜心研究，想完成父亲未尽的事业。不

久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自改作国史。明帝有诏书下到郡时，逮捕了班固关进京兆府的监狱里。把他家的书也全部拿走了。原先扶风人苏朗造假图讖到处散布流言，关进监狱中死去了。班固的弟弟班超怕班固被郡县里拷问，班固不能自己辩护清楚，就奔赴到京城上书，得到了明帝的召见。班超把班固著作的意图完全向明帝作了说明，而这时候郡里也上书（说明班固著作的本意）。明帝认为班固是奇才，就召他在校书部工作，任命他为兰台令史。班固与前任睢阳令的陈宗、长陵令尹敏、司徒从事孟异共同完成了《世祖本纪》。提升班固为郎官，做典校秘书的工作。他又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上奏明帝。明帝就让他重新去完成以前他所写的著作。

班固认为汉代继承的是帝尧的气运，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皇帝的基业，帝位传到第六位皇帝汉武帝的时候，史臣司马谈和司马迁就追述皇家的功德，私作本纪，将大汉朝的历史编在百王之末，置于秦朝和项羽之侧，太初年以后的事，又付之阙如不予载录，因此他研究以往的史书，搜集所闻，写成了《汉书》。《汉书》从汉高祖写起，到汉平帝之世及王莽被诛杀结束，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全书条理行事，依靠并贯彻《五经》，上下博通，写了如《春秋》经一样形式的帝纪、表、志、传一共一百篇。班固自永平年代中期受诏，潜精积思二十年，到建初年才完成。当时的人很重视他写的书，学者没有不诵读的。

班固自从为郎官以后，渐渐得到皇上的亲近。当时京师建造宫室，疏通城壕，而关中父老还是盼望朝廷西顾。班固

有感于前代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之流创作文章，归结到讽劝，于是给皇上献上了《两都赋》。他在文中盛赞洛阳宫室制度的完美，以此来驳斥西宾主张淫侈的理论。《两都赋》是这样的：

有西都来的宾客问东都主人说：“我仿佛听说过大汉最初经营的时候，曾经打算建都洛阳。因为那里不安稳所以才没有在洛阳建都，为了寻求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西迁，建筑成大汉的首都。请问主人听说过其中的原因并且看见建都的制度吗？”东都主人说：“我没有听说过也没看见过。请贵客启怀旧的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让我把广博无边的皇道阐述一番，把宏伟的大汉都城描绘一二。”宾客说：“好吧，好吧。”

大汉的西都，位于雍州之地，名叫长安。险要的函谷关、崤山雄据它的左侧，大华山、终南山是它的屏障。褒斜谷、陇首山位于它的右侧，连带着黄河、泾水和渭水。这里的草木，是九州之中最茂盛的；可作为防御的险阻，是天下最深不可测的。所以长安由西向东可以控制四方上下，因此才成为了周朝、秦朝、汉朝的京都。周朝是因为龙而兴起的，秦朝是以猛虎般的暴力成就的。到了大汉朝受了天命而建都在这里，仰观五星聚于东井的祥瑞，俯合《河图》所显示的神灵，恭敬立议，张良实施，天人合应，激发了高祖，于是神驰入关，在长安兴建京城。于是望秦岭，视北阜，傍酆水和霸水，倚靠陇首山，策划亿万年皇帝的基业，确定宏伟的规模而大兴土木，从高祖肇始终于平帝，世代增建、雕饰让它更加

壮丽，经历了十二位皇上的努力，所以长安显得穷奢而极侈。坚固的城墙高万丈，扩大的水池成了深渊，铺了三条宽阔的道路，建立了十二道城门。城内街道四通八达，居民住宅区的大门不下千数，九个集市开市，货物整齐地摆放道边，人们来不及细看，车子不能够调头，来往的人们充满了城郭，市场旁边邸舍连着邸舍，尘土高高地扬起，烟雾与云霞相连。这时候长安既庶且富，快乐得没有边际，都人士女，和五方的其他人有显著的差别；在长安的游士都像公侯一样，卖货的女子比大国女子还奢侈。乡曲豪俊游侠英雄，仰慕平原君、孟尝君的气节、名声压过了春申君和信陵君，广为结交朋友，在长安城中奔走不暇。

如果我们到长安的四郊看看，到它邻近的县邑去游览游览，那就可以南望杜陵和霸陵，北眺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等五陵，名都所对的城郭，这些县邑里住着的人都与京城中的人相关。这里是产生英雄俊杰的地方，许多当大官的人从这里兴起，产生过七个丞相五个公，真是冠盖如云！把这些地方让给州郡的豪杰居住，让它成为如同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五都一样的商业中心，选三等人七次迁徙，扩充陵邑，是为了强干弱枝，繁荣皇都而俯视万国。在京畿之内，沃野千里，超绝中国，兼有各地的出产。在长安南面有蔽天的崇山，幽深的树林深谷，埋藏着陆地和海中的珍宝，蓝田有美玉，商县及上洛在山曲之中，酃县和林县枕着南山的山麓，山泉灌溉着庄稼，池塘星罗棋布，到处是一

片片的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区田野的富裕，号称与巴蜀相近。长安的北边有高峻的九峻山，伴陪它的有甘泉山，有灵宫在其中耸立。这些都是秦、汉时代最为壮观的景象，引起过王褒和扬雄的颂叹，从那时候起就流传至今。在九峻山和甘泉山下有郑国渠和白渠所滋养的沃野，是衣食的来源。天子畿内的五万井，疆界如丝织物的花纹般向四方延伸，沟洫和田畦交错如缕。原隰如像龙鳞，打开水渠就如同降雨，农夫扛起锄就仿佛是一片片的云彩，五谷的穗都垂着头，茂盛的桑麻铺满了大地。在长安的东郊则有交通天下的水路，勾通渭水和黄河，打开黄河又与江、淮相连，舟船可以直通山东，水道可以引来淮河、洪泽湖的物产，长安的东面就通过黄河与大海的波涛连通了。长安的西面则有皇上的林苑，山麓的林木、畦地、池塘，与巴蜀、汉中相连，有围墙将它们绕围起来，共有四百余里长，其中有离宫别馆，共三十六所，神池和灵沼，就在这些离宫别馆之间。在离宫别馆里，有九真郡所献的麟，由大宛得来的马，黄支所贡的犀，条支送来的鸟，它们越过昆仑山，渡过大海，各方的奇珍异类都不远千里而来，最远的来自三万里之外。

长安的宫室建筑，布局如像天地，按照阴阳安排，依据坤灵定正位，模仿太微星座的方正，紫宫星座的园形。耸立起中天华美的门阙，扩建了山上的红色庙堂，用珍贵的材料穷尽奇妙，驾起如应龙、长虹般的曲梁，排列起椽子复盖屋顶，用粗大的楝把它们支撑起来。雕刻玉

石作为柱基，剪裁金玉装饰瓦珰，它们闪射着五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光彩夺目。于是就在堂屋的左右阶上铺砖，两层地板三层阶，修建小门让各部份相互勾通，敞开大门，在中庭悬挂起大钟，在宫殿的正门排列起金人，为了增加障碍而横起门槛，在险峻的路上安置了门扉。在宫殿周围建立起了离宫别寝，附设有高台闲馆，光辉灿烂如同星星环绕着紫微宫一样。清凉殿、宣室殿，中温室殿，神仙殿、长年殿、金华殿、大玉堂殿、白虎殿、麒麟殿，范围如此之大，就不可能都一一详说了。盘曲巍峨，上下璀璨，殊形诡制，每一座殿宇都不相同，皇上坐着褥子垫着的辇上，到这些地方去休息宴饮。后宫住的地方有掖庭、椒房，后妃住的地方有合欢、增成、安宁、常宁，迴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等室。其中以昭阳殿特别繁盛，在孝成帝时最为兴隆，它的建构材料不外露，墙不显现出形状，都用绣花的丝织品包裹青丝绶带缠绕着，随侯所得的珍宝，错落其间；黄金做釭上镶嵌着玉璧，像钱一样罗列着；翡翠和明珠，流动着光辉，像悬黎和垂棘那样的宝珠，在夜里也闪耀着光芒。这个宫殿的地上用黑漆涂刷、次等的玉石砌成，硬石和碱石文理细密，琳石和珉石含着柔和的光，珊瑚做成的假树，植立殿曲。穿红衣的侍女垂着长袖，有花纹的绶带随风飘舞，精美的装饰闪闪烁烁，时俯时仰恍若神女一样。后宫的名号，有十四等，幽闲美丽，一个比一个显贵，处在这个序列中的，大约有数百人。在朝廷的左右，是百官的朝位，萧何、曹参、魏

相、丙吉等丞相，在那里谋划。他们佐助帝命就建立大业，辅翼皇上就完成教化，大汉的欢乐和平易的政治从这里流布全国，亡秦的毒螫在这里遭到涤荡。所以人们扬起和谐的音乐，创作出了“划一”的歌曲，功德归于祖宗，恩泽施于黎庶。又有天禄阁、石渠阁，是收藏典籍的地方，任命 谆谆诲人不倦的老人、有名的儒学大师，在这里讲论《六艺》，探讨各种学说。又有承明和金马门，是著作的场所，高雅君子 and 宏达的士人，在这里聚集，原原本本地将他们广博的见闻写出来，阐发以往文章的思想，校理秘府所藏的书籍。周围有紫微星座的外星似的位置，有夜以继日的官署守卫着，它们总管着礼官所司的考试大权，集合着天下百郡的孝廉。虎贲、赘衣、阉尹、阉寺，一层又一层的执戟之士，都各有职责。宿卫的数千房屋环绕宫殿，传徼的道路纵横交错。皇上的辇路，长长地伸向远方，两旁时时闪现出台阁。它把未央宫和桂宫连结起来，北面通向明光宫和长乐宫，登上陛级越过西城，把建章宫又连结起来，在那里设置了凤阙的壁门，在殿堂的最高处栖息着金雀。建章宫内有高高的别风阙，华丽奇巧拔地而起，设立了千门万户，依照晨昏阴阳而开闭。这里的前殿巍峨，重叠高耸，俯视未央宫，经过骀汤殿而出驂娑殿，穿过枌诣殿与天梁殿，看见的都是飞檐盖顶，阳光把它们的影子投映在殿内。神明台在葱郁的林中耸立，指向兰天像是还在上升一样，积雨云只是飘浮在它的半高处，彩虹在它的梁栋间回旋，虽然使人感到轻松飘飘欲仙，还是因为它太高心中惊诧而

不敢上登。攀上井干楼还不到一半的地方，就使人头昏目眩，倘不再倚扶楼上的栏杆，就像是从高处落下来又暂时停住了一般，神魂飘浮没有归宿，只好顺着上来的路而下去。既然害怕登高远望，下来之后就在周围徜徉，踏上弯弯曲曲的甬道，又被深深的林荫所吞没见不到阳光。打开楼阁上的门走出来，就像放目天外，人仿佛无依无靠不知所归。前面是唐中后面是太掖池，包容了大海的广阔，好像这里滚动着碣石的波涛，激荡着海中神山的云雾，瀛州和方壶山都被云埋雾葬了，只有蓬莱山还耸立在中央。在这里灵草在冬天也长得很茂盛，神木密密麻麻，高大挺拔，闪着金光的石头峥嵘排列。在这里挺立着（武帝所立的）仙人掌承受着甘露，支撑它的是两根闪闪发光的铜柱，它远离了尘埃的混浊，搜集着大气的精华。它们尽情地显示着文成将军李少翁的荒诞，体现出五利将军栾大的方法，差不多与神农时的雨师赤松子和周灵王时的王子乔同一类型的人，时常跟从皇上在这里游览，实在是各位神仙美好的处所，而不是我们这种凡人所休憩的地方。

在这里洋溢着娱乐游览的壮观景象，振奋人的射御在上苑展开，用这些活动来威摄戎狄，讲习武事而耀武扬威。命令荆州进贡鸟，下诏梁地的山野捕来了兽，把兽群安顿在苑囿之中，让百鸟在空中翱翔，鸟儿翅膀接着翅膀遮天蔽日，野兽太多连脚也难以安插，都集中在森林中聚居。水衡和虞人，管理着这里的事务，区分鸟兽的种类，各种工作人员都属于相应的机构。捕兽的网

结一个连着一个，笼山罩野；列队的军士密密围了一个圈，仿佛星罗云布。于是皇上起驾，帅领着群臣，经过飞廉馆，进入上林苑的大门。这样，他们绕过酆、镐，经上兰观，军队一齐展开，百兽惊惧，冲突奔走，尤如雷奔电激，踏平了草木，震动着山渊，杀射了十分之二三的野兽，才暂且抑制军队的怒气而稍作休息。这此军士都是期门、羽林，他们或手持刀枪或挎着弓箭，跟着奔逃的鸟兽追赶，使惊慌的鸟儿投入了罗网，恐惧的野兽遇上了锋芒。他们的弩机绝不虚发，弓弦绝不拉第二次，箭没有只射中一个目标的，必然射中一双，鸟儿纷纷坠落，箭尾系的丝绳与箭相互纠缠，羽毛飘飞鸟血如雨，洒满了山野遮住了天空。平原被染红了，勇士的斗志仍然旺盛，猿和狄被吓得离开了树木，豺狼害怕得只好逃窜。这时候皇上就移师向险要处逼近，并踏入榛芜之林，被紧逼的猛虎东奔西突，疯狂的兕跳起来用角乱顶。军士像许少一样施用巧计，像秦成一样有力量使野兽折服，抓住较小的，捉住凶猛的，折断了它们的角，扭断了它们的脖子，空手与它们搏斗而将它们扼杀。于是挟着小豹，拖着熊，拉着犀，曳着黑，跨过了迴转的沟壑，越过悬崖，跳过巉岩，巨大的岩石粉碎了，松柏倒下了，丛林毁坏了，草木没有了生机，禽兽也都被杀尽了。于是天子就登上属玉观，走上长杨宫的台榭，观览山川的景象，看三军杀死和生擒的鸟兽，萧条的原野上，极目四望，只见被射死的飞禽层层叠压，野兽纵横相枕。然后收拾飞禽会合众人，论功行赏，轻骑列队以颁发带毛的肉，酒

车来往而供应斟酌，割下鲜美的野味在野外烹食，举着火把应命捧杯。赏赐、宴会结束后，劳与逸得以均和，于是皇上的大辂车鸣着金铃，从容地回旋于山野，又至豫章观里集会，而对着昆明池。（昆明池中婷婷玉立着两个石像，）左边是牵牛，右边是织女，池水像天河一样广阔无边，周围茂密的树叶罩下清凉的绿荫。芳香的草复盖着池堤，兰草和迴草透出润泽，茂盛婆娑，如像展开的锦缎铺开的彩绣，倒映在池水之中。黑鹤白鹭，黄鹄、鱼鵒、鸛雀，鸬鹚、鸂、茈、鳧、鸿雁，清晨从黄河入海处出发，黄昏时就到了长江、汉水住宿，沈浮往来，仿佛是云集雾散一般。这时候，后宫嫔妃就坐着卧车，登上龙舟，张开凤盖，树起彩旗，拉上黼纹的帷幕，以清澈的池水为镜，沐浴着微风，让淡雅的裙衫随飞飘舞。划船的少女唱起了歌，伴奏的音乐跟着响了起来，声音高昂激越，在天空回荡，引来了鸟群翱翔，鱼儿在水中偷看。举起弓箭，射下两只鹄；伸出翠羽为饰的鱼竿，钓上一条比目鱼。手抚船楼粗大的支柱，身挎弓矢，两只船在池中急驶，极尽俯仰的快乐。乘风破浪乱了水中的云彩，信舟观览，向前可以越过秦岭，向后可越过九峻山，向东可以靠近黄河、华山，向西可以跋涉到岐山、雍县，所经过的宫馆，有一百多处，朝夕停留的地方，都提供一样的供给。祭祀天地山神，探究用什么东西才能得到保佑，采集游童欢乐的歌谣，评赏从臣的颂歌。在这个时候，都市与都市相望，城邑连着城邑，国家有十世雄厚基础，家庭继承着百年以来的事业，士人靠先辈

的德行名声为食，农夫耕种着先人的田地，商人经营着祖辈所从事的行业，工人使用着曾祖所用过的工具，时代的光辉就来自于这隐隐约约的继承之中，使社会成员都能各得其所。

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从小墟中观察，听老人们述说，那时的情况我知道的连十分之一也不到，所以不能全部描述出来。

东都主人又喟然叹息说：“社会风气使人发生变化太令人痛心了！先生确实是秦人，矜夸馆室，守河山之险自以为界，熟知秦昭王、襄王和始皇帝，哪里看见大汉的兴起呢？大汉开始的时候，是依靠布衣的奋斗而登上皇帝之位的，争战数年而开创了万代的基业，大概这种事在《六经》中都没谈到过，前代的圣人都没说过的。那个时候，汉高祖功劳显赫天象也有显示，讨伐叛逆顺应了民心，所以恭敬从形势考虑而向高祖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萧何权衡利益而创造了建都的制度。当时难道是为了奢泰而苟安吗？是不得已而为之呵。我的先生您看不见这些，反而炫耀后嗣子孙末代所建造的东西，不是太不明白了吗？现在我要告诉您光武帝建武年间的情理，明帝永平年间的事情，以无为为镜，这样来改变您的不同看法。

过去王莽逆乱，汉朝的国运中断了，天人共诛，全国相灭。那时候的动乱，民众几乎都要死去，鬼神都快泯绝了，山谷里没有完整的灵柩，外城没有留下的房屋，原野饮食人肉，川谷流淌着人血，秦朝和项羽造成的灾

害还不到它的一半，有文字记载以来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因此下民哭号乞求上天，上帝怜悯百姓而下视四海，授命给光武帝。于是光武帝手执上天之命符，讲解祥瑞，披露图纬之文，考察上帝的文书，赫然发愤，天下响应如云涌动，迅雷滚过昆阳，盛怒震动天地。这样光武帝渡过了黄河，占据了北岳，即位于高邑，建都于洛阳。他承负了百王以来的大难，靠天地而荡污涤垢，从头开始建立制度，按照天意而大肆兴作。东汉继承了唐尧的统序，接续了西汉的事业，繁衍教育民众，恢复疆土，勋功是以往时代的总和，做事比三皇五帝更辛勤。难道光武帝仅仅是重新一统了天下，杂糅了百王的优点，从事近古以来所从事的事务，而陷在过去一个圣王所遇到的理乱形势之中么？而且建武初年，天地发生了变革，四海之内，夫妇重新组合，开始有了正常的父子关系，君臣的关系初步建立，人伦的观念实际上才重新开始，这就像虑羲氏为皇时所凭借的社会情况一样。光武帝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这就像轩辕氏建立帝业时所作的贡献一样。光武帝躬行天罚，应天顺人，这就像商汤和周武王光大帝王的大业一样。改城迁都，这是有殷代的盘庚为榜样；就天下之中，有周成王兴盛隆平时的制度可作遵循。光武帝没有借助尺土之封，一人之权，和汉高祖一样。克己复礼，始终遵循这个原则，光武帝同汉文帝一样。光武帝以古代圣王为法则，封泰山并勒石记功，其礼仪发扬了武帝时的制度。按照《六经》来检查自己的德行，颂扬过去的圣德而论评功勋，仁

者圣人做的事已经全都做完，帝王应该有的原则就具备了。

至于永平年间，在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基础上，在明堂、辟雍、灵台这三处举行了盛大的皇家仪式，制订了新的服饰制度，发布了诏书，申明美好的前景，为光武帝上尊号叫代祖，依照讖文改“大乐”为“大予乐”。人和神的关系融洽了，君臣的尊卑得到了严肃。于是启动了皇帝的专用车大路，沿着驰道，巡视各地，调查各国的物产，考察汉朝声教的复盖面，让皇上的光明照亮那些幽暗的地方。然后在周代已有建筑的基础上扩建，修整洛阳，把它变得雄伟壮丽，繁华端庄，让汉朝的京城在中国闪射出光辉，从中央总揽四面八方。这样一来，皇城之内的宫室就宽敞明亮，门阙高大庭院秀丽，奢侈并没超过限度，节俭也并不过份。城外则将就原野修建了苑囿，顺引流泉而挖了水池，培养了浮萍、水藻让鱼深藏，种植了茂盛的草类而养育野兽，制度与古代梁邹那样的天子之田相同，道义与周文王的灵囿一样。如果遇上按时节举行的军事检阅和狩猎，率领战车步卒讲习武事，就必定按《王制》所规定的办事，用《风》、《雅》的诗句作为检查的根据。看过《驹虞》诗，览毕《四驥》诗，赞扬了《车攻》诗，采撷了《吉日》诗，礼官进行完所有的仪式，皇上才乘车出发。这时推动了鲸鱼形的杵，撞击黄钟，登上了玉车，驾起高大的马，张开潇洒的凤盖，鸾铃叮咣作响，百官跟从，一派威武盛大的景象。山神在野外守护，嘱托四方之神共同防御，雨

师在路上洒了水，风伯清扫了尘埃，千乘像雷霆一样涌起，万骑浩浩荡荡，战车在原野上竞相奔驰，戈矛拔开了云层，帽顶上的毛羽扫荡着天空的虹霓，旌旗把天空都遮满了。光芒闪烁，五彩斑斓，像狂风卷裹着火焰，燃遍了原野山蛮，日月都失去了光明，丘陵为之摇撼。于是在围中集结，三军排列整齐，部曲的小方阵组成了校尉的大方阵，整理队伍，让将帅们誓师。然后举起烽火击打战鼓，行了三驱之礼，轻车就像雷霆一样迅疾，骁骑犹如闪电一样划过，跟养由基一样的神射手发射出了箭矢，跟赵简子的御车范氏一样的人驾着车，开了弓就不会射不着禽，驾车绝有不符合礼，飞的东西来不及飞起，跑的东西来不及离去。指顾之间，装猎物的车已经填满了，欢乐并不过份，杀伤并不绝尽，马尚有余力，士卒的怒气还未完全发泄，先锋队已经踏上了归途，跟随的车子已经缓缓起程。于是用三牲祭天地宗庙，用五牲祭天，礼拜天神地神，缅怀诸神，诸侯们在明堂朝见，降临辟雍，传播光明，宣扬皇风，登上灵台，考察美好德行的征验。仰观天俯察地，参考天子，按照中国的状况而布施惠德，依据四夷的情况而加威。涤荡了西面的黄河源头，廓清了东面的深海，震动了北方的幽山深谷，越过了南方红色的界线。各方的不同区域，远在边界之外的国家，汉武帝所不能征讨的，汉宣帝所不能使之臣服的，不管是陆地和水中的国家莫不感到害怕，急忙赶来宾服。于是云南的哀牢安定了，永昌得到了开发，春天正月初一，各地的王都前来朝见，在汉朝的京城会合。在

这一天，天子接受四海之内的文书，接纳万国所贡的珍品，对内抚慰中国，对外接交诸蛮。就在帷幄中陈列盛大的乐队、礼器，安置在云龙门的庭院中，文武百官排列整齐后再请诸王侯，举行皇帝的仪式而展示皇上的风采。这时候，庭中堆满了千百种东西，一杯又一杯的甜酒，金杯玉盏错综排开，桌上摆着八珍食品，堆着牛、羊、猪肉。在这里吃完饭后歌唱《诗经》中的《雍》，太师奏乐，金石之类的打击乐一字儿排开，丝竹之类的弦乐有条不紊地布置，钟、鼓铿锵，管弦和鸣。宫、商、角、徵、羽五声高扬，极尽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律之妙，歌颂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跳起《八佾》舞，尧舜的《韶》、周武王的《武》乐都演奏到了，远古的音乐也都完全得以展示。四夷的音乐作为间奏，汉朝的恩德所施及的地方，北方的《佺》、东方的《佻》、西方的《兜离》等音乐，没有不具备的。千万种音乐都演奏完了，一百种仪礼都进行完毕，皇上欣然自得，群臣都醉了，天降下了祥和阴阳二气，调和了人的精神，然后撞钟宣告宴会结束，文武百官于是退下。

这时候圣明的皇上看见了四面八方的欢娱景象，（他们）长期沐浴着大汉的恩泽，害怕他们将萌动侈情之心，而荒怠了耕作，就重申旧的典章，下达圣明的诏书，命各主管部门，颁布规定，明确节俭的要求，说明节俭的重要性。皇上去掉了后宫华丽的装饰，减少了自己车乘的御者，清除了多余的工商业，兴盛农垦这一首要的事

业。这样一来就使得海内各地的人都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了。女人学习纺织缝衽，男人从事耕耘，用具使用陶器，衣服穿白、黑色，以穿纤巧华靡的衣服为耻而不穿（这种衣服），以奇特美丽为低贱而不看重（这些东西），把金子抛弃到山里，把宝珠扔进深渊。这样一来，百姓们洗心革面镜子就自然照不出瑕秽，形与神都安定下来，耳朵和眼睛都不寻求新鲜的东西，过份欲望产生的根本原因消灭了，廉正之心就产生了，没有不悠哉游哉自得其乐，面色发出仁者玉一般地光润，声音都似有德者那样清朗。所以四海之内，郡国、县道的学校如林，乡村的小学学生盈门，大家相互不断劝酒，盛置肉的几、盘摆得到处都是，下面跳着舞，上面唱着歌，歌唱舞蹈德和仁。出席私宴的礼节，进行完毕之后，就相互感叹自然无为的素质，美好的言辞弘大的道理，都充满了平和而流露出满足，歌颂说“繁荣昌盛呵这个时代”！

现在议论的人只知道诵读虞夏时代的《尚书》，吟咏殷周时代的《诗经》，讲解伏羲、文王的《易经》，论说孔子的《春秋》，很少能通古今的善恶，了解大汉朝德行的来由。只有先生您颇理解过去的典章，但又徒然在诸子之间驰骋。温故知新已经是很难的事，而能够知道德行的人就更少了！而且远远地以西戎为界，四面都有险阻，修构四面的山关，哪里比得过处在国土的中间，平坦洞达，万方如辐之凑于毂呢？秦岭、九峻山，泾水和渭水这样的河山，哪里能比得上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渎和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嵩山五岳，以黄河

为带溯洛水而处，是出“图”和“书”的水渊呢？建章宫、甘泉宫，设台进御诸仙，哪一个能比过灵台、明堂那样统和天人呢？太掖池、昆明池，充满鸟兽的苑囿，哪里像广阔的陆地面临大海，那样的富有道德呢？游侠奢侈，犯义侵礼，哪里比得上都遵守法度，恭恭敬敬、互尊自重呢？先生徒然晓得秦朝的阿房宫高入云天，而不知东京洛阳已有建都的规模；只知道函谷可以立关，而不知为王的人是不分内外的。”

东都主人的话还没说完，西都宾惊奇地望着东都主人连脸色都变了。他徘徊下阶，恐惧得没有生气，拱起手想说点什么。东都主人说：“请您回到座位上坐下呢。现在我将告诉您五篇诗歌。”

西都宾听完了这五篇诗作，就称赞说：“真美啊这些诗！它们的含义比杨雄的赋更合乎道义，比司马相如的赋更符合事实，这不仅得力于东都主人您的好学，大约也是因为遇上了这个时代吧。我太粗陋薄学，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判断是非，既然听到了先生你听说的正确的道义，请允许我终身吟诵这些诗篇。”这些诗篇是：

《明堂诗》：“光辉的时堂，明堂宽敞明亮；它是神圣的祭祀的地方，庄严肃穆灿烂辉煌。上帝在这里享宴，五帝在这里按方位享受祭祀，谁人来配祭？他就是世祖光武帝。普天之下率土之宾，都各人按照自己的身份前来助祭；美好恭敬熙熙攘攘，求来了大福大吉。”

《辟雍诗》：“在辟雍中荡舟，辟雍中的水欢快地

跳荡；神圣的皇上莅临这里，用船架起了浮桥。白发苍苍的老人，皇上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父兄；堂堂皇上的威仪，孝敬友待他们，这种行为真是磊落光明。上古立德的贤圣之人呵，您的德行在我们汉朝得到了贯彻遵行；改造这个世界只有依靠神灵的威力，永远显示着这些伟大的成就。”

《灵台诗》：“策划建筑灵台，把它建筑得又大又高。皇上勤劳按时登临，在这里考察美好的征验，日月星辰洒下了光明，阴阳五行合恰地运行；清风习习，细雨飘洒。百谷茁壮，庄稼繁茂；连年丰收，皇上真是有才有智！”

《宝鼎诗》：“三山五岳都准备贡献啊河川献出了珍宝，吐射出金光啊映照着天上的浮云。宝鼎出现在人世间呵色彩斑斓陆离，闪耀着光芒呵通体雕刻的龙纹。安置在祖庙的宝鼎啊享受着神圣的祭祀，发扬光大神灵的威德啊亿万年。”

《白雉诗》：“开启了《洛书》呵打开了祥瑞的《河图》，获得了白雉啊献出了素鸟。展开了洁白的翅膀呵翘尾奋飞，体态明洁呵精淳神清。宣扬皇上的德行呵跟当年周成王一样，永远保有天下啊享受上天的庆祝。”

后来遇上了爱好文章的汉章帝，班固就更加得到宠信，多次到皇宫中给皇上读书，有时候甚至连续几天几夜。每次皇上巡视外地，他就献上赋、颂。朝廷有重大的事情议论，皇上让他诘问公卿，在皇上面前展开辩论，对班固的赏赐恩宠

很厚。班固自以为有两代人的学问才识积累，而官位超不过郎官，对东方朔、杨雄对自己的议论很有感触，悔恨自己没遇上苏秦、张仪、范雎、蔡泽所处的时代，于是作了《宾戏》以自荐。后来升任班固做了玄武门的司马官。皇上与诸儒生讲论《五经》，班固作了《白虎通德论》，皇上又命令他把当时讨论的情况撰写成文。

当时北单于派遣使臣前来贡献，请求与汉朝和亲，皇上诏问群臣。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匈奴是善于欺骗狡猾的国家，没有归服汉朝的心意，只是畏惧汉朝的威望，被南匈奴追逼，所以希望汉朝回访（借助汉朝）来安定他们众叛亲离的局面。现在我们如派遣使臣前去，恐怕会失去南匈奴亲附我们的友好，而助成了北匈奴（狐假虎威）的奸诈之计，不能与北匈奴和亲。”班固议论说：“我个人考虑，自从汉朝兴起以来，旷世历年，军事上都与夷狄纠缠，尤其是与匈奴之间的事最多。安抚、防御的方法，手段不一样，或者用政治手段与他们讲和，或者用武力征讨他们，或者卑下地迁就他们，或者他们臣服汉朝。虽然屈伸没有一定的情况，原因因时而异，但是没有拒绝与他们的往来而放任他们、不与他们交接的。所以自从光武一朝开始，就重新整顿原有的典制，多次派出使者，以至使者前后相继，一直到光武帝后期，才开始暂时地断绝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永平八年，又重新议论与他们通好。当时在朝廷上争论了好几天，不同意见杂然纷陈，多持与匈奴通好困难的意见，很少说与他们结好的容易的一方面。先帝（汉明帝）圣明，高瞻远瞩，于是又派出使者，与匈奴的关系恢复到跟从前一样了。以此推知，没有一世放弃而不发展与

匈奴关系的。现在乌桓国来朝，向翻译官稽首；康居、月氏，自远而来；匈奴分崩离析；有名的国王来降服，（西、北、南）三主的人都前来归服，都是在没有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出现了，这实在是国家与神相交通的自然的征验呵。臣愚蠢地认为应该依照过去的成例，再派使者去匈奴，这样从远处说可以继承五凤、甘露年间接待远方归服之人的精神，从近处讲不抛弃建武、永平年间实行羁縻政策的意义。外族使者来两次，我们派使者去一次，既可以说明中国是以忠、信为主的，又可以使他们知道圣明的汉朝礼义是有一定的，岂可叛背、狡猾、辜负了我们的好意呢？不与匈奴往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与他们通好我没有听说什么害处。假若北匈奴稍微强大，能够兴风作浪，那时候再寻求与他们通好，哪里来得及呢？不如借助现在的情势施予恩惠，从眼前和长远来制订对待他们的策略。”

班固又作了《典引篇》，叙述汉朝的德属继承。他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赋》，文字虽然绮丽但体裁没有什么根据，杨雄的《美新赋》，文体虽然有所根据但事实虚伪，大约是他自己以为达到了各方面的最高成就。《典引篇》说：

混沌之气处于原始状况，阴阳就开始划分出来了，阴阳之气升腾缭绕，有的下沉而变得混浊，有的上浮而变得清新。下沉的和上浮的相互交错，就形成了万物。于是才开始任命天子，（木、火、金、土、水）五德才开始运行，都是处于草创暗昧的状态，处在幽玄混沌之中。结绳记事和有文字记载之前，寂寥而无文诰，是因为《易·系辞》不可能得到以留传下来。那时候有氏号，继天

开陈于后，莫不以太昊（庖羲氏）为帝王的开端，所以关于遥远的上古的书籍，还是可以进行修纂的。黄帝以后的时代，虽通变神化，（但因缺乏记载，所以）蕴涵的光辉还没被宣扬开来。

假若从上稽考天的原则，往下根据稷、契等为尧的羽翼的事实，从《尧典》、《皋陶谟》看，为道德之冠首，踪迹之卓异者，没有比陶唐氏更高的了。陶唐舍其胤子丹朱而禅让给有虞氏，有虞氏也舍其子商均而禅让给夏禹，稷、契在尧、舜之朝广立事功，于是成就了其子孙汤，武的事业。他们重大的影响支持了周朝的事业，上天于是归功尧，又将授刘汉以帝位。上天使刘汉皇朝继承三王的丧败，把它置于《易》上所说的“亢龙有悔”的灾难之中，日月暗淡无光运行失常，美好的伦理衰落而原有的典章制度缺乏。所以上天先就命令玄圣孔子，让他缀学而为汉家建立法制，发扬信义光大事业，表彰刘家的祖宗，赞扬蹈履哲智之君，一切都具备了显得那么光辉灿烂，真是神明所制定的法则呵。虽然皋陶、夔、伊尹、周公等慎密的辅佐，比起孔子来都算不上什么了。所以高祖、光武帝二位圣明的皇上，像北斗星一样居于自己的位置，高祖聚彤云于砀山，光武发佳气于白水。（高祖、光武帝）像雄鸡一样还未振翅，天下英雄就纷纷而起，海内就云蒸霞涌，雷鸣电闪，胡亥自缢、王莽就被杀死了，高祖、光武帝甚至用不着亲自动手。然后他们敬顺天地，礼待诸侯，在即帝位之前，都有己德不能嗣成帝功的谦言，有此渊深穆敬的礼让，而没有号令陈师、

敦迫奋武麾旄的态度。这原因就是：汉朝是理所当然的正统，接受了尧的归运，蓄积了火德的精气，蕴藏着孔子这位辅佐光明正大的期望。

大汉朝如此的美德，可以说是五帝时代最光辉的模范，是用不着使用诰和誓的。遍观殷、周二代大大小小的法度，其幽深是可以探知的。他们都从一小块地方发迹，同受侯、甸的封号为诸侯，重世勤民，以方伯身份统领州牧。他们凭借受命得赐赤弓和黄金装饰的斧的威势，讨伐韦、顾、黎、崇等国不来朝的逆行。华夏经多次变动，周武王迁都于镐、商汤迁都于亳，于是以臣下身份，调动如虎、螭般勇猛的军队，革灭了天子之都。所以义士对汤、武的作为感到惊异而认为并不敦厚，周武王的音乐《武》未尽善，商汤的音乐《护》有愧于德，不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吗？然而诗歌中对他们有许多美好的赞叹，有华美谐和节奏鲜明的乐曲将他们颂扬，尊祖严父，宗祀配天于明堂之中，发祯祥以流泽子孙，德配天地，千载以来连绵不绝。岂不是显示出他们的是理所当然的神明吗？(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一定的规矩，周密的言辞著于《诗》、《书》之中，文藻光彩朗明而前后一致。

况且显赫神圣的汉朝，建立在巍峨的唐尧的基础之上，逆流探源，它是孕育于虞夏，造就于殷周，然后发出了高祖、世祖的光芒，继之以太宗（文帝）、代宗（武帝）、中宗（宣帝）、显宗（明帝）的光明。神灵如太阳一样照耀，光辉洒满了大地，仁义的风吹拂到天涯海角，

威武的精神激励着遥远的边区，凶恶者无远而不灭，细微者无论多少也不养。所以升天之功，非尧不能兴；广泛宣传《尧典》对后代子孙的训诫，非汉朝不能弘大。它的原则精神到达了整顿乾坤，稳定日、月、星的正常运行，大到调度天地，小到深入毫芒的程度。万物生育，顺应天理，莫不亨通，这种状况已经由来已久了。

于是三公及百官，都进言说：陛下上以尧的典章为鉴，以祖宗的法则为法测，遵循先辈的轨道行动。躬奉孝道，以深厚的感情和睦兄弟之间关系。巡狩各地抚慰百姓、广泛地施予鳏寡孤独恩惠。祭祀天地山川，恭敬地侍奉群神的礼仪完具无缺。所以凤凰引来了百鸟在门阙聚集，麒麟带领着兽群集中在外圉，温驯的白虎出现在郊外，飞舞的黄龙从沼泽中升起，甘露在夜里洒满了茂盛的草叶，有三只脚的鸟儿在茂密的树林中上下飞翔。。至于嘉谷灵草，奇兽神禽，与瑞图相应与史谍相符，大吉大祥的，每个朝夕都出现在郊野，每天每月都出现在这个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卓绝出众，盈溢到了最荒凉的地区。过去周朝有白雉、朱鸟、黑黍、黄麦的事情出现，君臣都之为动容，左右相随，聚在一起小心翼翼、诚惶诚恐，表现出端庄盛美的仪容。大约是用这样的姿态表明敬畏之心，承受神灵所赐予的福运。并且以光宠文王武王的德行，把它传给后代子孙，继续发扬他们的美德，岂只是为了自己而有自专之辞呢？汉朝理所当然地承继了这一切，也应当时刻不忘他们的期望努力发奋，以充实这一原刚，打开恭馆中用金绳捆着的楨子，拿出东

序中珍藏的秘宝，而进行普遍的占卜。

《河图》、《洛书》确实、明白，是天的智慧；孔子的图书、遗命，是圣人的信任；躬行道德的根本（孝道），是端正人性；逢吉祥之代，当封禅之时，是天子所受的大命。顺从天命以创立制度，稳定人性以协和神灵，报答天、地、人之神所多次给予的福瑞，展开效法唐尧封禅的明文，这件事情重大而允当，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萦绕在皇上的心里。瞻前顾后，（一味推让，）岂不是轻视祖宗而难正天命吗？从远古开始考察，迄于今世，封禅的共有七十四人，其中虽有天下不使其封禅而假为竹素之文者，没有光扬法度而弃其文章而不封禅者，现在轮到了我们为何使其独缺（不封禅）呢！

这时候圣上（章帝）既已倾注精神，全面掌握文化，屡次访求儒者，倾听故老的意见，与他们讨论斟酌道德的渊源，探索仁义的深刻道理，以这样的行动来追求瑞符所显示的前景的完善。既听从各诸侯的直言，又根据占卜的兆辞广泛地思考。将要延续万代，宏扬光辉，振奋博大的火德，激发以往的遗风，传播浓烈的芳香，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深沉浩荡的上天的大法，谁能使它完美无缺地施行呢？只有唐尧呵，只有大汉呵！

班固后来因为母亲的丧事而离职。永元初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班固为中护军，并参予议事。北单于听到汉军出征的消息，派遣使者叩访居延塞，想如像过去呼韩邪一样与汉朝修好，朝见天子，请求汉朝派使臣。窦宪派遣班固代行中郎将的权力，率领数百名骑兵与匈奴使者一起出居延

塞迎接北匈奴单于。正遇上南匈奴击破了北匈奴的王庭，班固到了私渠海，听到了这一匈奴战乱的消息，就带领众人回到了塞内。到后来窦宪战败了，班固因连坐最先免去了官职。

班固对他的手下人不加管教，他的手下人不遵守法度，小吏们感到很恼火。当初，洛阳令种兢在路上行走，班固的家奴扰乱种兢的车辆马匹，小吏持椎大声向他呼喊。班固的家奴借酒醉而叫骂，种兢大怒。只是因为畏惧窦宪而不敢发作，只好怀恨在心。到窦宪的宾客都遭到逮捕审问时，种兢因为旧恨而抓了班固并把他关了起来，班固于是死在了监狱之中。他死的那年有六十一岁。皇上下诏谴责种兢，种兢处罚了主其事的小吏而唐塞过去了。

班固所著的《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作品，留下来的共有四十篇。

(赖长扬 译)

【原文】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事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蛄，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躋

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逾矩，盖清庙之光辉，当世之俊颜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宜令考绩，以参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艺，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己”。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讖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濬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实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

“唯唯。”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实惟作京。于是睠秦领，瞰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阊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城，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吉里，遄萃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兰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峻，陪以甘

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锄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棗。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璚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焰朗以景彰。于是左城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闥洞开，列钟虞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闕，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殫论。增槃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唯所息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迴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钜切，玉阶彤庭，硳礧采致，琳琅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

颯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左。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虎贲赍衣，阍尹阍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涂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徂长乐，陵塏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栝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汤而出馭娑，洞欀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僛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襦褌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怵怵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徯而不见阳。排飞阁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后太液，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嵒嵒，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嵬，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

之金茎，軼埃壙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匪吾人之所宁。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阍，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群分，部曲有署。罟罔连紃，笼山络野，列卒周币，星罗云布。于是乘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镐，历上兰，六师发胄，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期门饮飞，列刃钻铍，要踪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无单杀，中必叠双，飏飏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僂狡，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狹师豹，拖熊螭，顿犀犛，曳豪黑，超迴壑，越峻崖，蹶巉岩，钜石隤，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厌，兽相枕藉。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飧，腾酒车而斟酌，割鲜野食，举燧命爵。飧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鸾，容与裴回，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崖，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茝发色，晔晔猗猗，若摘锦布绣，烛耀乎其陂。玄鹤白

鹭，黄鹄鵙鹳，鸬鵉鸂鶒，鳧鸥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沈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钱总路，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櫂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薈厉天，鸟群翔，鱼阙渊。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骛，俛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领，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畝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若臣者，徒观迹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

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原也，旧布衣以登皇极，由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顾耀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监乎太清，以变子之或志。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郭罔遗室，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

契已来未之或纪也。故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都建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理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虑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

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予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路，尊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鹑，义合乎灵囿。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

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驹虞》，览《四骥》，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舆乃出。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飒洒，和鸾玲珑，天官景从，褱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铤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焰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骛，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溲，北动幽崖，南跃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訾水慄，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大牢飧。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锵，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闲奏，德广所及，《佺》、《侏》、《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

暨，皇欢浹，群臣醉，降烟燼，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

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赋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飨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说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载乎斯世’！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领九峻，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慄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喻子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诵之。”其诗曰：

《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

《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鸿化惟神，永观厥成。

《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宝鼎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纍，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翹英，容絜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

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

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议者或认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惮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以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伸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

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其辞曰：

太极之原，两仪始分，烟烟燼燼，有沈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喻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

初之首，上哉琮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敎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虽前圣皋、夔、衡、旦密勿之辅，此兹褊矣。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燁，胡缙莽分，不莅其诛。然后钦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勃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仪，诰誓所不及已。铺观二代洪纤之度，其蹟可探也。并开迹于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统牧。乘其命赐彤弧黄戚之威，用讨韦、顾、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是故义士伟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惭德，不其然与？然犹于穆猗那，翕纯皦绎，以崇严祖考，殷荐宗祀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载。岂不克自神明哉？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泝测其源，乃先孕虞育

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凤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愚亡迴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顾。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混元，内浸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乃始虔巩劳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去优慎，无乃憊欤！

于是三事岳牧之僚，僉尔而进曰：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府蹈宗轨。躬奉天经，惇睦辩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怀保鰥寡之惠浹。燔瘞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圉，扰缙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谶，究祥极瑞者，朝夕甸牧，日月邦畿，卓萃乎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乌、玄柜、黄麦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亦以宠灵文武，貽燕后昆，覆以懿铄，岂其为身而有颡辞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慙旅力，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滕，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

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

寐次于圣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惮敕天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遗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

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艺文，屡访群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说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緋万嗣，炀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

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尊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荀悦传

——《后汉书》卷六二

【说明】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颖阴（河南许昌）人，是东汉末年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家。他受汉献帝之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始，以编年体的形式改编《汉书》，成《汉纪》三十卷，分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二十纪，而将王莽之事附于平帝纪后，共叙事二百三十二年。《汉纪》取材虽不出《汉书》，但在史书的写法上有所创新。它采取了“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的方法，按年、时、月、日的顺序叙述重大事件和相关人物，并取便将与其相类而无时间可考的政事、人物、典制等史事分系于后，从而扩充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范围、增强了条理性。《汉纪》的指导思想，就是本传中所说的“立典”的“五志”。以此为圭臬，荀悦从《汉书》中将有关内容纳入了《汉纪》，“综往昭来”，“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汉纪》因其事简约和特有的叙事角度受到后人重视，“历代褒之，有逾纪传”（《史通·二体》）。

荀悦字仲豫，是荀俭之子。荀俭很早就去世了。荀悦十二岁的时候，就能讲解《春秋》。因为家里贫穷没有书籍，荀悦每次到别人家中去，只要是他看见的文章，读一遍就能背诵。荀悦性格稳重，姿容美好，尤其喜欢著述。

汉灵帝时宦官专权，读书人多不做官甘居贫穷，荀悦就托病隐居，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了解他的，只有他的叔伯兄弟荀爽特别称赞敬重他。当初荀悦被辟召在镇东将军曹操府中，升任黄门侍郎。汉献帝很喜欢文学，荀悦与荀爽及少府孔融在宫中给献帝讲授经书，早晚谈论，（得到献帝的宠信，）逐渐升官为秘书监、侍中。

当时政权已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只好以严肃的态度约束自己而已。荀悦想谏言进谏，但是他的计谋都没得到采用，于是作了《申鉴》五篇。《申鉴》所论述的，是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写成之后，上奏献帝。《申鉴》的大概意思是：

道的根本，只是仁和义两者而已。五典阐明了它的纲领，其它的书籍又从多方面加以辅助性的说明，咏颂它、歌唱它，演奏它、舞蹈它，使以前的鉴戒得到了明了，后来者又重申它。所以古代的圣王对于仁义，只是反复说明它的重要性而已。

从事政治的方法，应当先阻绝“四患”，再推崇“五政”。

（所谓“四患”，）第一是“伪”，第二是“私”，第三是“和”，第四是“奢”。“伪”会扰乱习俗，“私”会破坏法律，“放”会导致越轨行为，“奢”会败坏制度。这“四患”不消除，政治上的腐败就会得以流行了。习俗混

乱了道就会荒废,虽然是天地也保护不住自己的秉性;法律破坏了社会就会倾颓,虽然是君主也掌握不住尺度;越轨就会造成礼的消亡,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原则;制度败坏了人欲就会放纵,虽然以四海之外的广大也满足不了这些欲望的要求。所以(“伪”、“私”、“放”、“奢”)叫“四患”。

振兴农业以维持(百姓)生活,辨别好恶以正风俗,宣扬文教以提倡文明,建立武装以执掌权威,明示赏罚以统领法律,这就叫“五政”。

人不畏死,就不能够用治罪来使他们惧怕。人不愿再活下去,就不能够用善来鼓励他。(在这些情况下,)虽然使契来推行五教,皋陶作为士,政治也实行不了。所以在上的人应先使人们的财产丰足让他们有一定的追求,皇帝耕籍田,皇后在蚕宫养蚕,(劝民乐业安生,)这样才会使全国没有闲逛的人,田野上没有荒芜的土地,人们就能自给自足;政府不轻易征发力役,以成全人们各自的事业,这就叫做“养生”。

君子所以能感动天地,响应神明,理正万物而协助成就帝王的教化大业,就在于他们确定了正确的标准罢了。所以在上的人要审定美与丑,区别善与恶的关键在于看是功是罪,分辨诽谤或者是赞誉要看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对听到的话都要用事实加以检验,对人的毁誉都要用实际情况加以考察,不要被欺诈虚伪的情况所迷惑,(不然就会)使人心混乱。所以对事要无不加以审验,对事物要无不加以检测,对善事要无不加以推崇,对恶

行要无不拿出示众，这样，民间就不会有奸怪产生，而百姓就不会有淫乱的作风了。百姓们从上自下都看到各种利害都与自己有关，所以才能使自己的心严肃恭敬，谨慎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对内不迷惑，对外没有特别的欲望，那么人们的追求就平和了。这就叫做“正俗。”

君子是根据感情来任用的，小人是用刑罚来驱使的。荣辱，是赏罚的精华所在。所以礼教人知荣辱，施加在君子身上，是为了升华他们的感情；桎梏鞭扑，施加在小人身上，是为了叫他们懂得刑罚。君子连侮辱都不愿承受，何况是刑罚呢！小人连刑罚都不忌讳，何况是一般的侮辱呢！假若废弃教化，就会把（处于小人与君子之间的）中人推入小人范围内；推行教化，就会引导中人走上君子的道路。这就叫做“章化”。

小人的情况就是放松了他们，他们就会骄傲，骄傲了就会放纵，放纵了就会埋怨，有了埋怨就会背叛；危急了就会谋乱，平静下来就又会有更多想法，不用威强的暴力就无法整治他们。所以在上的人，必须有武备，以预防不测的事情发生，以遏止强盗的暴虐行为。天下太平时就用行政进行管理，有事情发生就使用军事力量进行镇压。这就叫做“秉威”。

赏罚，是政治的要领。大张旗鼓地赏赐，毫不犹豫地惩罚，经过调查研究核实情况，谨慎地发布命令，用赏赐鼓励人们从善，用惩罚来打击罪恶。君主不轻易赏赐，并不仅仅是爱惜财物，还因为轻意赏赐收不到鼓励人们从善的效果。君主不随便惩罚，并不是同情（应受

惩罚的)那些人,还因为随便惩罚达不到打击罪恶的目的。赏赐收不到鼓励人们从善的效果,就阻绝了向善,惩罚达不到打击罪恶的目的就是纵容罪恶。在上的人能够不阻绝下面的人从善,不纵容下面的为恶,国家的法令就会树立起来了。这就叫做“统法”。

“四患”既然消除,“五政”又建立起来,用诚挚之心来推行它,下决心来坚持它,宽松而不怠惰,疏朗而又没遗漏,以无为来达到有为,使各自产生作用;以无事来做到成事,使各自达到目的。不严肃而获得成功,不苛厉而天下归于文明,君主位尊而臣下有礼,那么海内就太平了。这就是从事政治的方法。

荀悦又说:

“好的君主都不因循古制,舜帝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尧,是陶唐时代的典章。用占卜来确定出嫁,是商朝帝乙时代的制度。天王的女儿下嫁齐国,是宗周时代的礼法。阴凌驾于阳违背天道,妇人压倒丈夫违背人伦。违背天道不祥,违背人伦不义。还有,古代天子,诸侯有国家大事必要告于庙。在朝廷中两种史官,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事件。记载事件的就是《春秋》,记录言论的就是《尚书》。君王有举动就一定有记载,无论善恶成败,没有不保存下来的。就是下面的一般士人百姓,如果有特别突出的事情,也都有记载。有的人想得到传扬而得不到,有的人想隐匿却反而很出名。在一个朝代的得失,却是千秋万代的荣辱。善人相互用以作为鼓励,有罪的人则感到害怕。现在应当完备史官制度,使他们掌

握文书，记载人物的行为和国家大事。每年年终，（把这些记载）上报尚书，以帮助更恰当地进行赏罚，以弘扬法令教化。

汉献帝看了荀悦的《申鉴》，觉得说得很好。

汉献帝喜欢读书，常常感到班固的《汉书》文字太多难以把握，于是就命令荀悦按照《左氏春秋》的编年体例编成了《汉纪》三十篇；汉献帝下诏尚书省供应荀悦所用的纸笔。《汉纪》文字简约，议论多数允当。

荀悦的《序》说：“以往的圣人，一心建立帝王治世的要道，以天为经以地为纬，观察自然现象而加以效法，于是发明了文字，以通宇宙，并在王庭加以宣扬，它的作用很大。先王发扬光大了这一事业，广施于中国四方。其后遵而不改，永远把它作为法则。建立法则有五个目的，第一是阐明道义，第二是为了申明法规，第三是为了疏通古今，第四是为了宣扬功勋，第五是为了表彰贤能。这样，天人之间的关系，处置事物的恰当办法，就灿然明白，没有不具备的了。社会遵循这一道路，不使这一事业衰颓，损益盈虚，随时加以修正，称赞和批评虽然不同，道理都是一个。汉朝开国已有四百零六年了，拨乱反正，振武兴文，一直遵循祖宗的建业大计，希望光照万代。现在圣上庄严肃穆，一心提倡文化，瞻前顾后，阐明崇尚治国大道，命令建立国家的法则。于是我根据以往史书的记叙，编纂了《汉纪》。光武中兴以前明君贤臣得失的线索，也足以明了了。

荀悦又著有《崇德》、《正论》和多种论文数十篇。他活了六十二岁，建安十四年去世。

（赖长扬 译）

【原文】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牋，一览多能诵记。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

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瑛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瑛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

财不费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

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

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言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班彪传

——《后汉书》卷七〇

【说明】班彪（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东汉初，因病免官后全力从事文学研究和著述。他认为褚少孙、刘向、刘歆、杨雄等人对《史记》的续补水平太低，不足以承继前史；而杨雄、刘歆等在续作中多褒美伪新，恐其误后惑众，所以他采集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百余篇。今《后传》虽不存，但其内容大部分被《汉书》所吸收，现在《汉书》中的元、成二帝本纪和韦贤、翟方进等传中还保留有《后传》原文的痕迹。《后传》为《汉书》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班彪对前史的得失写过一篇评论，后人称为《前史得失论》。它表明了班彪对有史官以来直到《史记》一系列历史著作的看法，显示了他正统的儒家思想。因为这篇文章最早按时间线索勾勒出了我国早期文学的状况，并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所以它是我国第一个史学史的提纲，其批评原则和一些具体意见对后代史学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

尉。父要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班彪生性深沉庄重，受好学习古书。二十多岁时，更始皇帝刘玄兵败，长安及周围左冯翊，右扶风地区混乱不堪。当时隗嚣在天水聚集百姓，班彪于是为避难跟随了他。隗嚣问班彪：“过去东周灭亡，列国共同争夺霸权，天下分裂，几百年才平定下来。是不是合纵连横的事情在今天又重新出现了？会不会有承受时运，纷纷兴起，最后总归于一人的情况？希望先生试论一下。”班彪回答说：“周朝的废兴，与汉的情况很不一样。过去，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各诸侯从事政事，这样国家政权的根基就很微弱，而枝叶却很强壮，所以在周朝末年就会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这是形势命运所必然的。汉代接用秦朝的制度，改立郡县制，主上有独揽一切的权威，大臣们却没有能掌握百年的权力。到了成帝时期，凭借外戚来管理国政，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促，这三帝都没有接续皇位的继承人，所以王氏能够专擅朝政，并顺势窃夺号位。危机起于朝廷，并未伤及百姓。所以自王莽正式即皇位之后，天下百姓没有不为汉朝中衰叹息，并殷切盼望复兴的。十多年间，朝内的、外的，远处的、近处的动荡骚乱，全都出现了，假借号令，四处聚集，全都称自己是刘氏后裔，没有预谋却说法一样。如今统领州郡的英雄豪杰，都没有七国诸侯那样有世代功业的资本，而百姓的讴歌吟颂中，都思念敬慕汉皇的恩德，天下的形势据此便已经可以看出了。”隗嚣：“先生所谈周朝、汉代的形势还是对的；至于仅仅看到那些愚蠢的人沿用刘氏姓号做标志的缘故，便说刘汉能够复兴，则远离实际了。过去秦国失去帝位，刘季追逐并夺取了它，那时的

人也知道有汉朝吗?”

班彪既厌恶隗嚣的言论，又忧虑当时国情的险恶，于是作《王命论》，认为汉是接继尧德，有神灵天命所示的符瑞，帝王建立王位，并不是使用权谋和暴力的结果，试图以此说动他，但隗嚣始终不醒悟，于是班彪就到河西躲避去了。河西大将军窦融让他做自己的从事，非常敬仰地对待他，并建立起老师和朋友的友谊。班彪于是对窦融奉卫汉朝出谋划策，让他统管西河一带以抗拒隗嚣。

后来窦融奉命回到京师，光武帝问他：“你所交来的章表奏疏，有谁参与了策划和书写？”窦融回答说：“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光武帝平素已耳闻班彪的才华，于是召他进京，推举为司隶茂才，任命为徐县县令，因为有病而免去官职。此后，他多次执行三公给予的命令，事情办完后，就离职回家。

班彪才华杰出，又爱好著述，于是一心一意于史籍的攻读、研究。汉武帝时，司马迁著的《史记》从太初年以后的事，都没有记载。后来有许多喜欢撰述历史的人纷纷搜录记载时事，但大多鄙陋浅俗，不能够作为《史记》的续篇。班彪于是继续采集以前史籍中的关于西汉历史的史料，旁征博引，征引多种材料，撰写《后传》几十篇，顺便又研核以前的史籍，批评失误，肯定成绩。他的评论大体上说：

唐虞三代，《诗》、《书》所涉及到的，世代都有史官，来掌管典籍。至于诸侯，每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所以《孟子》中说：“楚国的《杗机》，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它们都同样是记载时事的。”定公、哀公之际，鲁国的君子左丘明集合讨论这些著作，作《左氏传》三

十篇，又收集和《左传》相同或不相同的记载，撰为一书，称《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以后，《乘》、《杻机》记载的事情便湮灭无闻了，而仅有《左氏》、《国语》彰显天下。又有一部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史事的书，叫《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以后，七国争夺霸主，秦国最后统一了诸侯，于是又出现了《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建国，平定天下，太史大夫陆贾记述当时的功业，作《楚汉春秋》九篇。汉武帝的时候，太史令司马迁采录《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之际各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十篇后来散佚了。司马迁的记载，从汉代建元至武帝止是他的功绩所在。至于采摭经传，分别保留其它多家史籍记述的事情，则有很多疏阔缺漏之处，不如原书，他一心只想以广泛地记录各种传闻、逸事为此书的优势，评议则肤浅不实。讨论学术，则崇尚黄老之学而不看重《五经》之说；记述经济活动，则轻视仁义道德而以贫贱为耻辱；记述游侠，则以守节为低贱，而尊重功利，这些都是损害原则的大错误，是他遭遇极刑惩罚的原因所在。但司马迁善于条理，叙述史事，讲道理而不浮华，记事属实却不粗俗，文字与内容协调，这是良史之才啊！倘若司马迁能够依凭《五经》的准则，与圣人同是非，想来就差不多了吧。

过去的许多著述，还是值得效法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

是现在得以知道古代，后世得以了解前世的根据，是圣人闻知天大事的耳目。司马迁记载帝王的叫本纪，记载公侯世袭的叫世家，记载卿、士及杰出人物的叫列传。《史记》提高项羽、陈涉的地位，却贬低淮南王、衡山王这些皇室成员的地位，详细地记录项羽、陈涉的兴衰始末，这种体例就不符合原则。像司马迁《史记》这样的著作，采古今史事，贯通经传的记载，非常广博。司马迁以一个人的精力，要著的书籍却是文字繁多，线索纷乱，所以《史记》有修改不完全的地方，还有一些多余的词句，体例、文字多不够整齐划一。比如他叙述司马相，写出他所属的郡县，写出司马相如的字，对于萧何、曹参、陈平这些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就不再记载他们的字，有的只记县而不记郡，这大约是来不及统一文字所致。现在我著的《后篇》，谨慎地核对史实，文字整齐划一，不作世家，只作本纪、列传。传上说：“编纂史书，要简炼到不能再简炼的程度，按照事情的实际情况朴实地叙述，这就是《春秋》的指导思想。”

班彪再次被征辟到司徒玉况的府内担任职务。当时东宫刚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始分封，但官未完备，师保多数空缺。班彪于是上书说：

孔子说“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差很远”。贾谊认为“习惯与善人住在一起，就不能不做善事，犹如生长在齐国，就不能没有齐的方言一样。习惯与恶人住在一起，就不能不做恶事，犹如生长在楚国，不能没有楚的方言一样”。所以圣人要仔细观察和他居住在一

起的人，而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习惯。过去周成王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出则有周公、邵公、太史佚等人伴随，入则有大颠、闾夭、南宫括、散宜生等人环绕，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的人，所以周成王一旦即位，天下就旷然太平。因此《春秋》有这样的话：“爱护儿子就教他为义的方法，不要让他被邪气所困扰。骄奢淫佚，这些都是他自身产生的邪恶。”《诗》中说：“留给孙子以善谋，以安敬之道为儿子增加才能。”说的是周武王将自己的谋略留给了子孙。

汉朝兴起之后，文帝让晁错用法家的理论教导太子，贾谊用《诗经》、《尚书》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命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训导东宫以下的子弟，没有不崇敬这些人而备德成器的。现在皇太子和诸侯王虽然从小就开始学习，进修礼乐，但傅相没有贤才担任，官属没按旧的制度配备完整。应当广泛地选择有威信、稳重又通晓政事的名儒，让他们担任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把官属配备完整。又按照原有的制度，太子有十个县的赋税作为汤沐的用费，住地有兵严密防卫，太子五天朝见一次皇上，坐在东厢房，省视供给皇上的膳食，不是朝见皇上的那几天，只是要派太子仆、中允每天早上去皇上那里问安，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不轻慢、增加太子的敬意。

书谏上奏之后，皇上采纳了这些意见。后来，司徒玉况因为班彪廉洁而推荐他，班彪担任了望都长，受到官吏和民众的喜爱。建武三十年，班彪五十二岁，死在望都任上。他

所写的赋、论、书、记、奏共有九篇。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固，一个名超。

议论说：班彪以他博通儒学的上等才能，倾侧在危乱之间，行动不超越原则，言谈不丧失正理，做官不争于升迁，作风正派又不违背人意，铺陈自己的文彩以完善国家制度，恪守低贱菲薄但没有苦闷的容颜。他是认为皇朝还没兴旺发达，自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贱”，怎么会感到耻辱呢？班彪为固守原则而恬淡是多么真诚啊！

【原文】

（任宝菊 译）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羈之，时人复知汉乎？”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著《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年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以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杻机》，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杻机》之事遂闕，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

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彪复辟司徒王允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闾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

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媢黷，广其敬也。

书奏，帝纳之。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

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杜预传

——《晋书》卷三四

【说明】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博通古今。西晋时，与贾充等制定律令，并作注解。历任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奏立籍田、兴常平仓、制定课调等。咸宁四年（278），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至镇修缮甲兵，打败吴名将张政。次年，两次上表要求伐吴。太康元年（280），统兵西上，攻克江陵。又沿江而下，进入秣陵。以平吴功，进封当阳县侯。多谋略，有“杜武库”之称。立功之后，耽思经籍。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盟会图》、《女记赞》等。自称有“《左传》癖”，其《集解》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左传》注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杜预，字元凯，是京兆杜陵人。祖父杜畿，为三国时魏国的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任幽州刺史。杜预学问广博，通晓历史上兴亡成败的道理，常说：“立德，我难以达到，立功立言，我有可能达到。”最初，他的父亲因与宣帝司马懿不和，结果被关在监狱中而死，因此之故，杜预久久不能入仕。

文帝司马昭承袭其兄官位，杜预娶了文帝的妹妹高陆公主，开始做官为尚书郎，继承祖父的爵位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官为参相府军事。钟会征伐蜀汉，任杜预为镇西长史。后钟会谋反，他的部属大多牵连被杀，只有杜预靠自己的聪明而没有受到处罚，还增加封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法律，完成后，杜预作了注解，杜上奏朝廷时说：“法律，这是判断罪恶的标准，就像木匠用的绳墨，不是穷理尽性的书。因此文字简炼而事例明白，判断省便而禁律简要。事例明白就使人们容易理解，禁律简要则使人难于违犯。容易理解则人们知道怎样避免，难于违犯则刑具就可以少用。刑法的根本在于简要明白，故而必定经审明名分等级。所谓审明名分等级，就是要去掉非原则性的小道理。古代的刑书，刻在钟鼎上，铸造在金石上，这是为了杜绝异端，不使人钻空子。现今所注释的法律，都综合了法律的根本原则，并贯串了等级名分。这样，能使用的人按照名分事例来判明取舍，伸长法律的是非标准，杜绝断章取义。”皇帝下诏把新的律令颁行于全国。

泰始年间，任河南尹。杜预因京师是朝廷推行教化的中心。从近到远，凡所发布的政令和喻示，务必提倡教化的主要内容。他接受诏命起草官吏考核升降的程式，其主要内容说：“臣下听说上古的政治，遵循自然之理，由于谦虚诚恳，就能互相信任，下级顺从上级；由于心灵相通，神灵也被感动，故能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到后来淳朴的风气渐渐消失，表彰好的，揭露坏的，设官分职，颁行封爵俸禄，宣扬太宰职掌的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即所谓六典，来

详细考察官吏各个方面。然而还要依赖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来辅弼，建立考核、监督忠贞的机关，使得美名不超过他的实际功劳，有功劳的人不会被排挤而无名声，全都广泛地征求意见，然后形成文字。待到了近代，不能象远古一样淳朴，而追求近世的考察细微末节，心中有疑惑，就相信所见所闻，怀疑所见所闻又相信书信汇报。汇报的书信越多，弄虚作假也愈多，法令愈多，投机取巧和掩饰的事也越多。从前汉代的刺史，也是年终奏事，不制定详细考核官吏的条文，但能大体上区别官吏的清和浊。曹魏时的考课，是汉代京房的办法，其条文可以说是十分详细。然而由于过分详细反而使它忽视了大的方面，所以历代不能实行。哪里比得上用唐尧的旧法，去密就简，简单易行。揭示事物的规律，洞察它的一切，主要依靠人。如果不依靠人而专门依靠法，就会损伤揭示事物规律。现今核定优劣，不如委任通达事理的官，各自考核他们所管辖部分。任官一年以后，每年推举出优秀的一人为上等，劣差的一人为下等，在皇帝征召时把名字上报。如此经过六年，主管官总结选择，在六年中都评为优秀的人超级提拔，都评为劣差的人免去其官，优多劣少的人继续任用，劣多优少的人降职。现今考课的等级标准，与实际不符，实行起来有难有易。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录取优等，按宽松的标准淘汰劣等，主管官固然应当掌握轻重，但只要稍加变动，也就不能完全符合条文的标准。《己丑诏书》因为考课难成，听用推荐办法。推荐的道理，也是取决于舆论。六年才进行荐举，升降都没有一个渐进过程，这不是古代三次考核才能升降的本意。现在每年一考，则积优等可以升官，积劣等就降

官免官，如果以士君子的心来对待他们，就不会有在六年中六次罢黜清廉有才能的官，六次晋升差劣昏庸的人。临察部门也将会监督弹劾他们。如果出现了上下串通袒护过错，这就将是社会普遍腐败，舆论大坏，升降也就无标准可言了。”

司隶校尉石鉴因过去与杜预有旧仇，在皇帝处告了他的状，使杜预免去了官职。当时少数民族进犯陇右地区，朝廷又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马百匹。杜预到长安，又重新任命为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正当少数民族兵势强盛的时候，当时任安西将军石鉴命杜预出击。杜预提出少数民族乘胜而来，马肥兵强，而官军悬军深入，又很疲乏，应该增集兵力，运积粮草，到春天再进讨，他陈述了五条不可以出击、四条不需出击的理由。石鉴大怒，又奏告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留止县官征聚的供军用的财物，造成军用物资缺乏。朝廷派遣御史用囚车把杜预押送到廷尉。由于杜预娶了公主，按照当时法律上的‘八议’，他可以用侯爵来赎罪。后来陇右的战事发展正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

这时期朝廷大臣都认为杜预长于运筹帷幄，刚好匈奴帅刘猛起兵反西晋，从并州向西进到河东、平阳，皇帝下诏命杜预以散侯身份在宫中制定计划，不久拜官为度支尚书。杜预于是上奏建议设立藉田，安定边境，处理军国大事等要点。他又制作了人力排灌机械，兴建常平仓，确定谷的价格，整理食盐运输，制定税赋，对内有利于国家，对外安定边境的建议共五十余条，都被采纳。石鉴从前线回来，论功行赏不符合实际，被杜预揭发，于是互相更加仇恨，指责争吵，结果同时被免去了官职，杜预仅保留了侯爵兼原来职位。几年

以后，又任度支尚书。

元皇后的灵柩将迁到峻阳陵。按以前的制度，棺材葬下后，皇帝和群臣就可以不再服丧。尚书上奏，皇太子也应该脱下丧服。杜预提议“皇太子应该恢复古制，终三年之丧期”，朝廷同意。

杜预因为历书有误差，不符合日晷刻度，奏上《二元乾度历》，在世间通行。杜预又因为孟津地区渡黄河危险，有覆船的祸患，建议在富平津建河桥。有人认为洛阳地区曾是殷周的都城，历代圣贤没有作桥，其中必有道理。杜预说：“古人说‘造舟为梁’，就是河桥的意思。”桥建成后，武帝和百官们到了桥边视察，武帝举杯对杜预说：“若没有你，此桥不能成功。”杜预答道：“没有陛下的英明，臣也不能施展这小小聪明。”周朝太庙中有一种欹器，注入水后，满则覆，中则正，是置于坐右作警戒用的，到汉代洛阳还放在皇帝御座旁。汉末动乱，此器不再存在，其形制也就失传。杜预把它重新制作出来，奏献给皇帝，皇帝赞叹他的聪明。咸宁四年秋天，大雨不停，蝗虫四起，杜预上书多次陈述对策，如挖开兗、豫州东界诸陂以放水等，具体在《食货志》中。杜预在朝中七年，提出的建议，不可胜数，朝野上下都称赞他，因此有了外号叫“杜武库”，意思是他头脑中无所不有。

这时，武帝心中有灭吴的计划，而朝廷大臣多不同意，只有杜预、羊祜、张华与武帝意见相同。羊祜病重，推举杜预接替自己，因而杜预以原有官职身份假节，行平东将军，兼管征南军司。羊祜死后，杜预拜任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荊州诸军事，给他一辆追锋车以及第二附马称号。杜预到镇后，修

缮铠甲兵器，实行军事演习，挑选精锐部队，袭击吴国西陵督张政，大败吴军，因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张政是吴国名将，占据了要害地方，他因没有准备而战败，感到耻辱，不敢把失败的实情报告孙皓。杜预想离间这位边将和孙皓的关系，就把从战争中俘虏的吴兵退还给孙皓。孙皓果然召见张政，并派武昌监刘宪取代张政。所以后来大军临近边境，由于其将帅更换，造成了吴国覆灭的形势。

杜预筹划安排已经完成，就启奏朝廷确定伐吴的日期。武帝答应到明年大举伐吴，杜预上表陈述最好的策略说：“自从闰月以来，敌人只是戒严，下游没有兵士上溯。以常理和形势推断，敌人计划，其力量不能顾两头，必然先守护上（下）游，固保夏口以东，以延长其时日，没有缘由增兵西上，使国都成为空城。而陛下听了片面的话，便放弃了伐吴大计，纵敌生患。这诚然是国家的长远计划，假使大举征吴有可能失败，那就可以不发动。制定大举南伐计划，务必完备。如果大举成功，则从此全国太平，如果不成，不过费损一些时间，这样，何不试上一试！如果要等到明年，天时和人事都会有变化，臣恐怕到那时更加困难了。陛下您早做过决定，命臣等从各地区分别进军，所要规定和约束的，是东西方同时行动，这样就能保证胜利，没有倾覆失败的后果。臣心中明白这点，不敢以暧昧的见识自讨苦吃，愿陛下明察。”杜预在十多天后又上表说：“羊祜与朝臣多不相同，他不先广泛征求意见而秘密与陛下共定此计，所以出现了更多的异议。凡事都应用利害来权衡，今大举南伐十有八九对我们有利，只有十之一二对我们无功。那些认为大举会失败的议论也没有多

少道理，只是因为计谋不是自己提出，功不在自身，因而违背自己以前说过的话，而坚持反对的立场。近来朝廷事无大小，总是异议风起，虽然各人出发点不同，但大多是因自恃恩宠而不考虑后果，故而轻易发表不同意见。从前汉宣帝让朝臣议论赵充国的军事计谋，侍胜利后，责备反诘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这些人都叩头谢罪，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杜塞异端，统一思想。从秋天以来，朝廷打算讨伐吴国的谋略已经显露。如果现在中止，孙皓因害怕而生计，或者徙都到武昌，加强江南各城的防御，把居民迁走，我们城攻不下，野无所掠，把大船集中在夏口，这样明年大举的计划也就不能实现。”当时武帝正在与中书令张华下围棋，杜预的上表来到，张华推开棋盘敛手施礼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安宁，国富兵强，号令统一。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伐，可以不费多少力气，就能马到成功。”武帝才同意这个计划。

太康元年正月，杜预把兵力布置在江陵一带，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领众军沿长江西上，授给他们符节，旬日之间，攻克多座城池，都像杜预预料的那样。又派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领突击队八百人，在夜晚乘船渡江，去袭击乐乡城，预先遍插战旗，在巴山放火，突然袭击吴军要害的地方，首先挫伤敌军的士气。吴军都督孙歆十分震惊恐惧，给伍延的信中说：“北方来的军队，是飞渡过长江的。”吴国投降的男女共有一万多人，周旨、伍巢等又在乐乡城埋设了伏兵，等孙歆派出去抵抗王浚的军队大败而回，周旨等的伏兵混入孙歆军中，孙歆没有发觉，于是一直到帐下，俘虏了孙歆就回来了。因此军中有歌谣说：“用计

谋代作战，可以以一当万。”接着杜预下令进军江陵。吴国督将伍延伪降，把兵布置城上，杜预指挥晋军攻克了江陵。长江上游平定后，于是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广州、吴国的州郡都望风而降，奉送出印绶，杜预提着朝廷的符节，代表朝廷安抚了他们。一共斩杀和活捉了吴国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余人。又乘着兵威，把吴国的将士和屯田兵家属迁到长江的以北，充实该地区，南郡原来地区各设置了长吏，荆州地区人心安定，吴国人象归家似地纷纷回到这里来。

王浚早先向上汇报已得到了孙歆的头，后来杜预把活的孙歆送到洛阳，成为洛阳城中流传的大笑话。当时各路军将领开会，有人提出：“东吴这个立国近百年的贼寇，不可能一下子消灭。现在正临近夏暑，雨季正到，疾病会多起来，应该等到明年冬天，再大规模发起进攻。”杜预说：“从前乐毅凭借着济水西岸一战而兼并了强大的齐国，现今我们军队的士气正旺盛，好象劈竹，数节以后，就迎刃而解，不需要再费力气了。”于是各路将领，直接向秣陵进发。所过城邑，没有一座不束手就降。主张明冬进军的人写信给杜预表示承认错误。

孙皓被平定后，晋师凯旋回师，杜预因立功进爵为当阳县侯，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有九千六百户，封他儿子杜耽为亭侯，食邑一千户，赐给他绢八千匹。

当初进攻江陵时，吴国人知道杜预头颈上长个瘤子，害怕他的计谋，就用瓠系在狗颈上出示给杜预。每当大树上长个像瘤的疙瘩，就砍下一块，在被砍的树上写道“杜预颈”。

杜预攻下江陵后，把干这种事的人都逮捕杀掉了。

杜预回到镇后，向朝廷多次陈述自己家族世代为文吏，在武的方面没有什么功绩，请求退职。朝廷不同意。

杜预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但忘记战争必定危险，于是他一方面勤于讲武，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兴建学校，结果江汉一带百姓都拥护他，教化传播到四周万里之地。他进攻和打败山越，交错设置驻屯军营，分别占据要害地区，以巩固安定的形势。又修建邵信臣的遗迹，利用泄水、洧水，浸灌原田万余顷，分疆域刊石立标记，使土地有固定的界限，公私都得利。民众有了依靠，号称他为“杜父”。旧的水道只有由沔汉到达江陵一千数百里，往北没有水路可通。再者巴丘湖是沅江、湘江交汇的地方，背山临河，十分险固，是荆州蛮人所依靠的地方。杜预于是开凿杨江，从夏水到达巴陵一千多里，内可以疏导长江的洪水，外可以开通零、桂的漕运。南方的人们歌颂杜预说：“后世不叛乱是由于有了杜翁，谁能认识他的智名的勇功。”

杜预对于公众的事，知道的没有不去干的。凡所兴造的工程，必定要全面考虑，很少有做坏的，有人讥笑他管琐碎小事，杜预说：“禹和后稷的功劳，目的是为了救世，我这样做是和他们差不多的。”

杜预很注重后世的名声，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他刻了二块石碑记自己的勋绩，一碑埋到万岷山之下，一碑立在山之上，说：“怎么知道这里以后不成为山陵和深谷呢？”

杜预不会骑马，射箭连薄木片都穿不透，而每次担任大事，总要站在将帅的行列。接待人士，总是恭而有礼，回答

问题无所隐瞒，诲人不倦，做事敏捷但讲话谨慎。在立了功以后，生活从容，比较空闲，就沉浸在经籍中，写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的谱牒行状，著成《释例》。还写作了《盟会图》、《春秋长历》，作为一家之学，到晚年才成功。又撰写《女记赞》。当时有人评论杜预的著作是文义朴实直率，但世人没有重视它，只有秘书监挚虞很赞赏，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而后来《左传》独自流传。《释例》本为《左传》而写，但它所阐发创造的何止于《左传》的内容，所以也会单独流传。”当时王济懂得相马术，又很喜欢马，而和峤很爱好聚敛钱财，杜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了，问杜预：“你有何癖？”杜预回答：“臣有《左传》癖。”

杜预在任镇将时，常常贿赂洛阳朝中的权贵，人家问他为何要这样，杜预回答：“我只是怕被人坑害，并不想去求什么好处。”

杜预刚到荆州，在一次宴会喝醉酒后，睡在斋内。外人听到内有呕吐声，就从窗口偷偷地往里瞧，只见有一条大蛇垂头呕吐。听说的人都感到惊异。以后杜预被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走到邓县时死去，这一年他六十三岁。武帝十分叹惜哀悼，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成”。杜预早先有遗嘱说：“古代不讲究合葬，是他们明白生死的道理是与有无的道理一样的。中古的圣人改为合葬，大概是因为分与合的道理无所不在，死后也要像生前一样合在一起，以此来教育别人。从此以后，大人君子们或合或分，因为不知生，怎么能知死，所以各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吾以

前做台郎，曾因公事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冢，问农夫，说是春秋时郑国大夫祭仲或者是子产的墓，于是和随从的人祭奠观看。这冢造在山顶，四周望去十分开阔，墓的方向和山体一样是南北向的，但略偏东北，面向新郑城，意思是不忘本啊。它的隧道只堵塞后段而空着前段，这是表示里面没有埋藏珍宝，用不着多深。山上有许多美丽的石头不用，却只采集洧水旁的自然之石来建造墓穴，可贵在于不劳民力，而此类山上石也并不实用。君子崇尚他们的情操，小人因无利可图而不去挖掘，所以这些墓经历千年而不毁坏，这是由于建造者节俭的结果。我去年春天入京，因郭氏去世，按照陪陵的旧习惯，自己提出营造洛阳城东首阳山之南为陵墓，所得到的地方有小山，上面没有旧冢。它的高显然不足以与邢山相比，但东边能守奉二陵，西边能见到宫阙，南边可看伊水洛水，北边能望伯夷、叔齐和陵墓，山上空旷，可以远眺，这也就安心了。所以就栽树开道，构成一定的规模。到时全部用洛水的园石造墓，开隧道向南，规模形式按照郑大夫的墓冢，也想用节俭来表示自己思想。棺材葬品仪式等事，都按节俭的精神办。”子孙全部都遵行了。后来杜预的儿子杜锡继承了杜预的爵位。

（刘精诚 译）

【原文】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初，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

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

丰乐亭侯，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

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著，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诏班于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预以京师王化之始，自近及远，凡所施论，务崇大体。受诏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厚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

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积，亦无取于黜陟也。”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檻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闕，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数年，复拜度支尚书。

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旧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书奏，皇太子亦宜释服。预议“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暗终制，”从之。

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暑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咸宁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事在食货志。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表陈至计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

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预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

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万余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

预攻克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

王浚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经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

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初，攻江陵，吴人知预病痾，惮其智计，以瓠系颈示之。每大树似痾，辄砍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

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不许。

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滢淆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沈万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以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其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预先为遗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

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收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力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子锡嗣。

陈寿传

——《晋书》卷八二

【说明】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著名的西晋史学家。他少时受学于同郡史学家譙周（201——270年），“聪明敏识，属文富艳”。后出仕，屡被谴黜。入晋后，被举为孝廉，作佐著作郎，又升任著作郎，出补平阳侯相，编成了《诸葛亮集》。不久，他又入为著作郎，吴灭（280年）后，他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蜀、吴书共六十五卷，称为《三国志》，是为继司马迁、班固之后写成的第三部纪传体史书。这部书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只有纪、传而无表、志。其《魏志》前几卷都是本纪体裁，因此，此书名为《三国志》，实际上是以魏为正统。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司马氏的利益，《三国志》有不少曲笔，但对曹魏与孙吴刑政的苛虐、徭役的繁重，却并不掩饰。其内容涵概也较广阔，凡是这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重要人物，以及学术、文学、艺术、科技上有贡献者都得到了反映。它全书爽洁简约，但“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人。少年时代他就很好学，拜同郡学者谯周为师，后入仕蜀国为观阁令史。宦官黄皓弄事专权，大臣们都阿谀曲附，只有陈寿不向他低头屈服，因此屡遭排挤。在为他父亲服丧期间，他得了病，便让婢女调治药丸，这件事被看望他的客人看到了，于是乡亲邻里认为陈寿应受到贬责。蜀国被平定之后，陈寿便因此事多年在仕途上不得升进。司空张华怜惜他的才华，认为陈寿虽然没有远避嫌疑，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至于将陈寿贬废，于是推举陈寿为孝廉，授佐著作郎，出任阳平令。他编撰了《蜀相诸葛亮集》，上奏给皇上。于是升为著作郎，兼任本郡中正。又编撰《魏吴蜀三国志》，共六十五篇。当时人夸赞他擅长叙述历史，有作为良史的才华。夏侯湛当时也编撰了《魏书》，他看到陈寿的著作后，便销毁了自己的书并不再写。张华非常欣赏《三国志》，对陈寿说：“应当把《晋书》的著述也交付与你。”陈寿就是这样被当时所看重。也有人说，丁仪、丁廙在魏国负有盛名，陈寿对他们的儿子说：“可用一千斛米献给我，我会为你们的父亲写作好的传记，”丁的儿子不给他米，他于是就不为丁仪、丁廙立传。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诛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剃发的刑罚。诸葛瞻又轻视陈寿。陈寿为诸葛亮作传，说诸葛亮帅兵作战不是他的长处，没有应敌的才能；说诸葛瞻仅擅长书法，名过其实。评论者因此而轻视这部书。

张华准备荐举陈寿为中书郎，荀勖嫉妒张华，因而憎恶陈寿，授意吏部迁陈寿为长广太守。陈寿以母老为借口，辞官不就。杜预将要到镇南任大将军，重新向皇帝举荐陈寿，认

为可以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于是授官为御史治书。后来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辞去官职。他母亲临终嘱托他将自己埋葬在洛阳，陈寿遵照母亲的遗愿办了。陈寿由于没有将母亲运回故乡归葬，竟然又受到贬议。起初，譙周对陈寿说：“您一定会以才学成就功名，理当受到别人的贬损中伤，也并不是不幸。应当非常谨慎这一点。后来陈寿果然到了这一步，并二次遭到清议的侮辱，都同譙周的预言一样。许多年后，复官为太了中庶子，未及就职，元康七年，便因病去世了，时年六十五岁。

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颖等上表说：“过去汉武帝曾下诏说：‘司马相如病重，可派人去把他的著述都取来。’使者拿到司马相如的遗著，其中所言封禅之事，使天子感到吃惊。我们下臣认为：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多有规劝警戒之辞，阐明得失，有益于社会教化，虽然文采不如司马相如那么艳丽，但如实记事超过了他，希望陛下恩准采录陈寿的著述。”于是下诏书命令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里抄写《三国志》。陈寿又撰写有《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其它的文章也传播于当时。（任宝菊 译）

【原文】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譙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权威，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

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已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葛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丁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尊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譙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

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颙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

司马彪传

——《晋书》卷八二

【说明】司马彪（？——约 306），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西晋史学家。他是晋朝的宗室，因少年无行，不得为嗣，故不交人事，博览群书，潜心著述，如《庄子注》、《九州春秋》等。其中以《续汉书》最为知名。其书计八十篇，纪、传、志均备。后因范曄《后汉书》出，《续汉书》的纪、传部分逐渐散佚。书中的志则因《后汉书》无志而被南朝人刘昭取并入《后汉书》中得以流传至今。志原为八篇，刘昭并入《后汉书》时分为三十卷，即《律历》三卷，《礼仪》三卷，《祭祀》三卷，《天文》三卷，《五行》六卷，《郡国》五卷，《百官》五卷，《舆服》二卷。它们的材料根据大概是《东观汉记》的志，因此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虽早将其并入了《后汉书》中，后人仍相沿称其为《续汉书志》。

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过继给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敏为子。司马彪年少时笃学不倦，但由于喜好女色，行为不检，深受司马睦的斥责，并因此不能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司马彪虽然在名义上过继给了司马敏，实际上

是以此废除了他的继承权。由于这件事，司马彪便不再热心于交友结友，转而集中精力，专心学习，博览群书，完成了他编写、注释书籍的工作。起初，司马彪被授以骑都尉的官职。泰始年间，为秘书郎，不久转为秘书丞。他注释了《庄子》，编纂了《九州春秋》。司马彪认为：“过去的君主都设立史官，用来书录时事，记载善恶，用以惩罚劝勉，收集教化世人的经验教训。因此对没有修饰的《春秋》，仲尼给予整理；《关雎》散乱，师挚给予修整。难道是前哲们喜好麻烦吗？大概是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吧。自东汉建国，到建安年间，忠君之臣，仁义之士也已经闻名天下，但东汉没有好的史官，所修史籍也冗烦芜杂。谯周虽已有所删除，但还没有刊削完毕。安顺年间以后，佚失阙漏者还有很多。”司马彪于是查阅、参照了许多有关东汉史的记述，编纂收集到的资料，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写了二百年的历史，共记载十二个皇帝，上下贯通综合，又缀录众多史事，纂成纪、志、传共几十篇，名为《续汉书》。泰始初年，晋武帝亲自到南郊祭拜，司马彪上疏使意见最终确定下来，其文收在《郊祀志》。后来司马彪被授以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去世，终年六十余岁。

起初，谯周因为司马迁《史记》记载周秦以上史事，有些地方采用民间俗语，不完全依据严肃的经典，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完全凭据旧典，以纠正司马迁的谬误。司马彪又认为谯周所考也未能尽善，于是摘出《古史考》不正确者共一百二十二条，据《汲冢纪年》的记载予以改正，司马彪的这部书也流传于世。

(任宝菊 译)

【原文】

司马彪字绍统，高阳王睦之长子也。出后宣帝弟敏，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为睦所责，故不得为嗣，虽名出继，实废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以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岂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讹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传》。后拜散骑侍郎。惠帝末年卒，时年六十余。

初，讹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裴松之传

——《宋书》卷六四

【说明】，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曾任国子博士、永嘉太守等职。他受宋文帝之命而注《三国志》，于元嘉六年（429年）写成奏进。其注引书，据清人统计达二百一十种（见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他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对《三国志》进行了补阙、备异、惩妄、辩论等工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注文的特点归结为六项：“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评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就使注文有了补编的性质。《三国志》注文的这一特点，对更多地保存史料、辩证史事，都是极有价值的。被后人称为“注史的新例”。但注文对各种传说，摘引甚多，虚实混淆，博则有余，恰则不足，这成为该注的主要缺点。后人将该注简称为《三国志》裴注，并将其注的原则奉为注释史书的基本依据，对我国史注产生了了重大影响。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他的祖父裴昧，担任过光

禄大夫。他的父亲裴珪，担任过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的时候，通学了《论语》和《毛诗》。他博览群书，为人清淡朴素。二十岁的时候，拜为殿中将军。殿中将军这个官是皇帝左右的近卫。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选拔名家参予顾问，才开始用琅邪的王茂之，会稽的谢輶，这二位一南一北享有很高的声望。裴松之的舅舅庾楷在江陵，想让裴松之西上担任新野太守，因为事情困难而没有实现，于是拜他为员外散骑侍郎。义熙（405—418年）初年，裴松之担任吴兴故鄣县令。有政绩，调入朝中任尚书祠部郎。

裴松之因为社会上个人所立的碑，文字与事实不符，于是上表说：“碑铭的写作，是为了昭示后人，从本意上说不是特殊的功勋和特出的德行，不应当享有碑铭。（应当享有碑铭的）第一是思想勋绩影响很大，受到全社会的推崇的人；其次是高风亮节，有遗烈可记述的人；至于那些辅助皇帝的人，成绩显著的人，改造他所任职的地方的人，有好的教导长久流传的人，咏诗作文的人，也是需要勒铭镌刻的。不是以上几种人，（如果也立碑刻铭）就几乎是僭越和褻黷了。这种庸俗作假的风气兴起，使用华靡的辞藻由来已久，所以孔悝的铭文，正确的行为却遭到人们的非议；蔡邕写作碑文，（因不符合事实，）每有愧色。但自他们以后，流弊就更加多了。稍有职务，就必定要立碑刻铭，勒铭很少有能使人相信的事实，刊石只不过成了弄虚作假的家常便饭，真假混杂，就使得应当得到美名的不显得珍贵，只说他们的功绩，又是些不足道的。对这种风气不加禁止裁办，它的弊病就会没完没了。”裴松之认为：“那些想立碑的人，应当命令他们都向上请示，经

朝廷议论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去办。这样大概就可以防止不实之辞，表彰那些美好的事实，使百世以后，知道没有虚假，就会使仁义得到人们的信仰，办事的原则就会得到未来的崇敬。”于是以后立碑刻铭都依照裴松之所建议的办。

高祖北伐的时候，兼任司州刺史，让裴松之担任州主簿，后又转任治中从事史。攻克洛阳以后，裴松之担任州行事。宋建国之初，毛德祖出使洛阳。高祖下敕说：“裴松之是廊庙之才，不宜老是呆在边疆，现在召他回朝担任太子洗马，和殷景仁的待遇一样，可以让他知道。”当时议论建立王朝的音乐，裴松之认为妃子臧氏庙的音乐应该与其它四庙的音乐一样。升任裴松之为零陵内史，旋即征召他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426），诛杀了司徒徐羨之等人，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淦、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杨州；尚书三公郎陵子真、起部甄法崇出使荊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出使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出使南豫州和北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出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出使青州、兖州；裴松之出使汀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出使湘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出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出使广州；郎中殷斌出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出使交州；附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出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他们出使之时，在朝廷列班受诏）诏书说：“从前帝王巡视天下，各诸侯述职，不然就是诸侯执行回朝朝觐、聘问的规定。由此看来观察民情而推行政治，任命官吏并考察他们的政绩，上上下下都一致，远远近近都一样，所以能够功业长久，（治世的）原则得以长期坚持。朕孤陋寡闻，继承了

洪大的事业，只好小心谨慎，但不懂治理天下的原则，只有整天忧愁，好像面临深渊一样。朕害怕国家的风气衰颓、百姓弄虚作假，重大的过失有违国家的和睦，水旱之灾伤害了百姓的产业。虽然朕亲自过问这一类的事情，想使其得到妥当的处置，但重要的事情实在太多，朕所见所做的有许多缺漏，政治和刑法有不恰当的地方，都没有全部清楚。这难道不是朕不够诚恳，使大家不能完全尽心尽意吗？不能救民于水火的惭愧，应由朕一人承担。因为天灾很多，还没有完全实行仁德的政治，帝王巡狩的制度被废弃了还没有恢复，（虽然如此）朕眷顾百姓，没有忘记对他们的怜悯。现在派遣兼散骑常侍袁渝等到四方视察，到各郡邑巡行，亲自与刺史、二千石长官们见面，申述朕治天下的诚挚之意，广泛征求治理国家的重要意见，观察官吏的政治，访求民众的痛苦，表彰有操行的官吏，慰问百姓的疾苦。无论官吏或民俗的得失，都依据周朝的典制加以裁断，每件事情各写成书奏，回来之后都分门别类上奏，帮助朕弄清情况，好像亲见一样。各位大夫君子，请你们全心全意以此事为重，不要怠惰。下面的人如果有良谋大计，请诚心诚意细致地讲出来，上呈使者，不要有任何保留。这样才能使朕恭敬地采纳好的意见，以补政治上的缺漏。各位努力吧，一定要满足朕的心愿。”

裴松之回来之后上奏说：“臣下听说天道是给世界光明的，君王的德行是以全面治理社会为极至的。古代圣哲的君主，因为考虑到了所有的事情，所以一个人有好的想法，社会就富足和平；虽然只在江、汉推行礼制，其良好影响却很远。所以能够让后人咏颂他们宏大的功业，创造出比周朝好

的典则。陛下神思玄通，思想举世无双，身居天子之位，考虑着四面八方，咨询施布教化的不足，思虑荐举贤才之路还不通畅，公正地询问下民（的痛苦），同情他们当中的鰥夫、寡妇，光辉伟大的感召，影响远及四方。（这些举动）以很早以前的《雅》、《诰》为法则，英明的训示传扬到了边远的地方。所以全国民众恭敬地颂扬，很远的外国也感到喜悦，莫不歌唱吟诵欢欣鼓舞，铭记皇恩；有的扶老携幼，在路旁述说欢喜，实在是因为养育之恩流布，因此忘其所以。千载以来，只有这时候才出现这种情况。臣下谬蒙选任出使，不合格地与显要的人物同列，才能缺短，思想简单，无力宣扬圣旨，严肃倡明风化，进退人才没有章法，访求推举也孤陋寡闻，惭愧惶恐，不知所措。现在上奏二十四条，谨恭地随事写成。臣下见癸卯诏书，说官吏民风的得失，都依据周朝的典制加以裁断，每件事情各写成书奏，回来以后分门别类上奏。（现遵诏）依事为类附之于后。”裴松之很懂得出使的意义，谈论的人都赞扬他。

后来，裴松之累任中书侍郎、司州、冀州两州的大中正。皇帝选派他为陈寿的《三国志》作注。于是裴松之累集资料，增加了不同的说法，写成后奏上，皇帝认为注得很好，说：“这个注是不朽的！”就调他出任永嘉太守。（他为太守，）勤政恤民，官吏和百姓都感到自如。（所以又让他）入补通直散骑常侍，后又兼任司、元冀二州的大中正。不久他又出任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他告第退休，被拜为中散大夫，不久又兼任国子博士。后又提升为太中大夫，仍然任博士。裴松之打算续写何承天所写的刘宋国史，没有来得及动笔。元嘉

二十八年，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八十岁。他的儿子名骅，任南中郎参军。裴松之所写的论文和《晋纪》，裴骅注释的司马迁的《史记》，一并在世上流行。（赖长扬 译）

【原文】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庆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轺，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曰：“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勋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黜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是以孔悝之铭，行事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于仰止，道孚于来叶。”由是并断。

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松之居州行事。宋国初建，毛德祖使洛阳。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今召为世子洗

马，与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乐亦宜与四庙同。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诛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扬州；尚书三公郎陆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员外散骑常侍范雍、司徒主簿庞遵南兖州；前尚书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抚军参军王歆之使徐州；冗从仆射车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书殿中郎阮长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鸾使益州；员外散骑常侍李耽之使广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员外散骑侍郎阮园客使交州；驸马都尉、奉朝请潘思先使宁州，并兼散骑常侍。班宣诏书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职，不然则有存省之礼，聘觐之规。所以观民立政，命事考绩，上下偕通，遐迩咸被，故能功昭长世，道历远年。朕以寡暗，属承洪业，夙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忧，如临渊谷。惧国俗陵颓，民风凋伪，眚厉违和，水旱伤业。虽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机务惟殷，顾循多阙，政刑乖谬，未获具闻。岂诚素弗孚，使群心莫尽？纳隍之愧，在予一人。以岁时多难，王道未壹，卜征之礼，废而未修，眷彼氓庶，无忘攸恤。今使兼散骑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照然，若亲览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无惰乃力。其有咨谋远图，谨言中诚，陈之使者，无或隐遗。方将敬纳良规，以补其阙。勉哉勗之，称朕意焉。”

松之反使，奏曰：“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

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旒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纯，虑明扬之靡畅，清问下民，哀此鰥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于《雅》、《诰》，惠训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于是乎在。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谨依事为书以系之后。”松之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

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驎，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驎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

范晔传

——《宋书》卷六九

【说明】范晔（398—445年），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南朝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作甚丰，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后汉书》。今本《后汉书》帝、后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出于范晔之手；八志三十卷则为萧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志所补。就他所手著的部分而论，确实贯彻了他提出的“正一代得失”的宗旨。在书中不少篇章中，范晔多能从实际出发议论东汉政治得失，颇具史家识见。但全书突出“忠义”思想，流露出了他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士族意识。《后汉书》是在自东汉以来十家东汉史书的基础上著成的，取材广博，经范晔删削，做到了“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刘知几《史通·补注》），受到了历代史家的赞许，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但《后汉书》中对儒学和谶纬神学大肆渲染，尤其是其中对天命神符、术士推步、神鬼怪异的宣扬，则是此书的糟粕，也是不容掩盖的。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是车骑将军范泰的小儿子。他的母亲上厕所时生下他，他的额头被砖弄伤了，所以他以

“砖”作为小字。他过继给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从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能写隶书，通晓音乐。他十七岁时，州里辟召他为主簿，他没有去。曾任高祖刘裕的相国掾彭城王义康的冠军参军，随府又转任右军参军。入朝补任尚书外兵郎，出任荆州别驾从事史，不久又召回朝任秘书丞，因父亲去世而卸职。服丧期满，他担任了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任新蔡太守。檀道济北征，范晔害怕随行，借口脚有疾病，皇上不允许，让他由水路统率船队装载武器北上。军队回来以后，范晔担任司徒从事中郎，旋即升任为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天，彭城太妃逝世了。将要安葬的时候，设奠祭那天晚上，官员故旧都集中在东府。范晔的弟弟广渊，当时为司徒祭酒，那一天正好值日。范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在广渊的府中住宿，夜里二人畅饮，打开北面的窗户听挽歌取乐。义康大怒，贬范晔为宣城太守。范晔不得志，于是删削数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范晔在宣城待了好几年，才升任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长史，又加官为宁朔将军。范晔之兄范嵩担任宜都太守，其生母跟随范嵩在所任上。元嘉六年，他们的母亲去世了，但遣人报告范晔却只说母亲有病，范晔没有及时奔赴。等到范晔启程（去看望他母亲时），又携带了妓妾跟从，这件事被御史中丞刘损上奏了，太祖爱范晔的才华，没有降罪。为母服丧期满后，范晔担任了始兴王刘濬的后军长史，兼任南下邳太守。刘濬理扬州，没有亲自过问政事，都委托给范晔。不久范晔又升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高不超过七尺，又胖又黑，没有眉毛和胡须。他善

于琵琶，能够作曲。皇上想听范晔的弹奏，多次委婉地表达这一要求，范晔却假装听不懂，最终也不肯为皇上弹奏。皇上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很快活，便对范晔说：“我想唱歌，你来伴奏。”范晔才依旨（而为皇上弹奏）。皇上唱完了，范晔也停止了弹奏。

当初，鲁国的孔熙先博学有纵横的才志，文史星算的学问，没有不精通的。他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不被当时的人所了解，很久得不到晋升。早些时候孔熙先的父亲孔默之担任广州刺史，因为贪污财货犯罪交廷尉审理，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担保而维护他，孔默之才得免于罪。到义康被废为王的时候，孔熙先暗怀报效之心，想联合朝廷大臣（为义康求情），但不知道可以说动谁，认为范晔有不满情绪，便想引范晔以为伍。但是孔熙先一直不被范晔看重，所以没有借口去说服范晔。范晔的外甥谢综，因文雅而为范晔看重，孔熙先曾经与谢综认识，就使出全身解数与谢综周旋，与谢综的友情日益深厚。孔熙先凭借在岭南为官和剩余财产，家境十分富足，开始与谢综的弟弟们赌搏，故意表现得赌技低劣，以物品输给他们。谢综等诸位少年，既然多次得到物品，便白天黑夜地和孔熙先往来，情意渐渐融洽，谢综就领着孔熙先与范晔赌搏。范晔又与孔熙先游戏（赌搏），孔熙先故意装着不是范晔的敌手，前前后后输给范晔很多东西。范晔既贪图孔熙先的财宝，又爱他的文艺才华。孔熙先平时就善于文词，尽心尽意地顺从范晔，范晔于是与他异常友好，甚至申明两个是莫逆之交。孔熙先开始用婉转的言语劝说范晔，范晔不理睬，他就多方譬喻。范晔从来有在朝廷议论的习惯，朝野闻名，所

以他的门第虽然高贵，但国家不与他联姻。孔熙先因此用这件事激怒范晔说：“范先生若说朝廷待先生厚的话，为什么不与先生联姻，而使先生得不到尊贵的门户呢？别人只把（与先生相处）看作狗与猪相遇，而先生却想为此而舍身忘死，不令人感到困惑么？”范晔沉默不答，他（帮助孔熙先）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当时范晔与沈演之同被皇上当作知心，接见都受到同等待遇。范晔若先到，一定要等沈演之来了才一起入内。有一次沈演之先到，就独自被引见了，范晔对此事有怨气。范晔多次担任义康的府佐，义康待他一向优厚。自从范晔被贬到宣城太守之后，两人意见和喜好就有了分歧。谢综担任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义康镇守豫章。谢综回朝时，申述义康的意向，请求范晔消除两人之间的不和，恢复往日的友好关系。范晔既有了违背朝廷的想法，想探明皇上的旨意，就对皇上说：“臣历观前代史和两汉的故事，诸蕃王为政如以妖言诅咒企图侥幸加祸于人，就要正以大逆之罚。何况义康的奸心叛迹，已远近彰著，但至今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臣私下里感到困惑。而且大的梗涩经常存在的话，必将加重阶级次序的混乱，即使是骨肉之间，也是很难说的。臣受恩深重，所以冒犯皇上披露此事。”皇上不采纳范晔的意见。

孔熙先平时对天文有研究，他说：“太祖必定是逝世于非命，是骨肉相残造成的。江州应当出天子。”认为义康正应这句话。谢综的父亲谢述也为义康所知遇，谢综的弟弟谢约又是义康的女婿，所以太祖命谢综相随从南方来。谢综受到孔熙先的夸奖，也有酬报孔熙先的意思。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

孔熙先给了他六十万钱，让他在广州集结。但周灵甫一去了就没再回来。大将军府史仲承祖，是义康原来就信任照顾的人，他多次在建业任职，也暗中勾结心腹，图谋不轨。仲承祖听说孔熙先有诚意，就秘密地联合起来。丹阳尹徐湛之，一直受到义康的衷爱，他们之间虽然是舅甥关系，但恩情超过了儿子和兄弟，仲承祖因此结识事奉徐湛之，告诉了他秘密的计划。仲承祖南下，向萧思话和范晔说明义康的意思。他说：“本来想与萧家通婚，只恨原先的打算没有实现。与范晔本来情意不薄，中途相互分离，这是别人挑拨的罢了。”

有一位法略道人，原先受义康供养，大体上被义康当作知心看待；又有王国的法静尼也在义康家里出入，他们都感激旧恩，相约互助，并与孔熙先往来。义康让法略道人还俗；法略道人本姓孙，还俗后改名景玄，任命他为臧质的宁远参军。孔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静尼的妹夫许耀，领着队伍在宫中，宿卫殿省。许耀曾经有病，因为法静尼的关系就到孔熙先那里去请求治疗，孔熙先为他开了一剂药，许耀的病就好多了。许耀自己去孔熙先那里酬谢，因此相互间就有了来往。孔熙先因为许耀的胆识才干可以利用，就与他深交，乘便告诉了谋反的事，许耀答应作为内应。豫章的胡遵世，是胡藩的儿子，他与法略道人相处甚为融洽，也秘密地相互应和。法静尼南上，孔熙先就派遣婢女跟着她，交给她文书牋牒，陈说图讖。法静回来后，义康赏赐孔熙先铜匕首、铜镊、袍段、棋奁等物。孔熙先忧虑谋反的事被泄漏，就用毒酒杀了采藻。徐湛之又对范晔等人说：“臧质发现了异常情况，年内一定回来。已经告诉臧质了，让他（回来时）把全

部的门生故友带回来。他也应当理解这样做的意图，所以应该从他那儿得到数百健儿。臧质与萧思话相处融洽，一定会凭借这一关系邀请萧思话。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大将军义康的眷遇，必然没有与大将军不同的意见。萧思话在三州的朋友和拥有的力量，也不会比臧质少。郡中的文武官员，和各处侦察、巡逻之人，也应当不少于一千人。不忧虑兵力不足，但应注意勿失时机罢了。”于是大体进行了官员的安排，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左卫将军，其他人都有相应的职务考虑。凡平时不与义康交好及不附从义康的人，又有别簿登录，一并都纳入了处死的名单。

孔熙先让他弟弟孔休先提前写了篇檄文。他写道：

休美和否塞彼此战胜，天道没有永远使人安泰的，疯狂凶暴肆意横逆，明智的办法是将其诛灭。所以齐公子小白有一匡天下的功勋，晋公子重耳有尊戴辅翼周王的德行。自从景平年开始，皇室多故。（而在此之前，）宋武帝（刘裕）天生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承继大位统治天下，忧劳于万机，尽心于庶务，因此国内安定闲适，四海之内齐声歌唱。但从景平年以来，奸臣和宦官乱政，刑罚滥施，阴阳颠倒，致使祸起萧墙，危难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恨，遂纵奸凶，驱兵阻截皇上，祸及百官，推崇行为不正之人，倾刻之间就坠坏了帝王的基业。他的罪百倍于寒浞和他的儿子豷，过错十倍于刘玄和王莽，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能与他相比的。全国民众捶胸，无论中华和国外的人都为之泣血，都

怀着献身的忠诚，同思以身报国。

徐湛之、范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心贯白日，诚意显幽微，出于正义而感到痛心，不忍目睹事态的恶化，舍命奋戈，不顾万死，即日就要斩掉赵伯符的首级，扫荡他的党羽。虽然豺狼就要就戮，帝王的大业即将更新，但普天之下无人主宰，民众就无所依系。彭城王是高祖的骨肉，圣明充满了他的身体，德行感通天地，功勋盈溢于宇宙，道路险阻曲折，在南方得不到发挥才干的条件，龙潜凤栖，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苍生如饥盼望德政，民众渴求变化，难道仅仅是周公东征时才有《鸛鸣》之歌，只有陕西有对召公的那种思念之情吗？神灵转告了祥瑞的征兆，讖记表示出了为帝者的事像，对上报答天心，对下满足民望，登位为帝，不是（义康）王又是谁呢！

现在派遣护军将军臧质等人，捧着皇帝的玉玺衣绶，星驰奉迎。百官完全按照礼节，络绎继进，并且命令群帅，按照原来的规矩镇戍各地。若有干扰正义之人，只要有行动就将严惩不贷。前些年徐湛之奉皇上的手命，先就告诫过防止祸乱，预先就看见了动乱的苗头，皇上令他向朝中的贤人们说明这一情况，要求他们共拯危难。但是有谋无断，失去了后发制人的机会，才使皇上受到了摧残，风云突变，哀痛悔恨天崩地裂，抚心哽咽，不知何地，可以安身。我们将即时督促激励受到挫折的队伍，（为拥戴彭城王为帝）死而后已。

孔熙先认为既然发动了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有义康的意旨，于是范晔假造了一封义康给徐湛之的信，并在同党中宣布。这封信说：

我是个凡夫俗子、缺才少能，生长在富贵之家，根据个人的好恶随意处理事情，有过错不听人规劝，对事物没有恒定的看法，喜和怒都与事实违逆，致使小人多怒，士人不归附于我。灾祸和失败已成为事实了，还不觉悟，细加检讨反省，方知是自己造成的，痛苦犹如渗肌刻骨，有什么可以再弥补我的过错？但是如果说到尽心侍奉皇上，忠诚贯注细枝大节，那么我拳拳谨慎，唯恐做不到，因此这样才能恃宠骄盈，所以我不敢故意欺骗诬蔑皇上。岂能包藏逆心，招致毁灭？所以我推诚自信，不再顾忌与皇上的旨意是否相同；全心全意根据忠心办事，不顾及众人的议论，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谗言和陷害的暗伏，多种罪恶都归附在我的身上。有人奸险好利，在一些事情上有负于我；有人凶愚不为人所齿，只擅长无赖的行径；还有些人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只知道谄媚以求升官，这些人都伺机寻找我的不是，共同造谣诬蔑，致使灾祸加于骨肉，诛戮殃及无辜。他们所说的罪过，究竟有什么根据？（一点也没有。）但是刑罚所加，把被陷害的人都看成元凶。这种伤害亲人和气违背事理的事，使天地都为之动容。

我虽然被幽禁逼迫每日都很痛苦，生命只在旦夕之间，但有正义感的士人，时常有音信来告。每次得知天文与人事（相应），及外面的社会状况，就相信国家土崩

瓦解，必定是朝夕间的事了。于是我为群贤被祸、国家遭难的事，日夜愤怒不安，思想斗争很激烈。身在朝廷的君子及一般士人百姓中深明义理的人，宁可不识时务天运而坐待奸邪横行吗？除掉君王身边的邪恶之人，不只是哪一个朝代的事，何况如今这批狂乱罪恶之人，是自古以来都没出现过的，翦灭他们，比摧枯拉朽还容易呢。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众位贤人，若能同心奋发，将逆党灭族，难道这不是与创业同样的功劳，重新造就了宋室么？兵是凶事，战争危险，也许有过份的地方，但如果有一位豪杰违背大的方向，就要诛灭他的九族。处分的大权，就委托诸位贤人，（凡有所处分）都应恭谨地申报朝廷，一切举动都要奏明皇上，往日的嫌疑怨恨，都会因此而豁然明白，然后我当到朝廷谢罪，到府衙接受杀头的惩处。假如我的举动能安定社稷，即使死也无所怨恨。请诸位贤人努力、再努力。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就本镇，皇上到武帐冈这个地方为他们践行，范晔等人准备就在那一天发动动乱，但因安排上出现了差错没能发动。这一年的十一月，徐湛之上表说：“我和范晔，原本没有旧交，只不过都忝列朝迁，和他有事务上的联系，他屡次来我处，所以渐渐有了些来往。近一年来，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变化的表现，用心险恶，追求富贵，自己说没有受到重用和信任，于是产生了埋怨。他不仅仅是攻击朝廷官员，讥讽诽谤圣明的当世，还对上议论朝廷，对下议论各地的藩王，煽动有相同和不同看法的人，任意攻击，这一类的事情，都已

经完全写在前次的材料上了。近来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然命令大将军的府吏仲承祖按范晔及谢综等人的意思，想集合不逞之徒，计划有所大举动。因为臣下我过去蒙受过义康的照顾，又因为去年一群小人为臣的事闹得乌烟瘴气，认为朝廷必然嫌弃我，就多次劝说诱惑我。他们顺便还说现在人们希望动乱，机不可失；讖纬和天象，都有征兆。不久，范晔亲自来找我，再次陈述了这些话，并且说对臣下我的议论变得很险恶了，为了保全自己应当参加作乱。我立即就把此事上奏了，被命令相互揭发，弄清情况。于是我将檄书、选人的事、参加人的姓名、文书手迹都拿出来，谨慎地封好上呈皇上。他们凶狠背叛的程度，古今都没有比得上的。由于臣下我对接交士人看得不清楚，所以得知了这一叛逆的阴谋。在这揭发的时候，我感到震惊和惶恐，思绪混乱，手足无措。”宋文帝下诏说：“徐湛之上表所说的一切，实在令人惊骇惋惜。范晔平素行为不检点，小有过恶，但因他才艺可用，所以收纳他的长处，频繁地给他荣耀的爵位，使他参予高洁显要的事务。但他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追求自己利益的本性，其欲望比溪谷沟壑还大，不认识已经给予他的恩惠待遇，还心怀怨恨。朕每次都怀着容忍、培养他的心意，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没想到他同恶人勾结在一起，狂妄悖乱到如此地步。现在可以将他收监，依法加以彻底审问。”

这一天夜里，先传呼范晔和朝臣们在华林东阁聚集，在客省休息。这时候，早就在外面将谢综及熙先兄弟收监，并使他们一条一条地服罪了。这时候宋文帝在延贤堂，派使者问范晔说：“因为你略有文才，所以加以任用，名声和爵位都

是你期望的，按常例给予的待遇也没少给。朕也知道你的欲望难以满足，最多不过是产生些毫无道理的埋怨，在朋党中挑拨煽动而已。为什么有人说你图谋不轨？”范晔仓惶恐惧，不肯承认。皇上再次遣人问他说：“你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他们都已经承认了，现在还没有处死，人证物证俱在，为什么不从实招认？”范晔回答说：“如今宗室如磐石一样稳固，各蕃分布踦立，就是下臣我从侥幸出发（发动叛逆），方镇立即就会来讨伐，待得了多少时候不被诛杀夷灭？而且下臣职位权力过于重大，再加一阶两级，自然是一定会实现的。为什么要用灭族之罪来取代我升官的前途呢？古人说：‘左手控制着天下，右手去自刎其喉，就是傻瓜也不这样做。’下臣虽然平凡低下，但朝廷还赏识我有些长处，以理而论，下臣不会有这些（谋反的）事情。”皇上派人问他：“孔熙先近在华林门外，你愿意当面对质吗？”范晔无话可说，就回答：“孔熙先假如诬害臣下，臣下怎么办？”孔熙先听说范晔不服罪，笑着对殿中将军沈邵之说：“（谋反的）诸事处置，瑞符、檄书等文件，都是范晔所写的或确定的。怎么现在如此抵赖呢。”皇上把墨迹给范晔看，范晔才原原本本把事情交待出来，他说：“很久前就想把这事奏明圣上，但当时叛逆的阴谋还不明朗，又希望这事消解了，所以推迟到今天都没上报。我深负国恩罪恶深重，甘心接受诛戮。”

这天夜里，皇上派尚书仆射何尚之去看范晔，问他说：“你怎么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范晔说：“先生认为是什么原因？”何尚之回答：“先生自己应当分析得出。”范晔说：“外面的人传说庾尚书被皇上憎恶，我估量自己与他之间没有交

恶。谋逆的事，我是听孔熙先说的，我认为他是个小孩，所以不以为意。现在突然受到责问，才知道这是罪过。先生您正在以正道佐世，使天下没有冤屈。弟接受死刑之后，还是希望先主按照此心办事。”第二天，仗士把范晔押送廷尉。被投入了监狱后，范晔问徐湛之现在哪里，然后才知道事情是徐湛之告发的。孔熙先见形势不妙才吐露出实情，但言辞气度不曲不挠，皇上惊奇他的才干，派人慰问他：“以贤卿的才干，而滞留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心。这是我对不起您了。”皇上又诘问责备前吏部尚书何尚之说：“让孔熙先快三十岁了还当散骑郎，哪有不作贼的！”

孔熙先在狱中上书说：“囚怨小人孔熙先猖狂，没有远见，徒然凭意气感谢小恩，不估料逆顺的大义。我与二弟孔休先为这次奸谋的首犯，触犯了国法，把我们捣碎做菜、煮了晒成肉干，也不能减轻我们重大的罪恶。陛下心胸广大，量包四海，记得不值得一提的气节，就宽大地下了优待我的诏书。施恩并非是根据开始的行为，给予荣耀不遗漏该享有荣耀的人，自古以来，没有能与陛下相比拟的。盗马绝纆的臣下，怀璧投书的士人，他们的行为卑贱到极点了，但对他们的惩罚却很轻微，他们因此而认识得到了罕见的恩德，要舍身忘命加以报效，最后他们为齐、魏立了大功，为秦、楚建立了功勋。囚犯我虽然身陷祸国的叛逆，名节都丧失了，但少年时也曾慷慨激昂，私下里仰慕壮烈之士的遗风。然而悬附崖上的树木，事情到了绝境才想到长在高处，倒出盆的水，就没收回来的道理了。我马上就要血染斧钺，以我的结果告诫将来了，假若我的魂魄有灵，希望不要把我埋得太远。然而我

区区尽忠的怀抱，没有辜负平素的心愿。原来我苟且偷生，很少有舒畅的时候，我天性喜爱读各种书籍，用心地去理解卜筮阴阳之类的道理，智慧所能包容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没有不去穷尽收纳、探究它们深刻微妙的思想的。考察已经过去的事情，天人相应的事实在太多了。谨略陈所知，用纸如实地另外写出来，希望姑且不要将它抛弃了，把它保存在中书。假如囚犯我死去之后，或者可以拿出来看，那么我在九泉之下，就稍微可以塞责了。”孔熙先所上陈的有天文、占候，讖纬的预言有骨肉相残之祸，其中的言语情深意切。

范晔在狱中，是与谢综、孔熙先分开囚禁的，就声称自己有病请求把自己移到离审讯室近些的地方关押，实际上是想接近谢综等人。监狱主管允许了范晔的要求，结果他得以关押在谢综等人的隔壁。他隔墙问谢综说：“开始被抓的时候，你怀疑是谁告发的？”谢综回答：“不知道。”范晔说：“就是徐童。”徐童，就是徐湛之；徐湛之的小名叫仙童。范晔在狱中写了首诗说：“祸福原本没有什么征兆，性命最终也有他的尽头。每个人都必将走向已定的死期，谁又能拖延气息一刻？这一辈子的事已经全部知晓了，来生的缘份却暗昧迷茫昏黄明灭。美和丑都要一样埋进坟墓，哪里用得着去区分是非曲直？难道要我去议论埋在东陵上的盗跖，我倒宁可去探究葬在首山的伯夷。我虽然不能弹出稽康闲雅的琴声，也差不多能从容自若保持夏侯玄临刑那样的气色。现在还活着的人们呵，这一条生死之路你一起程就接近了它的终结。”

范晔原以为入狱后便会被处死，但皇上想彻底追查这一案件，于是过了二十天（还没被处死），他便产生了求生的欲

望。狱吏因此和他开玩笑说：“外面传说可能把太子詹事您长期囚禁起来，（并不杀您）。”范晔听后又惊又喜。谢综、孔熙先笑他，说：“詹事和我们共同筹划过去的事的时候，没有不揜袖齟目的。在西池的射堂上，您跃马顾盼，自以为是一世之雄。现在您思想混乱、左顾左盼，只不过是怕死罢了。假设而今皇上赐给您一条命（不杀您），为臣的应当为皇上谋画，您有什么脸面可以活下去呢。”范晔跟守卫监狱的将领说：“可惜啊！（您担任这种职务，）玷污了您这个人。”这个将领说：“不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范晔说：“大将您说得对。”

临到押出范晔等人到大街上问斩的时候，范晔走在最前面，走到监狱门口他回头看着谢综说：“今天就刑的顺序，是否该按职位高低为先后呢？”谢综回答：“反贼的头子应最先就刑。”一路上说说笑笑，没有一刻停止。到了行刑的地方，范晔问谢综：“时候到了没有？”谢综说：“看这阵势不会太久了。”范晔吃完了送行饭，又苦劝谢综吃，谢综说：“我（不想吃饭）这奇异的病太深沉了，为什么要强迫我吃饭呢？”范晔家里的人都到刑场来了，监刑官问范晔：“要与他们见见面吗？”范晔问谢综说：“家里人已经来了，有幸相见，您不打算与他们暂时告别吗？”谢综说：“告别与不告别，又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他们前来告别必定要号哭，这足以把我的心弄乱。”范晔说：“号哭有什么关系？刚才看见站在路边上的亲朋故友瞻望我们，也大大胜过不见他们。我的意思是（他们既已来了）就相见吧。”于是监刑官将他们的家里人叫到他们面前。范晔的妻子先低头抚摸着他儿子，后回头骂范晔说：“先生不为你年老的母亲考虑，不感戴天子的恩遇，你自己死

了固然不足以抵罪，子孙们枉自被杀又如何对付！”范晔只是干笑，说罪已到达了這個程度而已。范晔的生母哭着说：“皇上照顾你又无微不至，你不能感恩，又不考虑我已经老了，今天有什么办法呢？”边说边用手打范晔的颈项和脸，范晔脸上没有惭愧之色。他的妻子又说：“你这个罪人，不要挂念你的母亲。”范晔的妹妹和妓妾来告别，范晔悲痛得泪水长流，谢综说：“舅舅太没有夏侯的气质了。”范晔停止了哭泣。谢综的母亲因为儿子和弟弟犯下叛逆大罪唯独她没有出现。范晔对谢综说：“姐姐今天不来，比别人强多了。”范晔变得沉迷，他的儿子范藹也沉迷了，抓起地上的泥土和果皮掷向范晔，对着他一连叫了几十声“别驾”。范晔问他：“你怨恨我吗？”范藹回答：“今天还有什么怨恨不怨恨，但是父子一起就死，不能不悲痛罢了。”范晔常常说死去的人精神也消灭了，想写《无鬼论》；到临死之前他给徐湛之写了封信，却说（要与徐湛之）“相讼地下”，他就是如此地谬乱。范晔又曾跟人说：“请告诉何仆射，天下断然没有佛和鬼。如果有灵，自然当得以报复。”抄收范晔的家，乐器、衣服、玩物、都很珍贵华丽，妓妾也着力装饰，但他母亲住的地方却很简陋，只有一间厨房堆集柴火，侄儿女们冬天没被子，叔父只有布做的单衣。范晔和他的儿子范藹、范遥、范叔葵，孔熙先和他的弟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他的儿子桂甫、桂甫的儿子白民，谢综和他的弟弟谢约、仲承祖、许耀，一切被牵连的人，都受了死刑。范晔当时四十八岁，范晔的兄弟及他们的子女父亲已经逃亡了的和谢综的弟弟谢纬，被迁徙到了广州。范藹的儿子范鲁连，是吴兴昭公主的外孙，请求保全性命，也得到了

远徙他乡的结果，直到宋世祖即位后才得以回来。

范晔性情精细有思想，触类旁通，有多方面的才能，不论服装器物，没有不对原来的定式加以修改的，当时的人都效法他。他写了本《和香方》，这书的序言说：“麝本来忌讳就多，用过了量就一定有危害；沈实容易调和，就用满一斤也没伤害。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棕多、和罗这类药，都是外国的好，不要使用中国的。又有枣膏这种药很昏钝，加上甲煎这种药太肤浅俗气，不但无助于增加它的馨香，而且更加重了它的缺点。”这篇序所说的，都是用药来比当时的在朝之士；“麝本多忌”，是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是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是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是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是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是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合”，是范晔自比。

范晔在狱中给他的甥侄们写了封信以自述经历：

我狂妄自大造成了灾祸以至于覆灭，难道还能说什么，你们都会把我当罪人看待而抛弃我。但我这一生我行我素，也有值得探寻的地方。至于我才能的长短，思想所理解的东西，你们或许不完全知晓。我小时候懒于学习，很晚才懂事，到三十多岁，才在政治上有了理想。自从那时候以来，我转向了心灵的陶冶，一直到将至老年，也没有停止。我常常有些微的心得，言语甚至都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没有研究注释一类书籍的习惯，性情急躁，苦思一会儿，便烦乱郁闷，口头表达又不顺畅，因此没有谈话的本领。至于我所彻底理解的地方，不过都是自得于胸怀的罢了。我的文章逐步有了长进，但才

少思难，所以每次握笔所写成的文章，几乎没有完全称心如意的。我常常以作文士而感到羞耻。做文章的祸患在于把事情写得一览无余，迫切地在文辞中表达感情，因外加的东西影响了文章的主旨，因为囿于用韵而改变了原来想表达的意义。虽然时时有能干的人，大多数都免不了被以上的原因所拖累，这正如生硬地力求形似的绘画一样，最终表达不出自己的思想。我常常说文章是感情和志趣的寄托，所以写文章应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文章的主旨就一定能得到体现；以文传意，文章的辞语也会不同凡响。只有这样，文章在思想方面才能吐露芬芳，在语言方面才能达到金声玉振。这当中的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委细曲折有现成的理论。我以为很理解其中的奥妙，曾经与人谈论，但多数人并不欣赏我的观点，这大约是意趣不同的缘故吧。

我懂得音调，能识别音乐的清浊，这是自然生成的。观古今文人，多数对此不完全明白，纵然有会意于此的，也不一定是天生就懂的。我说的话有事实为证，并不是凭空扯谈。在年轻人当中，谢庄最有音乐天分，（根据是他写的文章，）文气辞藻变化多端，并不拘泥于韵律。我想他写文章没有固定的方式，只是他能正确处理文章中的难点，合理摆布轻重而已，但他所具有的天分，还是没能完全表现出来。然而他多数是为公家写文书，很少在公事之外开阔思想，他怨恨这种状况，也因为他对文名没有兴趣（所以他的天性没得到更好地发挥）。

我原本与史书无缘，只是对政治总觉得不可理解而

有意于历史罢了。我写完了《后汉书》后，反过来对政治得到了把握，细看古今的著述及评论，大概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班固有名气，但他凭性情写作，没有一定的规范，不能给他什么地位。他《汉书》篇末的“赞”语几乎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书中的“志”可以推崇。我写的《后汉书》在博赡方面赶不上《汉书》，但条理整齐未必有愧于它。我在各种传记中的议论，都有精意深旨，我有控制篇幅的意思，所以议论的词句写得简略。但自《循吏传》以下到《六夷传》各篇的序、论，笔势纵放，实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可以拿出来与杰作比较的，往往不逊色于贾谊的《过秦论》。曾经将全书与班固的《汉书》比，不仅仅只是不愧于它而已。我原想把所有的志都写完，《汉书》中所立的志目也让《后汉书》都具备，虽然事情不必多写，姑且使体裁得以完整也是可以的。又想因事在每卷书内发抒议论，以匡正一代的得失，这一意图也未实现。《后汉书》中的“赞”自然是我文章中所表达的杰出思想，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它奇变无穷，相互配合，是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赞扬的绝作。《后汉书》流传开后，因为以上的优点应当赢得知音。纪和传按成例只是举其大略罢了，但《后汉书》纪、传中的细微的思想却很多。自古以来体大思精的著作，没有《后汉书》这样的。我怕世人不能完全理解它，因为他们多贵古贱今，所以尽情狂言罢了。

我对于音乐，欣赏的能力甚至抛都抛不掉，但是精通的不是严肃的音乐，这是我引以为恨的。然而（无论

是通俗的还是严肃的音乐)都有同一的最高境界,又有什么不同的呢?其中的形式趣味,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的。那怕是一小段音乐,它的意义和表达方式也是无边无际的。我曾经把这些音乐原理教授给人,可惜士庶中没有一个特出的这种人。我的音乐造诣永远没有传授的机会了。

我的书信虽然表达了我很少很少的思想,但是因为写得不快,其余的事竟写不成了,我常常有愧于为你们叔辈的名份。

范晔写的这篇自序性质的信说的全是事实,所以将它记录在这里。

范藹从幼小时就爱整洁,他穿的衣服穿一年也未尝有灰尘。他死的时候是二十岁。

范晔少年时,他的哥哥范晏经常说:“这小子追求利,最终要破败范家的门户。”结果真如范晏所说的一样。

(赖长扬 译)

【原文】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

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顷之，迁尚书吏部郎。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兄勰为宜都太守，嫡母随勰在官。十六年，母亡，报之以疾，晔不时奔赴。及行，又携妓妾自随，为御史中丞刘损所奏，太祖爱其才，不罪也。服阕，为始兴王濬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濬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无因进说。晔外甥谢综，雅为晔所知，熙先尝经相识，乃倾身事综，与之结厚。熙先藉岭南遗财，家甚富足，始与综诸弟共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综等诸年少，既屡得物，遂日夕往来，情意稍款，综乃引熙先与晔为数。晔又与戏，熙先故为不敌，前后输晔物甚多。晔即利其财宝，又爱其文艺。熙

先素有词辩，尽心事之，晔遂相与异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动晔，晔不回，熙先乃极辞譬说。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婚，为是门户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若谓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与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默然不答，其意乃定。

时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见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离。综为义康大将军记室参军，随镇豫章。综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乃言于上曰：“臣历观前史二汉故事，诸蕃王政以讬诅幸灾，便正大逆之罚。况义康奸心衅迹，彰著遐迩，而至今无恙，臣窃惑焉。且大梗常存，将重阶乱，骨肉之际，人所难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纳。

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故太祖使综随从南上，既为熙先所奖说，亦有酬报之心。广州人同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灵甫一去不反。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云：“本欲与萧结婚，恨始意不果。与范本情不薄，中间相失，傍人为之耳。”

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待，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并与熙先往来。使法略罢道，本姓孙，改名景玄，以为臧质宁远参军。熙先善于治病，兼能诊脉。法静尼妹夫许耀，领队在台，宿卫殿省。尝有病，因法静尼就熙先乞治，为合汤一剂，耀疾即损。耀自往酬谢，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胆干可施，深相待结，因告逆谋，耀许为内应。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与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遗婢采藻随之，付以笺书，陈说图讖。法静还，义康饷熙先铜匕、铜镊、袍段、棋奁等物。熙先虑事泄，鸩采藻杀之。湛之又谓晔等：“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乃略相署置，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晔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熙先左卫将军，其余皆有选似。凡素所不善及不附义康者，又有别簿，并入死目。

熙先使弟休先为檄文曰：

夫休否相乘，道无恒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勋，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诞英姿，聪明睿哲，拔自藩国，嗣位统天，忧劳万机，垂心庶务，是以邦内安逸，四海同风。而比年以来，奸竖乱政，刑罚乖淫，阴阳违舛，致使衅起萧墙，危祸萃集。贼臣赵伯符积怨含毒，遂纵奸凶，肆兵犯辟，祸流储宰，崇树非类，倾坠皇基。罪百浞、豷、

过十玄、莽，开辟以来，未闻斯比。率土叩心，华夷泣血，咸怀亡身之诚，同思糜躯之报。

湛之、晔与行中领军萧思话、行护军将军臧质、行左卫将军孔熙先、建威将军孔休先，忠贯白日，诚著幽显，义痛其心，事伤其目，投命奋戈，万殒莫顾，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虽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无主，群萌莫系。彭城王体自高祖，圣明在躬，德格天地，勋溢区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龙潜凤栖，于兹六稔。苍生饥德，亿兆渴化，岂唯东征有《鸛鹑》之歌，陕西有勿翦之思哉。灵祇告征祥之应，讖记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极，非王而谁。

今遣行护军将军臧质等，赍皇帝玺绶，星驰奉迎。百官备礼，骆驿继进，并命群帅，镇戍有常。若干挠义徒，有犯无贷。昔年使反，湛之奉赐手敕，逆诫祸乱，预睹斯萌，令宣示朝贤，共拯危溺。无断谋事，失于后机，遂使圣躬滥酷，大变奄集，哀恨崩裂，抚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辄督厉眊顿，死而后已。

熙先以既为大事，宜须义康意旨，晔乃作义康与湛之书，宣示同党曰：

吾凡人短才，生长富贵，任情用己，有过不闻，与物无恒，喜怒违实，致使小人多怨，士类不归，祸败已成，犹不觉悟，退加寻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复补。然至于尽心奉上，诚实幽显，拳拳谨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宠骄盈，实不敢故为欺罔也。岂苞藏逆心，以招灰灭，所以推诚自信，不复防护异同，率意信心，不

顾万物议论，遂致谗巧潜构，众恶归集。甲奸险好利，负吾事深；乙凶愚不齿，扇长无赖；丙、丁趋走小子，唯知谄进，伺求长短，共造虚说，致令祸陷骨肉，诛戮无辜。凡在过衅，竟有何征，而刑罚所加，同之元恶，伤和枉理，感彻天地。

吾虽幽逼日苦，命在漏刻，义慨之士，时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间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为衅起群贤，滥延国家，夙夜愤踊，心腹交战。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怀义秉理者，宁可不识时运之会，而坐待横流邪。除君侧之恶，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乱罪戾，终古所无，加之翦戮，易于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众贤，若能同心奋发，族裂逆党，岂非功均创业，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战危，或致侵滥，若有一豪犯顺，诛及九族。处分之要，委之群贤，皆当谨奉朝廷，动止闻启。往日嫌怨，一时豁然，然后吾当谢罪北阙，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无恨。勉之勉之。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武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而差互不得发。于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与范晔，本无素旧，中忝门下，与之邻省，屡来见就，故渐成周旋。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藩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近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将军府吏仲承祖腾晔及谢综等意，欲收合不逞，规有所建。以臣昔蒙义康接盼，又去岁群小为臣妄生风尘，谓必嫌惧，深

见劝诱。兼云人情乐乱，机不可失，讖纬天文，并有征验。晔寻自来，复具陈此，并说臣论议转恶，全身为难。即以启闻，被敕使相酬引，究其情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墨翰迹，谨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暗于交士，闻此逆谋，临启震惶，荒情无措。”诏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骇惋。晔素无行检，少负瑕衅，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而险利之性，有过溪壑，不识恩遇，犹怀怨愤。每存容养，冀能悛革，不谓同恶相济，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穷诘。”

其夜，先呼晔及朝臣集华林东阁，止于客省。先已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并皆款服。于时上在延贤堂，遣使问晔曰：“以卿粗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怀，于例非少。亦知卿意难厌满，正是无理怨望，驱扇朋党而已，云何乃有异谋。”晔仓卒怖惧，不即首款。上重遣问曰：“卿与谢综、徐湛之、孔熙先谋逆，并已答款，犹尚未死，证据见存，何不依实？”晔对曰：“今宗室磐石、蕃岳张跱，设使窃发侥幸，方镇便来讨伐，几何而不诛夷？且臣位任过重，一阶两级，自然必至。如何以灭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臣虽凡下，朝廷许其粗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复遣问曰：“熙先近在华林门外，宁欲面辨之乎？”晔辞穷，乃曰：“熙先苟诬引臣，臣当如何？”熙先闻晔不服，笑谓殿中将军沈邵之曰：“凡诸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晔所造及治定。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晔乃具陈本末，曰：“久欲上闻，逆谋款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迁至今。负国罪重，分甘诛戮。”

其夜，上使尚书仆射何尚之视之，问曰：“卿事何得至此？”晔曰：“君谓是何？”尚之曰：“卿自应解。”晔曰：“外人传庾尚书见憎，计与之无恶。谋逆之事，闻孔熙先说此，轻其小儿不以经意。今忽受责，方觉为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无冤。弟就死之后，犹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晔付延尉。入狱，问徐丹阳所在，然后知为湛之所发。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挠，上奇其才，遣人慰劳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诘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

熙先于狱中上书曰：“囚小人猖狂，识无远概，徒徇意气之小感，不料逆顺之大方。与第二弟休先首为奸谋，干犯国宪，螯脍脯醢，无补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录其一介之节。猥垂优逮之诏。恩非望始，没有遗荣，终古以来，未有斯比。夫盗马绝缨之臣，怀璧投书之士，其行至贱，其过至微，由识不世之恩，以尽驱命之报，卒能立功齐、魏，致勋秦、楚。囚虽身陷祸逆，名节俱丧，然少也慷慨，窃慕烈士之遗风。但坠崖之木，事绝升跻，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当身膏铁钺，诒诫方来，若使魂而有灵，结草无远。然区区丹抱，不负夙心，贪及视息，少得申畅。自惟性爱群书，心解数术，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穷揽，究其幽微。考论既往，诚多审验。谨略陈所知，条牒如故别状，愿且勿遗弃，存之中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所陈并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残之祸，其言深切。

晔在狱，与综及熙先异处，乃称疾求移考堂，欲近综等。见听，与综等果得隔壁。遥问综曰：“始被收时，疑谁所告？”

综云：“不知”。晔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狱为诗曰：“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尽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凯论东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晔本意谓入狱便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因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尝共畴昔事时，无不攘袂赳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而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今时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晔谓卫狱将曰：“惜哉！葬如此人。”将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晔曰：“大将言是也。”

将出市，晔最在前，于狱门顾谓综曰：“今日次第，当以位邪？”综曰：“贼帅为先。”在道语笑，初无暂止。至市，问综曰：“时欲至未？”综曰：“势不复久。”晔既食，又苦劝综，综曰：“此异病笃，何事强饭？”晔家人悉至市，监刑职司问：“须相见不？”晔问综曰：“家人以来，幸得相见，将不暂别。”综曰：“别与不别，亦何所存？来必当号泣，正足乱人意。”晔曰：“号泣何关人？向见道边亲故相瞻望，亦殊胜不见。吾意故欲相见。”于是呼前。晔妻先下抚其子，回骂晔曰：“君不为百岁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晔干笑云罪至而已。晔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无极，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击晔颈及颊，晔颜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晔收泪而止。综母以

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也。”晔转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掷晔，呼晔为别驾数十声。晔问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缘复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至是与徐湛之书，云“当相讼地下”。其谬乱如此。又语人：“寄语何仆射，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晔及子藹、遥、叔葵，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谢综及弟约、仲承祖、许耀，诸所连及，并伏诛。晔时年四十八。晔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谢综弟纬，徙广州。藹子鲁连，吴兴昭公主外孙，请全生命，亦得远徙，世祖即位得还。

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沈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粘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棕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唯无助于馨烈，乃当弥增于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此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此羊玄保；“甲煎浅俗”，此徐湛之；“甘松、苏事”，此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

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

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愤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累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偏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

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工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

藹幼而整洁，衣服竟岁未尝有尘点。死时年二十。

晔少时，兄晏常云：“此儿进利，终破门户。”终如晏言。

沈约传

——《梁书》卷一三

【说明】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刘宋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梁武帝）纪》等数种，大部分已散佚，今存者仅《宋书》一百卷。其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起自晋义熙元年（405年），终于宋升明三年（479年），是一部记述刘宋兴亡的纪传体断代史。一般认为，《宋书》主要以徐爰所修宋史旧本为依据，自撰部分不多；叙事多所忌讳，时有曲笔，晋宋之间为宋讳，宋齐之间为萧道成讳，无所不至。但其纪、传记事颇富，尤其是志，分量几与纪、传部分相等，不仅叙述了刘宋一代制度，还上溯至曹魏，中间包括晋代，无论质、量，都颇为贵重。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他的祖父沈林子，是刘宋朝的征虏将军。他的父亲沈璞，是梁朝的淮海太守。沈璞在元嘉末年被诛杀了，沈约就四处逃窜潜藏，后来遇上了赦免。这以后沈约在孤独的流浪、贫穷的生活中，笃志好学，昼夜

不倦。他的母亲担心他太劳苦而生病，常常减少给他点灯的油或灭掉他的灯。但是沈约把白天所诵读的文章，在夜间进行背诵，于是他博通群书，善于写文章。

（后来，）沈约带上家眷去担任奉朝请的职务。济阳的蔡兴宗听说沈约的文才而与他交好。当时蔡兴宗是郢州刺史，推荐沈约做了安西将军府的外兵参军，兼任记室。蔡兴宗曾经对他的孩子们说：“沈记室是道德高尚的老师，你们应当很好地对待他。”（此后，蔡兴宗为荆州刺史、征西将军）沈约跟随到了荆州，又让他担任了征西记室参军，在名义上兼任廐西县令。蔡兴宗去世后，沈约起初担任安西晋安王的法曹参军，后转为外兵参军，并兼任记室。后来，他由此入朝担任了尚书度支郎。

萧齐初年，沈约担任征虏将军府记室，名义上兼任襄阳县令。他所服务的王，是萧齐的文惠太子萧长懋。太子入居东宫时，沈约为太子步兵校尉，管书记，兼管永寿省，校理四部图书。当时东宫士人很多，沈约特别受到文惠太子的宠信，每次他上班时去见太子，到太阳西下了才出来。当时王侯到东宫，有的得不到允许进去，沈约每每把这事提出来向文惠太子进言。太子说：“我生平懒得起床，这是您知道的，有您和我谈论，然后我才忘记了睡觉。您想让我早早地起床，可以早些进来。”沈约升职为太子家令，后来又以太子家令的本职兼任著作郎，又升为中书郎、本邑的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等职。那时竟陵王萧子良也招纳贤士，沈约与兰陵的萧琛、琅邪的王融、陈郡的谢朓、南乡的范云、乐安的任昉等人都在竟陵王门下出入，当时社会上都说竟陵王得到了

人才。不久沈约兼任了尚书左丞，旋即担任了御史中丞，又改任车骑长史。隆昌元年，授予沈约吏部郎的职务，出任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沈约进号为辅国将军，征招为五兵尚书，升迁为国子祭酒。明帝驾崩，政事归丞相掌管，尚书令徐孝嗣指定沈约撰写遗诏。沈约升为左卫将军，不久又加官通直散骑常侍。永元二年，因母亲年老沈约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于是改授他为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后又授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梁高祖在西邸的时候，与沈约有老交情，所以推举他为骠骑司马，保留了原有的将军封号。那时高祖的勋业已就，天和人都觉得允当，沈约曾试讨高祖（是否有称帝的）心思，高祖默然不应。另一天沈约又进言说：“当今与古代不同，不能用淳朴之风期待万物。士大夫当中攀龙附凤的人，都希望有大大小小的功劳，以保全他们的福分与禄位。现在小到儿童贱如牧人，都知道萧齐的气数已尽，没有不说明您是（取代萧齐的）最恰当的人。天文和人事，表现出改朝换代的征候，自从永元年间以来，尤其明显。讖语说‘行中水，作天子’，这件事还清楚地记得。天心不可违抗，人情不可失却，假如是朝代更替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虽然想谦让，也是不可能的。”高祖说：“我全面考虑一下。”沈约说：“大人您当初在樊、沔统兵，这时候就应该考虑，现在您已成就了王业，有什么要再考虑的？过去武王伐纣，一进入商都，民众就称他为‘我们的君主’，武王不违背民意，也没有什么考虑（就接受了民众的称呼）。大人您自从到了京城，已经改变了气运，比起周武王来，只有时间上迟早的不同。若不早些确定称帝的大业，

体察天愿人望，倘或有一个人有不同主张（而立他人为帝），便有损您的威德。而且人非金石（不是没有变化的），现在有利的局面也很难长久保持。您岂可仅把封于建安这一封号，传留给您的子孙？若已经即位于江陵的和帝回到首都，公卿各就其位，君臣的名分就定下来，就没有异心了。在上的君王圣明，在下的臣子尽忠，哪里还有人与您一起作反贼呢？”高祖同意沈约的说法。沈约出宫后，高祖召见范云告诉了他沈约所说的话，范云回答高祖的与沈约所说的大体相同。高祖说：“聪明人的看法如此不约而同！您明天早上与沈约再来见我。”范云出宫后把这话告诉了沈约，沈约说：“您一定要等我。”范云答应了，但（第二天早上）沈约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进宫。高祖命令他起草有关的文件，沈约就从怀中掏出了（称帝的）诏书和各种委任名单，起初高祖都没有加什么改动。不久范云从外面进来，到了殿门就不能再往里进了，他在寿光阁外徘徊，只是不停地叹气。等沈约走出殿门，范云问他说：“怎么安排我？”沈约举手向左，范云笑着说：“和我的希望没有不同。”过了一会儿，高祖召见范云对他说：“这辈子与沈休文打交道，没有觉察他有什么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今天他才智纵横，可以说见识高明。”范云说：“大人您今天了解了沈约，不异于沈约今天了解了您。”高祖说：“我起兵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功臣和诸位将军，确实有他们的功劳；但成就我帝业的，就是您和沈约两个人。”

（萧衍被封为梁王），梁国建立统治机构的时候，沈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高祖接受禅让后，沈约任尚书仆射，封为建昌县侯，食邑千户，照旧担任散骑常侍。又

拜沈约的母亲谢夫人为建昌国太夫人。捧着册命文书的那一天，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来拜贺，朝野都认为是荣耀的事。不久沈约升任尚书左仆射，仍担任散骑常侍。不久又让沈约兼任领军，加官侍中。天监二年，沈约母亲去世，皇上乘车驾亲自出来吊唁。皇上认为沈约年老，不宜于过于哀伤，就派遣中书舍人去帮他回绝客人节制哭泣。丧事办完后沈约任镇军将军、丹阳尹，设置了佐史。守丧期满，沈约升任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兼任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又升任为尚书令，原任的侍中、太子詹事、中正职务照旧。沈约多次上表谦让，就改授他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前将军，设置了佐史，仍任侍中之职。不久又升任为尚书令，兼任太子少傅。天监九年，沈约改任为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之职照旧，皇上赐给他鼓吹乐队一部。

当初，沈约较久地担任尚书省长官，有心到朝廷其它枢要机构任职。议论的人都说这样做恰当，但皇上最终没有同意。沈约请求到外地任职，又得不到皇上允许。沈约与徐勉一直很好，于是写信给徐勉陈述说：“我小时候孤苦零丁，没有亲属可以依靠，很久以来就几乎沦落，流离困苦，朝夕纠缠，逐渐走上这崎岖的为官之路，当一个小官并非为了自己，只是希望得到微小的俸禄，依靠它东归家园。经过了十年，才忝为襄阳县令，公私之事，不是我完全了解的，只是用自己的身子换取财物，不得不处理这类的事罢了。永明末年，我出任东阳太守，意思是到此为止了。但是建武皇帝机运刚刚开始，人世的事情如胶一样粘着我，到他那里之后我就没有脱身，要离开是不容易的。到了东昏侯即位之初，王政多

门，因此我计划隐退，几乎达到了目的，这事曾托您向徐令解释过，想来您还记得没有忘记。神圣的梁朝兴起后，我谬逢嘉运，以往的志向和潜藏的（归隐）之心，再一次成为不顺畅而难以实现的事了。今年是建立年号的头年，说大礼之年到了，请求告老，事情由皇上裁决。（我想，）我就是不能弘扬德道宣布教化，使朝廷焕发光辉，还想讨寻文簿，时常发表些意见。但是年初以来，我的病有所加重忧虑也迫切了，这原因当是生命有限，劳苦过度，一直这样积累衰耗，到晚年叠加在一起了；拉着车受着鞭子的驱赶行走，努力恭敬地做事。从外表上看，旁人观察我，我好像还是个完整的人，但是我的躯体和精力，已经不能配合了，常常必须过分地勉强自己坚持，才可打起精神。等脱掉衣服躺下，四肢和身体就像不再相连了。我上热下冷，每月都有所加重，每天都在加深，取暖就使我感到烦躁，降低温度就必定使病情更加厉害，降低温度之后体温的差别比取暖时的小，但降温后的痛苦却比取暖时大。过一百天或几句，我常常要移动皮带的孔眼；用手去握臂，大概每月都要小半分。以此推算，怎么能长期支持？假若我的病势不停止地发展，日复一日，必将给圣明的皇上留下无法追悔的怨恨。我想冒昧地上表奏闻，乞求给予告老的品秩。假若天假其年，我还可以得到平安、健康，在才力能承受的限度内，也会为皇上考虑策略的。”徐勉将沈约的意思转告了高祖，请求给予沈约三公的仪仗，没得到允许，只是增加了鼓吹乐队而已。

沈约生性不饮酒，少有嗜好，虽然当时给他的待遇优厚，但是他居家仍节俭朴素。他在东田盖的住宅，可以了望郊外。

他曾写了篇《郊居赋》(略)。

不久加封沈约为特进官，原有的光禄、侍中、少傅诸官不变。天监十二年，沈约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三岁。皇上下诏赠给他原有的官职，赐钱五万、布百匹办丧事，赐谥号称“隐”。

沈约的左眼是双眼仁，腰上有颗紫色的痣，聪明过人。他喜爱古书，藏书达两万卷，京城里没能与他相比的。小时候他孤单贫穷，曾求助于宗族人，得到了数百斛米，被宗族人侮辱，就将米打翻离去了。等到他富贵了，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用这个宗族人做了郡部的传。沈约有一次陪皇上宴饮，参加的人中有一个妓女的师傅是齐文惠太子的宫人。皇上问沈约认不认得来客，沈约回答：“只认识沈家令。”沈约说完伏在桌子上流下了眼泪，皇上也感到悲哀，甚至不得不停止了宴会。沈约历仕三代，对原来的典章制度很熟悉，见闻广博，当时都把他当作榜样。谢玄晖善于写诗，任彦升写文章严谨，沈约兼有他俩的长处，但是都超不过他们。沈约自负才高，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借助时势，为清谈所累。到他居三公之位时，稍稍有所建树就停止追求，每加一官，就恳切地请求引退，但是始终不能离去，议论的人都把他比作山涛。他主持政务十多年，没有推荐什么人，政治上的得失，只是唯唯诺诺而已。

当初，高祖对张稷的事有些内疚，张稷去世后，高祖就把这个心思告诉了沈约。沈约回答说：“尚书左仆射外出作边州刺史，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哪里值得再谈论呢？”皇上认为他们是联姻的关系所以这样说，就大怒道：“先生这样说，

是忠臣应该说的话吗？”就乘辇回内殿去了。沈约感到恐惧，仿佛失去了知觉，高祖起身时，他还是像原来一样坐着。沈约回家，还没有走到床边，就凭空倒在了窗下，因此而病，梦见了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沈约叫一个巫人来看病，巫人说的话跟他的梦相合。沈约就叫来了道士向天表奏赤章，说（齐）禅让（梁）的事，不是自己策画的。高祖派御医徐奘给沈约看病，徐奘回去后详细奏明了沈约的情状。在这件事之前，沈约曾陪皇上宴会，遇到豫州进献栗子，直径有一寸半，皇上感到奇怪，问道：“关于献栗子的事有多少件？”皇上与沈约各自疏理记忆，沈约（说出的）比皇上说出的少三件。沈约出宫后对人说：“这个人爱面子，我不让他的话他就会羞死。”皇上认为沈约出言不逊，想治他的罪，经徐勉坚决地进谏才没治罪。这一次皇上听说了沈约向天奏赤章的事，大怒，让宦官去谴责了他好多次，沈约畏惧就去世了。主管部门拟了给沈约的谥号，称为“文”，皇上说：“心中的感情没完全表达叫做隐。”因此改变了给沈约的谥号称为“隐”。沈约所著《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述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他的《文集》一百卷，都在世上流传。沈约又撰写了《四声谱》，认为过去的词人，千年以来都没有领会，而他独得于心，穷尽了其中的妙旨，自称这是入神之作，高祖认为这书高雅但并不喜欢。皇上问周舍说：“什么叫四声？”周舍说：“天子圣哲，这就是四声。”但是皇上最终没遵用。

沈约的儿子名叫旋，到沈约去世时已经历任过中书侍郎、永嘉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居沈约丧期满后，沈

旋为太子仆，又因为母丧而离职，只吃蔬菜不吃谷物。丧服除去以后，还是拒绝吃粳米高粱，担任给事黄门侍郎、中抚军长史。后沈旋出任招远将军、南康内史，所在之处他都以清廉著称。他死于任上，谥号叫恭侯。他的儿子实为继嗣。

陈朝的吏部尚书姚察说：过去木德将要凋谢，东昏侯即位后虐政横流，民众恐惧，时时刻刻都悬命水火。梁高祖仗义拯救颓溃，立志安宁中国，运筹帷幄，把希望寄托在张良、陈平一样有才干的人身上。遇上了范云和沈约，他们参予计谋，助成了帝业。赞扬范云的机警明达，参加机务对当时做了好事；沈约才高博学，其名仅在司马迁和董狐之下，他们都是兴梁的功臣，是一代英雄、伟人。

【原文】

(任宝菊 译)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

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尝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偷师表，宜善事之。”及为荊州，又为征西记室参军，带廐西令。兴宗卒，始为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转外兵，并兼记室。入为尚书度支郎。

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当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

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迁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迁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时竟陵王亦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俄兼尚书左丞，寻为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明帝即位，进号辅国将军，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定遗诏。迁左卫将军，寻加通直散骑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职，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健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将军如故。时高祖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高祖默而不应。佗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已终，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对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就，何所复思。昔武王伐纣，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违民意，亦无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气序，比于周武，迟速不同。若不早定大业，穆天人之望，脱有一人立异，便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高祖然之。约出，高祖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高祖曰：

“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乘所望。”有顷，高祖召范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梁台建，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高祖受禅，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俄迁尚书左仆射，常侍如故。寻兼领军，加侍中。天监二年，遭母忧，舆驾亲出临吊，以约年衰，不宜到毁，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起为镇军将军、丹阳尹，置佐史。服阕，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迁尚书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陈让，改授尚书左仆射、领中书令、前将军，置佐史，侍中如故。寻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九年，转左光禄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给鼓吹一部。

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于地，契阔屯回，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已，望得小禄，傍此东归。岁逾十稔，方忝襄阳县，公私情计，非所了具，以身资物，不得不任人

事。永明末，出守东阳，意在止足；而建武肇运，人世胶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门，因此谋退，庶几可果，托卿布怀于徐令，想记未忘。圣道聿兴，谬逢嘉运，往志宿心，复成乖爽。今岁开元，礼年云至，悬车之请，事由恩夺，诚不能弘宣风政，光阐朝猷，尚欲讨寻文簿，时议同异。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当由生寻有限，劳役过差，总此凋竭，归之暮年，牵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僴僴。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上热下冷，月增日笃，取暖则烦，加寒必利，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复一日，将贻圣主不追之恨。冒欲表闻，乞归老之秩。若天假其年，还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为言于高祖，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

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效阜。尝为《郊居赋》，其辞曰：

寻加特进，光禄、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时年七十三。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布百匹，谥曰隐。

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少时孤贫，丐于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尝侍宴，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惟识沈家令。”约伏座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

藉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高祖有憾于张稷，及稷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尚书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婚家相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高祖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经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迕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子旋，及约时已历中书侍郎，永嘉太守，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右长史。免约丧，为太子仆，复以母忧去官，而蔬食辟谷。服除，犹绝粳粱。为给事黄门侍郎、中抚军长史。出为招远将军、南康内史，在部以清治称。卒官，谥曰恭侯。子实嗣。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木德将谢，昏嗣流虐艺术堞堞黔黎，命悬晷漏。高祖义拯横溃，志宁区夏，谋谟帷幄，实寄良、平。至于范云、沈约，参预缔构，赞成帝业；加云以机警明胆，济务益时；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焉。

萧子显传

——《梁书》卷三五

【说明】萧子显（489—537年），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人，南朝史学家。他著作甚丰，有《后汉书》一百卷，《南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贵俭传》三十卷，《晋史草》三十卷，《文集》二十卷等数种，但多数亡佚，现存而著名的仅《南齐书》一部。《南齐书》原为六十卷，今本五十九卷，计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佚亡的一卷可能是《序录》。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因此《南齐书》叙述其先祖之事多扬长避短，美恩泄怨，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缺点。但是，此书记载了南齐二十四年间的大事，当代人写当代史，保留了一些可贵的资料，为后来《南史》的修撰准备了大量材料；在叙述方法上以类为序，文字简洁，仍有其可取之处。

萧子显，字景阳，是萧子恪的第八个弟弟。萧子显自幼聪慧，使文献王深感诧异，对他的喜爱超过了其它几个儿子。萧子显七岁时，被封为宁都县侯。永元末年，按照王子例，萧子显被授以给事中的官职。天监初年，他的爵位被降为子爵。

他担任过安西外兵，仁威记事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等官职。

萧子显容貌伟岸，身高八尺，他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曾创作了《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到后称赞说：“这篇赋可以说在申明道理上达到了最高境界，是对《幽通赋》的继承。”萧子显又采集众家《后汉书》，考正同异，著成了独具特色的《后汉书》。他又着手撰写《齐史》，写成之后，上表奏予皇上，梁武帝下诏交付秘阁收藏。萧子显因而累迁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中书郎，守宗正卿等官职。又出京城为临川内史，不久又回到京城，被任命为黄门郎。中大通二年，升为黄门长官，并兼任侍中。高祖非常欣赏萧子显的才干，又赞赏他的仪表言谈，每次他在皇帝的宴席上就坐时，皇上都总要去看他，并询问他。高祖曾信心十足地对萧子显说：“我编纂的《通史》，如果完成了，所有史籍都可以废弃。”萧子显回答道：“孔仲尼赞扬《易经》的大道，《八索》便废黜了，讲述职方氏掌管的档案材料，《九丘》便被清除了。今天皇上创作通史，正与这个意义符合，孔子时代的光景，就要在今天重现了。”当时这一问一答被认为是名对。中大通三年，萧子显以侍中领国子博士。当时，高祖创制的五经义理，没有列入学官，派专人讲解，萧子显成为国子博士后，就上表请求设置助教一人，生徒十人，（专门讲习高祖所创五经义理）。萧子显又得到高祖的允许，编撰《高祖集》，以及《普通北伐记》。这一年，他被提升为国子祭酒，兼领侍中，在学官中顺次讲述高祖的《五经义》。中大通五年，萧子显选为吏部尚书，仍为侍中。

萧子显性情庄重自大，很为自己的才气而自负。他掌握了选任官吏的大权之后，每次会见各种经九品中正制选上来的宾客，都不和人家交谈，仅仅举扇做出谦让的表示而已，因此士大夫们私下都很恨他。但是太宗一直很看重他的为人，当太宗还是太子时，常常把他叫来与自己促膝饮酒。在饮酒过程中，萧子显曾起身入厕，太宗就对周围的坐客讲，“我曾听说特殊的人物总是隔世才出，今日才知道（我们这一世出现了特殊人物）就是萧尚书。”太宗对他的器重由此可见。大同三年，萧子显被调出去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到吴兴郡任所不久，即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朝廷下诏书说：“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子显，神韵飞扬，英俊伟岸，是我们宗族中的优秀人才。刚授大任不久，就不幸殒落了，皇上心中凄恻悲怆。可追赠为侍中、中书令。今天便开始哀悼。”等到安葬萧子显时，家人为他请赐谥号，高祖亲写诏令说：“恃才傲物，应该谥为‘骄’。”

萧子显曾写过《自序》，大概意思是说：“我作为邵陵王府中官属，幸能回到京城，遥想前人，与之相比，就是楚国的唐勒、宋玉，汉朝梁国的严忌、邹阳。追忆平生，很爱好文章辞藻，虽然没有功名成就，但我的内心已经得到满足了。诸如登上高山，极目眺望，驻足河岸，看水流逝，春朝丽日，晓风拂动，秋夜朗朗，明月清清，早晨的小雁，初次啼莺，花开娇艳，落叶无声，遇此情景我就有所反应，每每不能自己。前世的贾逵、傅毅、崔寔、马融、邯郸淳、缪袭、路粹之流，都以文章显名，所以屡次上书歌功颂德，把自己比作古人。天监十六年，我开始参加朝廷的重阳节宴会，在大庭广众之间，

只有我接到皇上的圣旨说：‘今天天气晴和，风景很美，你何不乘兴赋诗。’诗写成之后，皇上又降旨说：‘可以说是才子。’我后来对别人说：‘皇上的这次恩顾，是我从来想都没想到的，将此次受宠比一比贾谊如何？他很难比得上我的。’每次要写作时，很少有思考的功夫，必须是文思自然而来，不是竭尽心力才能写就。自少年以来所作的诗赋，《鸿序》一篇，体裁兼具很多种特点，文辞具备多种流派的优点，很受到好事者的传播，所以徒有的虚名容易远扬。”

萧子显著述的《后汉书》有一百卷，《齐书》有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共二十卷。

（任宝菊 译）

【原文】

子显字景阳，子恪第八弟也。幼聪慧，文献王异之，爱过诸子。七岁，封宁都县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给事中。天监初，降爵为子。累迁安西外兵，仁威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

子显伟容貌，身長八尺。好学，工属文。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累迁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阳尹丞，中书郎，守宗正卿。出为临川内史，还除黄门郎。中大通二年，迁长兼侍中。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宴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

同，复在兹曰。”时以为名对。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五年，选吏部尚书，侍中如故。

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拂而已，衣冠窃恨之。然太宗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大同三年，出为仁威将军、吴兴太守，至郡未几，卒，时年四十九。诏曰：“仁威将军、吴兴太守子显，神韵峻举，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丧殒，惻怆于怀。可赠侍中、中书令。今便举哀。”及葬请谥，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

子显尝为《自序》，其略云：“余为邵陵王友，幸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

子显所著《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魏收传

——《北齐书》卷三七

【说明】魏收（507—572年），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朝著名史学家。他多次担任史职，直接参予修国史的工作，最终完成了《魏书》。其书主要记述了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至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十二本纪、九十二列传，以及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等十志。因系当代人修当代史，《魏书》刚完成，即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秽史”，历代多因此相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魏收直笔无隐而揭人阴私所致，另外，他恃才傲物，难免评品标准树立太高，有求全责备之处。全面看，《魏书》不能称为“秽史”，但缺点不少：它以东魏为主，于是每多挂漏，突出表现在《地形志》中；对高欢事溢美太多；津津乐道轮回报应之事。但《魏书》详细而较全面地记叙了北魏自鲜卑拓跋部到东魏的历史过程，有关材料，大部分赖以保存，是仅存的一部完整的魏史，其史料价值是不容忽略的。

魏收，字伯起，乳名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他的曾祖名缙，祖父名韶。他的父亲名子建，字敬忠，赠官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魏收十五岁时，就已经写了好些文章了。他跟随父亲到边疆去后，就喜欢学习骑马射箭，想凭武艺取得显贵。荥阳的郑伯调侃说：“魏郎您能弄多少戟？”魏收惭愧，于是就改变志向而专心读书。夏天，他坐在板床上，随着树阴的移动而移动诵读诗书，一年下来，板床因此而木板大减，但魏收读书的精神却不减。这样，魏收就以文章华丽著名当世。

开始，魏收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尔朱荣在河阴滥害朝廷士人的时候，魏收也在其迫害的范围之中，因为已到黄昏所以得以幸免。吏部尚书李神隽重视魏收的才学，上奏皇上授予了魏收司徒记室参军的职务。永安三年，任命他为北主客郎中。节闵帝即位后，用巧妙的方法精简近侍，下诏考试魏收以《封禅书》为题。魏收下笔便写成了，连草稿也不打，将近千字的文章，所修改的地方没有几处。当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一旁，大为惊奇，就对皇上说：“虽然是曹植七步为诗的才能，也超不过魏收写这《封禅书》。”这样，魏收升任为散骑侍郎，不久皇上又下令让他典起居注，并参加修国史，兼任中书侍郎，当时魏收二十六岁。

孝武帝初年，又下诏魏收兼管本职，公文制诰尽管堆积很多，魏收处理下来都符合皇上的意图。黄门郎崔陵跟从齐神武帝入朝进见皇上，气焰逼人，魏收开始不上门去拜访。崔陵为皇上登基作赦书，说：“朕托体孝文”，魏收嗤笑这句话率直。正员外郎李慎把这事告诉了崔陵，崔陵深为愤慨忌恨。

当时节闵帝逝世，命令魏收写诏书。崔陵就散布说：魏收在节闵帝在世时出入帷幄，每天写诏书，文辞和主旨都很优秀，但是举义旗的士人全变成了叛逆；再有，魏收的父老，符合解除官职归侍乡里。南台将要对魏收加以弹劾，全靠尚书辛雄给中尉慕容加以解释，才化解了。魏收有个同父异母弟名仲同，原先没有登记，因此恐惧，上了户籍后，就遣送他回乡帮助那里做事去了。孝武帝曾发动大批的士兵，在嵩少之南打猎十六天。当时天寒，朝野都埋怨叹息。皇上与跟从的官员及各位妃子，奇装异饰，多不合礼的规定。魏收想说但又害怕，想沉默又按捺不住，就上了《南狩赋》作为讽谏，当时他二十七岁，虽然文辞丰富淫丽，但都归于典雅淳正。皇上亲笔回信，信中到处是表扬赞美的话，郑伯对他说：“您不遇到老夫，也应该去追逐兔子了。”

当初齐神武帝（高欢）坚持推辞天柱大将军的封号，魏帝令魏收草诏，命令允许齐神武帝的请求。皇上想加齐神武帝为相国，问给他什么品秩，魏收据实回答，皇上才停止下达这一命令。魏收既然推测不了主相的意图，因为以前的事就不安心，于是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皇上下诏同意了。过了很久，任命魏收为皇上兄长的儿子广平王元赞的开府从事中郎，魏收不敢推辞，就写了篇《庭竹赋》抒发自己的情怀。不久，他又兼任中书舍人。他与济阴的温子升、河南的邢子才齐名，当世号称三才。当时孝武帝猜忌高欢，内部有矛盾，魏收于是托病坚持辞官而免除了职务。他的舅舅崔孝芬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辞官），魏收回答：“害怕有晋阳那样的兵事。”不久齐神武帝南上，皇上就西入潼关了。

魏收兼任通直散骑侍，作为王昕的副手出使梁，王昕文辞辩论风流，魏收辞藻富逸，梁帝及其群臣都对他们恭敬异常。原先南北刚刚和解，李谐、卢元明首次承担通好的使命，两人的才能器度，同为邻国所重视。到这时候，梁帝称赞说：“卢、李著名于当世，王、魏又继而兴起，不知后来的情况还会怎样？”魏收在客馆，买了吴地婢女进入客馆，他的部下有买婢女的，魏收也召唤这些婢女来，遍行奸秽，梁朝客馆的主管官员都因此而获罪。人们称赞他的才能而鄙视他的行为。他在出使途中作了篇《聘游赋》，辞藻十分优美丰富。出使回来后，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向王昕和魏收要南方的特产，未能如愿，于是就委婉地告诉御史中尉高仲密把二人拘留在御史台，过了很久才得到释放。

孙搴死后，司马子如推荐魏收，召他到晋阳，让他担任中外府主簿。因为接受旨意有抵触，受到鞭打，很久不得志。遇到司马子如奉命出使参予朝廷大事，魏收就借他的光。司马子如借宴会的机会开玩笑似地对齐神武帝说：“魏收是天子的中书郎，是一国的大才，愿大王给他点面子。”这样才将魏收转为王府的属官，但没有什么优厚的礼遇。

魏收的伯父季景，有才学，官职和名声都在魏收之上，但魏收常常欺压他。季景、魏收当初赴并州时，顿丘的李庶，是已故大司农李谐的儿子，因为辩论华美而著称，他曾跟魏收说：“参予朝政便有两个姓魏的。”魏收直截了当地说：“把我和我伯父相提并论，就像把耶输与您相比一样。”所谓耶输，是已故尚书令陈留公继伯的儿子，他愚蠢痴呆是有名的，喜欢自己到市场去，高价买东西，商人们都嗤笑他，把他当作

玩物。魏收小看季景，所以用此作比，不尊敬伯父的例子大多和这件事差不多。

魏收以文才为本，一定要希望以文才脱颖而出、表现自己的智慧，在官场上不顺畅，就请求修国史。崔暹在高澄那里帮魏收说话（想让魏收实现愿望），他说：“修国史是件大事，公家父子霸王功业，都须完全写出来，这事非魏收不能完成。”高澄就启用魏收兼任散骑常侍，修撰国史。武定二年，任命魏收为正常侍，兼中书侍郎，仍旧修史。魏静帝宴请百官，问为什么叫“人日”，别人都不知道。魏收回答说：“晋朝的议郎董勋在《答问礼俗》中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当时邢邵也在魏静帝旁边，感到很惭愧。自从东魏与梁朝和好，东魏给梁朝的信件中每次都有一句话：“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朝后来派使者来，他们带来的信件就去掉了“彼”字，自称还是使用“此”字，想表示梁朝与东魏是不以内外分的。魏收拟定回信说：“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朝以后回信，就依照这样的写法了。后来齐神武帝入朝，魏静帝授予他相国，他坚决推让，就命令魏收写信（辞让）。写好信后呈上魏静帝，当时高澄正在旁侍立，齐神武帝指着魏收说：“这人当是又一个崔光。”武定四年，齐神武帝在西门豹祠设宴集会，对司马子如说：“魏收担任史官，写我们这些人的善恶之事。我听说北伐的时候，诸位贵人经常馈赠给史官饮食，请问您司马仆射是否馈赠得很多呢？”引起了众人一阵大笑。接着又对魏收说：“您不要看元康等人在我的眼前奔走，就说我认为他们勤劳，我死后的名声在您的手中，不要

认为我不知道。”不久就又让魏收兼任了著作郎。

魏收以前在洛阳时，表现特别轻薄，人们称他“魏收惊蛱蝶”。高澄曾游东山，命令给事黄门侍郎颢参加宴会。高澄说：“魏收倚仗才能不分时候，必然揭他的短。”（众人与魏收舌战）往复数次，魏收忽然大叫道：“杨遵彦理屈，已经被驳倒了！”杨遵彦从容回答：“我的闲功夫绰绰有余，山立不动，不过倘若遇上了面对大路的东西，恐怕就会翩翩飞舞而消逝了。”面对大路的，就是魏（阕），翩翩飞舞的，就是蛱蝶。高澄首先理解了这话的意思，大笑着称赞这话说得妙。高澄又说：“刚才说的（魏收的短处）还是些细微的，应该再指斥（他大的短处）。”杨遵彦应声说：“魏收在并州作了篇诗，对众人宣读完后，他说：‘即使给我伯父季景六百斛米，他也不理解这首诗的意思。’这事远远近近都知道，我不敢瞎说。”高澄高兴地说：“我也早听到了。”众人都笑了。魏收虽然自己加以申辩，但不再坚持抗拒，不过他终身都记恨此事。

侯景叛乱后进入梁朝地界，高澄当时在晋阳，命令魏收写五十多张纸长的檄文，魏收不到一天就写完了。又写讨伐梁朝的檄文，命令送给侯景，魏收天黑后不久开始执笔，三更就写成了，檄文长超过了七张纸。高澄称赞他文章写得好。魏静帝曾在季秋举行大射，令大家都写诗，魏收写的诗末尾说：“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高澄认为写得很雄壮，环视众人说：“朝廷中现在有魏收，这便是国家的光采，他为文高雅易懂，通达纵横。我也让邢子才、温子升经常写些诗，（其中也有好的）至于词气，都赶不上魏收。我有时候想到些什么，忘记了没有说出来，或者说得不完全，意思有没有说

到的，魏收呈上的草稿都加以完善，这也是难得的。”又下令魏收兼主客郎迎接梁朝使臣谢玢、徐陵。侯景陷落了梁朝以后，梁朝的鄱阳王萧范当时为合州刺史，高澄下敕书给魏收让他写信去晓喻萧范，就入据了萧范原占的城池。高澄对魏收说：“现在安定了一州，您出了力，我还恨‘尺书征建邺’这句诗没有成为现实。”

高澄驾崩后，文宣帝到了晋阳，令魏收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以及吏部郎中尉瑾在北第掌管机密。后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升他为定州大中正。当时北齐将接受禅让，杨遵彦奏请将魏收安置在一个专门的屋中，令他撰写有关禅让的诏书册命等文字，遣派徐之才守住房门不让魏收出来。天保元年，北齐文宣帝任命魏收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他为“富平县子”。

天保二年，下诏魏收撰写魏朝史。天保四年，升任魏郡尹，有意给他优厚的奉禄、更多的精力，让他一心放在史馆，不问郡中事务。当初，文宣帝令群臣各自陈说自己的志向，魏收说：“臣下我愿得以在史馆中直笔写史，早些完成魏书。”所以文宣帝让魏收专心他的任务。又下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修魏史，他只是署名罢了。文宣帝下令魏收说：“您尽管直笔写史，我终究不作魏太武帝诛杀史官那样的事。”开始的时候，北魏初年邓彦海撰写了《代记》十多卷，此后崔浩主管修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等人继承这了一事业。崔浩采用编年体，李彪首先用它分别作了纪、表、志、传，这书还没有传出来。宣武帝时，命邢峦补写了《孝文起居注》，写到了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它，写到了孝明

帝，事情写得很详细。济阴王元晖业撰写了《辨宗室录》三十卷。魏收于是组织通直常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一起广泛收集、斟酌以上的材料，用以完成《魏书》。于是分辨、拟定名称，随每条之后加以鉴别说明，又搜集采录流散（的材料），续写补作孝明帝以后之事，使元魏一代的史书得以完整，魏收上表报告了此事：写成了一代大典，总计十二本纪，九十二列传，共一百一十卷。这事是在天保五年上奏的。这一年秋，任命魏收为梁州刺史。魏收因为《魏书》的志没有完成，上奏请求让他全部写完，得到了允许。这年的十一月，再奏上了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共二十卷，加上原写的纪传部分，共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帙。这部史书有凡例三十五条，二十五个序文，九十四段论说，魏收前后所上的两个表文和一封信。

魏收带领的史官，因为怕（用人不当而）欺凌威逼自己，就只选取原先依附自己的学人。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虽然一直在朝做官，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因为儒学知名，完全不能承担编辑史书的工作；高孝干用不正当手段求取进入了修史班子。参加修史的这些人的祖宗姻戚多被写入了《魏书》，并用好话美化也们。魏收性情很急，不怎么能公允写史，对与他一直有怨恨的人，多数都将他们的好事埋没（不写）。他经常说：“什么东西，敢与魏收作对？我魏收抬举他就会让他上天，按一下他就一定使他入地。”当初魏收在神武帝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到过阳休之的帮助，所以魏收感谢他说：

“没有什么感谢您的恩德，我当为先生您作一篇好的传记。”阳修之的父亲阳固，在元魏时任北平太守，因为贪虐被中尉李平弹劾而被治罪，记载在《魏起居注》中。魏收在《魏书》中却写道：“阳固为北平太守，惠政很多，因公事牵连被免去了官职。”又说：“李平（对阳固）深相敬重。”对于元魏来说尔朱荣是奸贼，魏收因为高氏是从尔朱荣那里出来的，而且接受了尔朱荣儿子送的金银，所以减少了尔朱荣的恶行而增写了他的善事，并议论说：“若说到培养德义的风气，那么豕韦、大彭、伊尹、霍光这些人那里谈得上呢？”

当时的议论已经说魏收写史书不公平，文宣帝就下诏魏收让他在尚书省与各家的子孙共同讨论，前后来投诉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说遗漏了他家的世系职位，有的说他家没有被写入史书，有的说对他家妄加非议攻击。魏收都在状纸上一一作了回答。范阳卢斐的父亲卢同附在他所出之族祖卢玄传记的后面，顿丘李庶家的传记说他家本是梁国蒙县人，卢斐、李庶就讥讽说：“这是史官没有据实记载。”魏收性急，抑制不住愤怒，写信给皇上诬告说卢、李等人想加害他。皇上大怒，亲自追究责任。卢斐说：“臣下的父亲在元魏做官，职位到了仪同三司，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但与魏收没有亲戚关系，于是不给我父亲立传。博陵的崔绰，官位只到了本郡的功曹，更没有事迹，只是他是魏收的外亲，就把他安排到了传记的最前面。”魏收说：“崔绰虽然没有高位，名义可嘉，所以应该写传。”皇上说：“您根据什么知道他是好人？”魏收说：“高允曾经当过崔绰的助理，他说他有道德。”皇上说：“司空是才士，当人的助理，当然要称赞他助理的人。这也如

您为别人作文章，您说他好的难道都符合事实？”魏收无话对答，只有恐惧颤抖。但皇上原先就看重魏收的才干，不想加罪于他。当时太原的王松年也攻击《魏书》，和卢斐、李庶一起被判了罪，各自被鞭打后发配到工场，有的因此而致死，卢思道也被判了相应的罪。但是皇上还是因为众人议论纷纷，下令《魏书》姑且不要公开，让百官进行广泛的讨论；听任有家事（与《魏书》相关的人）进官署（申说），认为记载不符合事实的写信陈述。这样一来众口喧然，称《魏书》为“秽史”，投书的人一个接一个，魏收无法抵抗。当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两人势倾朝野，与魏收都是亲戚，魏收都为他们家作了传记。这两人不想说《魏书》不实，就压制唐塞诉辞，终文宣帝之世也没有重新提出来议论。又有尚书陆操曾经对杨愔说：“魏收的《魏书》可以说是见识广博的大才手笔，对元魏立了大功。”杨愔对魏收说：“这是说《魏书》是无须修改的书，会流传万古，只是遗憾其中说到各家后裔、婚姻过于繁琐细碎，与过去史书的体例不同罢了。”魏收说：“过去因为中原丧乱，各家的谱牒资料，大略都遗失流散完了，所以《魏书》把各家的支系全写出来。希望大人从缺点中体知我的好心，以免更多地责备我。”

天保八年夏季，任命魏收为太子少傅、监修国史，恢复了参议律令。（铜雀、金兽、冰井）三台建成后，文宣帝说：“三台落成须有赋。”杨愔先将这话告诉了魏收，魏收就上了《皇居新殿台赋》，文章写得十分壮丽。当时有写这一题目的作者，自邢邵以下都赶不上魏收。魏收在呈上自己的赋以前就将此事告诉了邢邵。邢邵后来告诉人说：“魏收实在可恶，

不早些说这事。”皇上曾游东山，下令魏收作诏书，（魏收在诏书中）宣扬威德，以关西为譬喻，不一会儿就完成了，词宏理壮。皇上当着百官大大地赞叹了一番，让魏收继续担任太子詹事。

魏收娶他舅父的女儿，即崔昂的妹妹，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儿子。魏太常刘芳的孙女，中书郎崔肇师的女儿，因为丈夫家受连坐，皇上把她们都赐与魏收为妻，当时的人把魏收与贾充置左右夫人相比。但是也没有生下儿子。魏收后来病重，怕死后妻妾不能相处，就让后来的两个妾回自己娘家去了。后来魏收疾病痊愈追忆此事，写了《怀离赋》来抒发自己的怀念之意。

文宣帝每次在宴会上酒酣之后，就说：“太子性情懦弱，宗庙社稷的事情重大，最后将传位给常山王。”魏收对杨愔说：“古人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动摇。皇上三杯酒后，每次都说传位给常山王，让臣下们怀疑不定。倘若说的是实话，便必须决定实行。这话可不能儿戏。魏收我既然忝为师傅，按照道理当以死坚持（太子的继承权），只是担心会造成国家不安定罢了。”杨愔把魏收的话告诉了文宣帝，文宣帝从此便不再说立常山王的事了。皇上多次举行喜宴，魏收每次都参予侍从。皇太子纳郑良娣为妾那一次，主管部门完备地设置了牛羊等祭品，皇上畅饮之后，起身动手将祭品掀翻了，顺势问魏收：“知不知道我的意思？”魏收回答说：“臣愚蠢地认为良娣既是太子的妾，按理不须使用牛羊祭品，我仰度皇上的思想，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掀翻祭品的。”文宣帝大笑，握住魏收的手说：“您知道我的意思。”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的

女儿为妃，后来皇上亲自到李祖收的宅第宴会，而妃子的母亲献了两只石榴在皇上面前。皇上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竟没人知道。皇上就把石榴掷在地上。魏收说：“石榴中多籽，安德王新婚，王妃的母亲想子孙众多。”皇上大喜，命魏收说：“您到我这里来。”为此事赐给魏收美锦两疋。天保十年，任命魏收为仪同三司。皇帝在宴席上，口命魏收为中书监，命令中书杨愔在树下起草诏书，杨愔因为魏收是一代盛才，不敢草率，很久没写完。至杨愔诏书写成之时，皇上已从醉梦中醒来，就不再说起这事，杨愔因此不将诏书上奏，这事就搁置下来了。

文宣帝在晋阳驾崩时，用驿传召魏收和中山太守阳休之参加议论吉凶礼仪，并掌诏诰。仍任命魏收为侍中，提升为太常卿。文宣帝的谥号及庙号、陵寝的名，都是采用的魏收的意见。孝昭帝位居中宰那件事，命令魏收在宫内写各种诏书，好几天都没有出宫门。转调他为中书监。皇建元年，任命魏收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三司、监国史。魏收原先作为王昕的副手出使梁朝，互不协调和睦。当时王昕的弟弟王愔与王昕亲密。而孝昭帝另外任命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魏收留在邺，大概是王昕所做的工作，魏收心中很不平，对太子舍人卢询祖说：“假如让您去作文诰，我也没有说的了。”又任命祖珽为著作郎，想用他代替魏收。司空主簿李翥，是个文词好的士人，听说这些事后就告诉人说：“典诏诰都归了阳休之，著作郎又让祖珽去担任，文史立刻都抛弃了，怕魏收大人会背上流汗吧！”当时下诏让百官议论确定（封前两朝的王族后裔为诸侯国君）二王和（前代三个王朝的

子孙)三恪,魏收持王肃、杜预的标准,以元、司马氏为二王,所有曹姓为三恪。受诏参议的诸位礼学之官,都持郑玄关于确立二王三恪标准的议论。孝昭皇后姓元,认为确定三恪不想涉及的人太广,所以同意了魏收的议论。又任命魏收担任了太子少傅,解除了侍中职务。

皇上因为《魏书》尚未公开,下诏魏收更加研究审查。魏收奉诏后,改正得不少。到下诏公开魏史之时,魏收认为总把《魏书》置于秘阁,外人没有机会看见,于是皇上命令送一套给并省,一套给邺下,任人抄写。

大宁元年,加魏收为开府仪同三司。河清二年,兼右仆射。当时武成帝终日酣饮,朝中之事专门委托给侍中高元海。高元海平凡庸俗,不堪大任,因为魏收才名振俗,都官尚书毕义云长于决断,就虚心倚仗他们两人。魏收畏惧,想逃避不能匡救时局之罪,被议论的人所讥讽。武成帝在华林另外盖了玄洲苑,充满了山水台观的美丽,下诏在阁下画上魏收的像,皇上就是这样看重他。

开始魏收比温子升、邢邵稍微升迁得慢些,邢邵被逐放,温子升因罪死于监牢,魏收于是就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互诋毁,各自都有朋党。魏收经常批评贬低邢邵的文章。邢邵又说:“江南的任昉,文体本于疏,魏收不是直接模拟,也是大大地剽窃他的。”魏收听到这话后说:“他常在《沈约集》中作贼,有什么脸说我偷任昉。”任昉、沈约都有大名声,邢邵、魏收各有所好。武平年间,黄门郎颜之推将邢、魏二人的意见拿去问仆射祖珽,祖珽回答说:“知道邢邵、魏收两人所肯定的和否定的,那就是任昉和沈约的优劣。”魏

收因为温子升完全不作赋，邢邵虽然有一两首，但作赋不是他的长处，就说：“有集会就须作赋，才能成为大才士。仅以章表、碑志自许，这就是儿戏了。”自武定二年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事的文件，都是魏收所作。每有军情急事，魏收受诏立即就写成，有时宦官催促，魏收笔下如同早就有已写成的一样，敏捷迅速，是邢邵、温子升所赶不上的，他参议典礼表现的才能与邢邵不相上下。

（以上有脱文）几年后得以赦免，魏收知道后就怪罪他，事情暴露后除去了魏收的官爵。这一年又因为托附陈朝使臣封孝琰，魏收书面命令他的门客与封孝琰一起走，遇上昆仑来的船到了，得到了似猴的猓然皮做的褥面、盈尺的美玉等奇货数十件，按所犯罪应当处以流放，最后以金赎罪论处。武定三年，起用魏收任命为清都尹。不久皇上派遣黄门郎元文遥下敕书给魏收说：“您是本朝的老人，帮我家做事最久，前次您的罪过，按情理在可恕之列。最后令您为尹，不是说这是个好的授职，但是刚起用您，斟酌后只好如此决定，朕岂可以使用您的才而忘了您这个人，等到十月，当归还您开府的职务。”天统元年，任命魏收为左光禄大夫。二年，代理齐州刺史，不久就正式任命他为齐州刺史了。

魏收因为侄子年少，就严厉地对他们进行管教，著了一篇《枕中篇》（略）。

这以后群臣多说《魏书》不实，武成帝再次下令重新审查，魏收又将《魏书》收回修改。这样，就为卢同立了传，崔绰的传变为了附传。杨愔家的传，本来说：“有魏以来一门而已”，到这时就改了这八个字；又，原先说：“弘农华阴人”，

改成了“自己说是弘农人”，用它来配王慧龙的“白云太原人”。这是魏收的失误。

不久任命魏收为开府、中书监。武成帝驾崩，还未发表。在朝诸公认为后主即位有将近一年了，对下赦令迟疑不决。诸公引魏收去见后主，魏收坚持（新皇帝即位）应当有恩泽的表示，就听从了他的意见。魏收掌诏诰，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至特进。魏收上奏请求让赵彦深、和士开、徐之才共监五礼事。上奏之前，魏收先将此事告诉了和士开，和士开十分吃惊，推辞说自己不学无术。魏收说：“天下事都取决于王，五礼不是王决定不了。”和士开表示感谢并同意了此事。魏收还荐引了不少文士让他们参加写作，儒学学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是实际上的主持人。武平三年，魏收去世。朝廷赠给他司空、尚书左仆射官，谥号文贞。魏收有文集七十卷。

魏收是个饱学之士、盖世大才，但生性偏持，不能够充分把握命运体现道义。他遇见掌握大权的贵人，每次都以言、色取悦。但他提拔奖掖后辈，则以他们的名声和行为作为首要条件，对那些浮华轻薄奸滑的人，虽然他们有才能，也不予重用。最初河间的邢子才和季景与魏收都因为文章好而显达，世称“大邢小魏”，说他们才智特别出众。魏收比邢子才小十岁，邢子才每每说：“魏收是同僚中的伟人。”后来魏收的名气刚刚能与邢子才相比，文宣帝就贬邢子才说：“您的才不及魏收。”魏收就愈发志得意满了。他在《魏书·自序》中说：“早先温、邢并称，后来邢、魏并提。”然而魏收内心认为邢子才浅陋，心里对他不服气。魏收既是个轻率性急之人，

所以好声乐，善跳胡舞。文宣帝末，数次在东山与诸多优伶一起搞猕猴与狗斗，皇上对他很溺爱亲近。魏收的妻兄博陵崔岩曾用双声词嘲弄魏收说：“愚魏衰收。”魏收回答说：“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苓笼，著孔嘲玎。”他辩论的迅捷毫不拘谨就是这样。他既然掌握了史笔，就对人多有得罪，齐被亡的那一年，魏收的坟墓被挖，把他的骨头抛到了外面。原先魏收过继了弟弟的儿子魏仁表作为继嗣。魏仁表职位到了尚书膳部郎中，隋朝开皇年间在温县令任上去世。

(赖长扬 译)

【原文】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人也。曾祖缉，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赠仪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颇已属文。及随父赴边，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遂折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以文华显。

初除太学博士。及尔朱荣于河阴滥害朝士，收亦在围中，以日晏获免。吏部尚书李神隽重收才学，奏授司徒记室参军。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时黄门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时年二十六。

孝武初，又诏收摄本职，文诰填积，事咸称旨。黄门郎崔陵从齐神武入朝，熏灼于世，收初不诣门，陵为帝登阼赦，云“朕托体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员郎李慎以告之，陵深愤

忌。时节闵帝殂，令收为诏。倭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帟幄，一日造诏，优为词旨，然则义旗之士尽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归侍。南台将加弹劾，赖尚书辛雄为言于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贱生弟仲同，先未齿，因此怖惧，上籍，遣还乡扶持。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天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体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郑伯谓曰：“卿不遇老夫，就应逐免。”

初神武固让天柱大将军，魏帝敕收为诏，令遂所请。欲加相国，问品秩，收以实对，帝遂止。收既未测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诏许焉。久之，除帝兄子广平王赞开府从事中郎，收不敢辞，乃为《庭竹赋》以致己意。寻兼中书舍人，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时孝武猜忌神武，内有间隙，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收曰：“惧有晋阳之甲。”寻而神武南下，帝西入关。

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风流文辩，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畏。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收在馆，遂买吴婢入馆，其部下有买婢者，收亦唤取，遍行奸秽，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赋》，辞甚美盛。使还，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求南货于昕、收，不能如志，遂讽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于其台，久之得释。

及孙搴死，司马子如荐收，召赴晋阳，以为中外府主簿。

以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捶楚，久不得志。会司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余光。子如因宴戏言于神武曰：“魏收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以颜色。”由此转府属，然未甚优礼。

收从叔季景，有才学，历官著名，并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顿丘李庶者，故大司农谐之子也，以华辩见称，曾谓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尔曰：“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耶输者，故尚书令陈留公继伯之子也，愚疾有名，好自入市肆，高价买物，商贾共所嗤玩。收忽季景，故方之，不逊例多如此。

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而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于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时邢邵亦在侧，甚恧焉。自魏、梁和好，书下纸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梁后使，其书乃去“彼”字，自称犹著“此”，欲示无外之意。收定报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梁人复书，依以为体。后神武入朝，静帝授相国，固让，令收为启。启成呈上，文襄时侍侧，神武指收曰：“此人当复为崔光。”四年，神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党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

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

收昔在洛京，轻薄尤甚，人号云“魏收惊蛱蝶”。文襄曾游东山，令给事黄门侍郎颢等宴。文襄曰：“魏收侍才无宜适，须出其短。”往复数番，收忽大唱曰：“杨尊彦理屈已倒。”愔从容曰：“我绰有余暇，山立不动，若遇当涂，恐翩翩遂逝。”当涂者，魏；翩翩者，蛱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称善。文襄又曰：“向语犹微，宜更指斥。”愔应声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诗，对众读讫，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远近所知，非敢妄语。”文襄喜曰：“我亦先闻。”众人皆笑。收虽自申雪，不复抗拒，终身病之。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时在晋阳，令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赋诗，收诗末云：“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文襄壮之，顾诸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怀，忘而不语，语而不尽，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难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谢玢、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阳王范时为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书喻之。城得书，仍率部伍西上，刺史崔圣念入据其城。文襄谓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犹恨‘尺书征建邺’未效耳。”

文襄崩，文宣如晋阳，令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掌机密。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

郎，封富平县子。

二年，诏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尔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诏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部通直帝侍房延佑、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请终业，许之。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凡二十卷，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焉。

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佑、辛元植、睦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干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氏出自尔朱，且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

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范阳卢斐父同附出族祖玄《传》下，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蒙人，斐、庶讥议云：“史书不直。”收性急，不胜其愤，启诬其欲加屠害。帝大怒，亲自诘责。斐曰：“臣父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止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名义可嘉，所以合传。”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战栗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时太原王松年亦谤史，及斐、庶并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卢思道亦抵罪。然犹以群口沸腾，勅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又尚书陆操

尝谓愔曰：“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

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监国史，复参议律令。三台成，文宣曰：“台成须有赋。”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台赋》，其文甚壮丽。时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寻逮焉。收上赋前数日乃告邵。邵后告人曰：“收甚恶人，不早言之。”帝曾游东山，敕收作诏，宣扬威德，譬喻关西，俄顷而讫，词理宏壮。帝对百僚大嗟赏之。仍兼太子詹事

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太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然无子。后病甚，恐身后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忆，作《怀离赋》以申意。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终当传位常山。”收谓杨愔曰：“古人云，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实，便须决行。此言非戏。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白于帝，自此便止。帝数宴喜，收每预侍从。皇太子之纳郑良娣也，有司备设牢饌，帝既酣饮，起而自毁覆之。仍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谓良娣既东宫之妾，理不须牢，仰惟圣怀，缘此毁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

“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十年，除仪同三司。帝在宴席，口敕以为中书监，命中书郎杨愔于树下造诏。愔愔以收一代盛才，难于率尔，久而未讫。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

及帝崩于晋阳，驿召收及中山太守阳休之参议吉凶之礼，并掌诏诰。仍除侍中，迁太常卿。文宣谥及庙号、陵名，皆收议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禁中为诸诏文，积日不出。转中书监。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协睦。时昕弟晞亲密。而孝昭别令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收留在邺，盖晞所为。收大不平，谓太子舍人卢询祖曰：“若使卿作文诰，我亦不言。”又除祖珽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曰：“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恐魏公发背。”于是诏议二王三恪，收执王肃、杜预义，以元、司马氏为二王，通曹备三恪。诏诸礼学之官，皆执郑玄五代之议。孝昭后姓元，议恪不欲广及，故议从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

帝以魏史未行，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及诏行魏史，收以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

大宁元年，加开府。河清二年，兼右仆射。时武成酣饮终日，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书毕义云长于断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为议者所讥。帝于华林别起玄洲苑，备山水台观之

丽，诏于阁上画收，其见重如此。

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流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邵文。邵文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横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具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自武定二年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诏立成，或时中使催促，收笔下有同宿构，繁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其参议典礼与邢相埒。

既而赵郡。公。增年获免，收知而过之，事发除名。其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猥然襦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三年，起除清都尹。寻遣黄门郎元文遥敕收曰：“卿旧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为尹，非谓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岂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当还卿开府。”天统元年，除左光禄大夫。二年，行齐州刺史，寻为真。

收以子侄少年，申以戒厉，著《枕中篇》，其词曰：

吾曾览管子之书，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迨而味之，喟然长息。若夫岳立为重，

有潜戴而不倾；山藏称固，亦趋负而弗停；吕梁独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险，或踣踵而不惊；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举；王纪当定，想僞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则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术，盖乘之而靡恤。被期远而能通，果应之而可必。岂神理之独尔，亦人事其如一。呜呼！处天壤之间，劳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牵之以名利，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无足而俱致；于是乎骄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则上知大贤，唯几唯哲，或出或处，不常其节。其舒也济世成务，其卷也声销迹灭。玉帛子女，椒兰律吕，谄谀无所先；称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恶莫之前。勋名共山河同久，志业与金石比坚。斯盖厚栋不桡，游刃韡然。逮于厥德不常，丧其金璞。驰骛人世，鼓动流俗。挟汤日而畏寒，包嶮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浊，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胶漆诎坚，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荣而就辱。欣戚更来，得丧仍续。至有身御魑魅，魂沉狴狱。诎非足力不强，迷在当局，孰可谓车戒前倾，人师先觉。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锋，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己。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有一于斯，郁为羽仪。恪居展事，知无不为。或左或右，则髦士攸宜；无悔无吝，故高而不危。异乎勇进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产，邀万钟之秩，投烈风之门，趣炎火之室，载蹶而坠其貽宴，或蹲乃丧其贞吉。

可不畏欤！可不戒欤！

门有倚祸，事不可不密；墙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谛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执强梁，人囚径廷。幽夺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为己信，私玉非身宝。过涅为绀，逾蓝作青。持绳视直，置水观平。时然后取，未若无欲。知止知足，庶免于辱。

是以为必察其几，举必慎于微。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昔蘧瑗识四十九非，颜子几三月不违。跬步无已，至于千里。覆一簣进，及于万仞。故云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可大可久，与世推移。月满如规，后夜则亏。槿荣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损，孰有损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体真者惧其大。道尊则群谤集，任重而众怨会。其达也则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狈。无曰人之我狭，在我不可而覆。无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无不有也；如谷之虚，无不受也；能刚能柔，重可负也；能信能顺，险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庙之人，三缄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后。俾诸来裔，传之坐右。

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重敕更审，收又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崔绰返更附出。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白云弘农”，以配王慧龙白云太原人。此其失也。

寻除开府、中书监。武成崩，未发丧。在内诸公以后主即位有年，疑于赦令。诸公引收访焉，收固执宜有恩泽，乃

从之。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收奏请赵彦深、和士开、徐之才共监。先以告士开，士开惊辞以不学。收曰：“天下事皆由王，五礼非王不决。”士开谢而许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武平三年薨。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有集七十卷。

收硕学大才，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间邢子才及季景与收并以文章显，世称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岁，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伟。”后收稍与子才争名，文宣贬子才曰：“尔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称温、邢，后曰邢、魏。”然收内陋邢，心不许也。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帝宠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零笼，著孔嘲玎。”其辩捷不拘若是。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豕被发，弃其骨于外。先养弟子仁表为嗣。位至尚书膳部郎中，隋开皇中卒于温县令。

李延寿传

——《北史》卷一〇〇

【说明】李延寿（约 595—？），字遐龄，相州人（今河南安阳），唐初著名史学家。其父李大师（570—628 年）早年即有“著述之志”，欲改变以往南北史中南北相互诬骂、详本国略别国、因民族偏见而失实的种种弊病，以编年体的形式写出一部新的南北朝史，未果而逝，遂成“没齿之恨”。李延寿自贞观年间起，即参加朝廷组织的修史工作，得到了接触有关南北史资料的便利，便借助他父亲所修的“旧本”，经十六年的努力，写出了纪传体的《南史》和《北史》。这两部著作从国家一统的思想出发，承认地不分南北，其历史发展都是祖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反映了魏晋以来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弃曲去讳，直书其争，纠正了不少旧史的失实之处；“鸠聚遗逸”，增补“异闻”，丰富了南北史的内容；叙事简洁，受到后世多数学者的好评。而《北史》详《南史》略，“于征祥诙谐小事无所不载”，删削亦有不甚恰当之处，则是其不足之处。但总的看来，《南史》和《北史》仍不失为我国史学中的佳作。

李延寿与敬播都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担任写作工作。因为家中已有(南北史的)旧稿,想继承、实现先人的愿望,补出齐、梁、陈、周、隋五代部分所未写的部分,所以在编辑工作之余,昼夜抄录这些材料。到贞观五年,因家中有丧事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从官到蜀,把所得材料进行编辑。但所缺材料尚多,没有能够完成。贞观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的时候,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用李延寿修《晋书》,因此再次得以勘校研究有关宋、齐、魏三代还没有得到的材料。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当时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奉皇上命令修《隋书》的十志,又获得了皇上的批准召李延寿参加撰录,李延寿因此得到了广泛阅读的机会。当时五代史还没有公开,李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中素来贫穷,又无能力雇人书写。魏、齐、周、隋、宋、齐、梁、陈诸正史,都是李延寿自己抄写的,其中本纪是依司马迁的体裁,把它们连缀起来。又在这八部正史之外,参考了一千余卷杂史,将原来正史中没有的记载,都编入书中。对它们烦冗的地方,就删削掉。南北史从开始到修成,共用了十六年。从刘宋开始,共八代,分为《北史》、《南史》二书,合计一百八十卷。其中《南史》先写完,呈送给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承蒙他从头到尾读完,并将其中的错误作了改正,允许我上奏皇上。接着又以《北史》求教,他也为我作了详细更正。将二书向各宰相讨教后,就向皇上上了表。表文说:

臣延寿说:臣下我听说设置史官,由来已久,执简记言,必须借助直笔。所以《典》、《谟》记载叙述的,唐

尧、虞舜的风范尤其突出；《诰》、《誓》所陈述的，殷代、周代的伟绩特别显著。有了鲁国的《春秋》，鹿门之会给臧孙留下了借鉴；晋国的史书《乘》没有隐讳，赵桃园杀君赵盾受到了讥讽。大约圣哲的君王治理国家，交通贤人树立榜样，惩罚告诫的方法，都是由史书中引出的意义。到了秦朝大量焚烧书籍，周代的典籍都湮灭。后来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五帝三代都完全写入了本纪中，不同的事情归记于不同的体例记载，纲目都很清晰。从此以后，这段都被后人作为效法的对象。虽然左史写史，每一时代都不乏其人，然而微隐委婉所传的，只有班固和范曄得到称赞。其次有陈寿写的《三国志》，也被称为名家所作。这些著作都被前代修史的人所重视，不必在这里再评论赞扬了。

到了紫气南浮，黄旗东徙，五代更替，大约有三百年。元熙年以前，就总归于晋朝，著述这段历史的士人，虽多达数家，大约地讨论一下，没有听说其中有完美的。我大唐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给了他英明灵气，对此事哀恻冲襟，经多方体察，深深地为这些史书的芜秽而嗟叹，于是决心删削而完成新著，此作既悬之于日月星辰，就成为了流传不朽的著作了。但是，北朝自元魏以后，南朝从刘宋以后，朝代迭变，当时的风气喜欢诋毁前朝，每个朝代都有史书，人多好事，从篇目上看，史书不少，但各人都陈述自己的见闻，同异甚多。而一些小说短书，易被湮灭散落，其中的脱文或者残落之处，找不到地方去校勘。一则是因为王道颓丧，朝廷与市场不

断变换，资料日失其真，怎么判断它的真假？二则是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的高尚事迹，通达之士的重要的教导，因此就不能听到了，这是令人伤叹的。三则败坏风俗的巨蠹，犯有如夏桀一样滔天罪恶的人，不记载下来加以贬责，用什么人作为样板来进行鼓励和引导人们呢？

臣下我的生命虽然轻贱但多有幸运，有幸侍奉千岁，从贞观以来，屡次忝入史局，不度量自己的愚蠢鄙陋，私自修撰了前代史。起自北魏登国元年，到隋朝义宁二年止，共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又兼写了东魏天平元年，到北齐隆化二年，共四十四年的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称为《北史》；又起南朝宋永初元年，到陈祯明三年，共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称为《南史》。总共八代，合为二书，计一百八十卷，用以模拟司马迁的《史记》。以上八代之中，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书，是贞观年间奉皇上之命撰写的，因为所写的十志没上奏，这些书都未公开。但这些书及志，从开始到末尾都是臣下我所写的。臣下我本来就一直追慕古事，又完全得到了研寻闻见的条件，便私自抄录，共用了十六年，所涉猎的书，有千多卷。连缀改定，只靠一人之手，所以拖的时间很长，到现在才完成。我只是搜集遗书逸事，用来增加不同的见闻，分朝代进行编辑，把它们统编在一部书中；删除冗长的地方，保留它们的精华。假如原文妥贴，就不修改加以采用，不敢以我的愚顿，自发管见。虽然此书粗疏朴野，大惭于先哲，但

在搜寻材料方面也有所得，我私下认为还是详尽的。其中的《南史》删改修订已是定稿，《北史》修改校对仅初步完成。南北史既然是私人修撰的，所以不敢沉默，又没有上奏过皇上，也不敢流传。臣下我轻率地陈述，伏地颤抖等待皇上的裁决。臣就恭敬地说以上的话。

(赖长扬 译)

【原文】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至五年，以内忧去职。服阙，从官蜀中，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所阙，未得及终。十五年，任东宫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阳公令狐德棻又启延寿修《晋书》，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复准赖召延寿撰录，因此遍得技寻。时五代史既未出，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家素贫罄，又不办雇人书写。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又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奏闻。次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因遍谘宰相，乃上表。表曰：

臣延寿言：臣闻史官之立，其来已旧，执简记言，必资良直。是以《典》、《谟》载述，唐、虞之风尤著；

《诰》、《誓》斯陈，殷、周之烈弥显。鲁书有作，鹿门贻鉴于臧孙；晋《乘》无隐，桃园取讥于赵孟。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逮秦书既燹，周籍俱湮。子长创制，五三毕纪，条流且异，纲目咸张。自斯以后，皆所取则。虽左史笔削，无乏于时，微婉所传，唯称班、范。次有陈寿《国志》，亦曰名家。并已见重前修，无俟扬榷。

洎紫气南浮，黄旗东徙，时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则总归诸晋，著述之士，家数虽多，泛而商略，未闻尽善。太宗文皇帝神资睿圣，天纵英灵，爰动冲襟用纡玄览，深嗟芜秽，大存刊勒，既悬诸日星，方传不朽。然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开桀恶，书法不纪，孰为劝奖？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

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掇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见。虽则疏野，远惭先哲，于披求所得，窃谓详尽。其《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初了。既撰自私门，不敢寝嘿，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谨言。

房玄龄传

——《旧唐书》卷六六

【说明】房玄龄（579-648），名乔（一说名玄龄、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东北）人，隋朝末年任隰城尉。唐军入关中，他前往谒见李世民，被任用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他在秦府十余年，是李世民的主要谋士。后来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取得帝位。贞观元年（627），房玄龄任中书令，成为宰相。四年（630）又任尚书左仆射，总揽朝政。房玄龄精通吏治，在任宰相期间，审定法令时能注意宽大，量才用人时能不论贵贱，适应了唐初要求安定和急需人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房玄龄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一起被后人合称为“房杜”，被看作是唐初的两位良相。

房乔，字玄龄，是齐州临淄县人。曾祖父房翼，是后魏的镇远将军、宋安郡太守，承袭壮武伯爵位。祖父房熊，字子，初任官为州主簿。父亲房彦谦，喜好读书，涉猎《五经》，任隋朝泾阳县令，《隋书》有传。

房玄龄幼时聪明，博览经史，工于草书隶书，善写文章，

曾跟随父亲到京城去。当时天下安宁，大家都认为隋朝的国运会很长久，房玄龄避开左右随从对父亲说：“隋朝皇帝本无功德，只会迷惑黎民百姓，不为后代作长远打算。他混淆嫡亲和庶出，让他们互相争夺，皇太子与诸王，又竞相奢侈，早晚会引起互相残杀，靠他们是不足以保全家国的。现在天下虽然清平，但其灭亡却指日可待。”房彦谦听后很吃惊，从而对他另眼相看。房玄龄十八岁时，本州举荐他应进士考，及第后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一向被认为有知人之明，见到房玄龄后深加赞叹，对裴矩说：“我见过的人多了，还从未见到像这位郎君那样的人。他将来必成大器，但恨我看不到他功成名就，位高凌云了。”父亲久病，历百余日，房玄龄尽心侍奉药物膳食，一直没有脱衣睡觉。父亲去世后，五天不吃不喝。后来房玄龄被任命为隰城县县尉。

到唐高祖举义旗入关内，太宗向渭北拓地时，房玄龄驱马前往军营谒见。温彦博又加以推荐。太宗一见房玄龄，就如同旧相识一般，署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已遇知己，就竭尽全力，知无不为。每当讨平寇贼时，众人都竞相寻求珍玩，唯独房玄龄先去网罗人才，送到太宗幕府。遇有猛将谋臣，他就暗中与他们交结，使他们能各尽死力。

不久隐太子李建成见太宗功德比他更盛，转而产生猜忌。太宗曾到隐太子住所吃饭，中毒而归。幕府中人十分震惊，但又无计可施。房玄龄因此对长孙无忌说：“现在怨仇已成，祸乱将发，天下人心恐慌，各怀异志。灾变一作，大乱必起。不但能祸及幕府，还怕会倾覆国家。在此关头，怎能不再三深

思呢！我有条愚计：不如遵从周公诛杀兄弟的故事，就能对外抚宁天下，对内安定宗族社稷，来尽一份孝养的礼节。古人曾经说过：‘治理国家的人不能顾及小节’，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这比家国沦亡、身败名裂不是要好得多吗？”长孙无忌说：“我也早有这种打算，一直没敢披露出来。您现在所说的，与我的想法深深相合。”长孙无忌于是入见太宗献策。太宗召来房玄龄对他说：“危险的征兆，已现出迹象，应该怎么办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家遭逢患难，古今没什么不同，不是英明的圣人，不能平定它。大王功盖天地，符合君临臣民的预兆，自有神助，不靠人谋。”因此与幕府属官杜如晦同心尽力。仍然随同幕府升迁为秦王府记室，封爵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官文学馆学士。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经常掌管文书。每当撰写奏章时，他驻马路边、一挥而就，行文简洁道理充分，不打任何草稿。高祖曾对待臣们说：“此人深知事理，完全可以委任。每当他为我儿向我陈述事情，都能理会我心，使千里之外，与我儿就像对面谈话一样。”隐太子看到房玄龄、杜如晦被太宗信任，十分厌恶，在高祖面前进谗言，于是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被贬斥。

隐太子将要变乱，太宗命令长孙无忌召来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服装，悄悄带他们入府阁议事。到太宗入东宫成为皇太子，提拔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代替萧瑀任中书令。太宗论功行赏以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房玄龄进爵邢国公，赐予实有封户一千三百户。太宗因此对诸位功臣说：“朕奖励你们的功勋、给你们划定封邑，恐怕不能全都恰

当。现在允许你们各自发表意见。”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进言说：“高祖刚举义旗，臣就率先领兵赶到。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吏功居第一，臣有些不服。”太宗说：“义旗初举，人人有心追随。叔父虽然率兵前来，但不曾身经战阵。山东没有平时，叔父受命出征，窦建德南侵，叔父全军覆灭。到刘黑闥叛乱，叔父才随军破敌。现在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运筹帷幄、安定国家的功劳。所以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征战的功劳，但他指挥谋划、助人成事，因此能功居第一。叔父是皇家至亲，对你的确没什么可以吝惜，但朕又切不可因此私情，让你与功臣接受同等的赏赐。”起初，将军丘师利等都居功自傲，甚至有时挽袖指天、以手画地，陈说怨愤。等见到李神通理屈后，他们自己互相议论说：“陛下赏赐极为公正，不徇私情，我辈怎能妄加陈述呢？”

贞观三年，任命房玄龄为太子太师。他坚辞不肯接受，改任代理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替长孙无忌任尚书左仆射，改封爵为魏国公，并监修国史。房玄龄既已总管百官事务，就虔诚恭谨、日夜操劳，不让一事处理不当。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有长处那样高兴。他精通吏事，注意文辞，审定法令，意在宽平。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以自己的长处来衡量别人，随才录用，不拘贵贱，当时人称为良相。有时因事被皇上谴责，他就连日在朝堂上叩头请罪，恐惧不安，似无地自容一般。贞观九年，房玄龄监护高祖陵庙制度，因功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房玄龄和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一起被授予世袭刺史。房玄龄带原官任宋州刺史，改封爵为梁国公。这件事结果没有施行。

贞观十三年，加房玄龄官为太子太师。房玄龄再三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下诏书回报说：“选用贤能的根本，在于无私；侍奉君上的道义，贵在当仁不让。列圣所以能弘扬风化，贤臣所以能协力同心。公忠贞庄重、诚信贤明，为我草创霸业，助成帝道。执掌尚书省，使百政通和；辅佐皇太子，实众望所归。但是公忘记了那些大事，拘于这点小节，虽然恭敬完成教谕事务、却要辞去宰相职位，这难道就是所说的辅佐朕共同安定天下吗？”房玄龄于是带本官就任太子太师。当时皇太子要行拜师礼，已备好仪仗等待。房玄龄深加谦退，不敢进见，于是回家去了。有见识的人都推崇他的谦让精神。房玄龄认为自己居宰相位十五年，女儿是韩王妃子，儿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实在是极为显贵，于是频繁上表，请求辞去职位。太宗下诏宽慰，但并不批准。十六年，又与高士廉等人一起撰成《文思博要》，赏赐丰厚。拜官司空，仍然总掌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上表辞让，太宗派遣使节对他说：“过去留侯张良让位、窦融辞去富贵，都是自己惧怕功名太盛，知道进能够退，善察时势，及时止步的，所以前代人加以赞美。公也想追随往日贤哲，实在应当嘉奖。然而国家任用公已久，一旦突然失去良相，就如同失去双手一般。公若体力不衰，就不要再辞让了。”房玄龄于是停止了推让。

贞观十七年，房玄龄和司徒长孙无忌等人的像被画在凌烟阁上。赞词说：“才能兼有辞藻、思虑化入神机，为官励精守节、奉上尽忠忘身。”高宗在东宫时，加房玄龄太子太傅，仍然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后因《高祖、太宗实录》撰成，太宗颁下诏书褒奖，赐织物一千五百段。同年，房玄龄

因继母去世，停职修丧礼，太宗特命赐以昭陵葬地。不久，恢复本职。太宗亲自出征辽东，命房玄龄在京城留守，手写诏书说：“公担当着萧何那样的职任，朕就没有西顾之忧了。”军事器械、战士衣粮，都委任房玄龄去处置发送。房玄龄屡次上言说敌人不可轻视，应当特别谨慎。后与中书侍郎褚遂良接受诏命重新撰写《晋书》，于是上奏选取了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工修撰。以臧荣绪所写《晋书》为主，参考诸家，很是博洽详尽。然而修史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喜好采用怪异荒谬琐碎的故事，来显示见多识广；加上所写的评论追求艳丽、不求真实，因此多被学者讥讽。唯独李淳风精通星象历法，善于著述写作，他写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值得阅读。太宗亲自撰写了晋宣帝、晋武帝二帝以及陆机、王羲之共四篇纪传的评论，于是题名叫“御撰”。到二十年，《晋书》撰成，共一百三十卷，诏命藏在秘书省，按级别对撰写人赐物加官。

房玄龄曾因微小过失被罢官回家。黄门侍郎褚遂良上奏说：“君主是‘首脑’，臣下称‘四肢’。有龙跃就有云起，不待呼啸而会集，假如时机到来，千年不敌一瞬。陛下过去是布衣百姓时，心怀拯救民众的大志，手提轻剑，仗义而起。平定诸处寇乱，全靠陛下神功，而文章谋略，颇得辅佐帮助。作为臣下，玄龄出力最勤。往昔吕望扶助周武王，伊尹辅佐成汤，萧何竭力于关中，王导尽心于江南。比起这些人，玄龄可以匹敌。况且武德初年出仕做官的人，都是忠诚勤恳、恭

敬孝顺，众人同归陛下。但隐太子与海陵王，凭仗凶乱，求用惑主，使人人不能自安，处境像鸡蛋相叠一样危险，形势如身被倒挂一样危急，命在旦夕、身系寸阴，而玄龄之心，始终不变。到武德九年之际，事情紧迫，玄龄虽被贬斥赶走，未能参与谋略，但仍然穿着道士衣服入府，与文德皇后一起同心相助。他在臣节方面，确实没有什么亏欠。到贞观初年，万物更新，玄龄选择能吏侍奉君主，为舆论所推奖，虽有无上功勋，却忠心依旧。只要不是犯有不赦的罪状，为百官同愤，就不能因一点小错误就轻易地舍弃他不用。陛下如果确实怜悯玄龄年迈，或瞧不起他的行为，自可像古时那样，谕示大臣让他退休。但这事实行起来要靠自己，并要遵循往日故事，按退休礼仪去作，就不会使陛下失去好的声誉。现在玄龄这样有数十年功勋的旧臣，因一件小事而被贬斥，朝廷外面议论纷纷，都认为不应该。天子重用大臣则人尽其力，轻易舍弃则人心不安。臣以庸碌之才，愧列陛下左右，斗胆冒犯天威，略为陈述管见。”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前往翠微宫，在那里授司农卿李纬官为民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京城。恰好有人从京城来，太宗问他：“玄龄听说李纬官拜尚书后怎么样？”那人回答：“玄龄只说李纬胡子好，没说其他话。”太宗立刻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房玄龄就是这样，是当时的一种尺度。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前往玉华宫。当时房玄龄旧病发作，诏书命令他在京养病并仍然总管留守事务。到他病重时，太宗让他来玉华宫。房玄龄坐抬轿入殿，一直被抬到太宗座前才下轿。太宗面对他垂泪，房玄龄也感动得哽咽不止。诏书

派遣名医救治，并命尚食局每日供应宫廷膳食。如果房玄龄稍有好转，太宗便喜形于色；如果听说病情加重，脸色便变得悲伤。房玄龄因此对诸子说：“我自从病情危急后，受恩泽反而更深；如果辜负了圣明君主，则死有余辜。当今天下清明，各件事务都很得当，唯独东征高丽不止，将为国患。主上含怒下了决心，臣下不敢冒犯圣威。我若知而不言，就会含恨入地。”于是上表劝谏说：

臣听说兵革最怕不收敛，武功贵在停止干戈。当今圣明教化，无所不至。上古未能臣服的地方，陛下都能让其称臣；未能制服的地方，陛下都能制服。详察古今，为中国患害最大的，首推突厥。而陛下却能运用神机妙策，不下殿堂就使突厥大、小可汗相继归降，分掌禁卫军，执戟行列间。其后薛延陀嚣张，旋即被讨平灭亡；铁勒倾慕礼义，请朝廷设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安宁，没有兵尘硝烟。至于说高昌在流沙拥兵叛乱，吐谷浑在积石山归属不定，发一军进讨，全都荡平。高丽躲过诛灭，已经历代，朝廷未能征讨。陛下谴责它为逆作乱、杀害君主虐待民众，于是亲自统领六军，前往辽东、碣石问罪，不到一月，就攻拔了辽东，前后抓获俘虏达数十万，分配在诸州，无处不满。雪前代的旧耻，埋亡卒的枯骨。若比较功德，则高出前王万倍。这些都是圣主心中所自知的，卑臣怎么敢详尽述说。

况且陛下仁风流布、遍于四海，孝德显扬、与天同高。看到夷狄将要灭亡，便能算出还需几年；授与将帅指挥谋略，就能决胜万里之外。屈指计日、等待驿传，观

日算时、迎候捷报，符合应验如同神灵，算计谋划没有遗漏。在行伍之中提拔将领、于凡人之内选取士人。远方的使节，一见不忘，小臣的名字，不曾再问。射箭能洞穿七层铠甲，拉弓能力贯百八十斤。加上留心经典、注意文章，用笔超过钟繇、张芝，文辞不让班固、司马迁。文锋已振，管罄自然和诣，翰墨轻飞，花卉竞相开放。以仁慈安抚百姓，以礼义待遇群臣。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网。逆耳之言必定听从，肤受之诉从此绝迹。有喜好生命的德性，在江湖焚烧障塞，释放鱼类；有厌恶杀戮的仁慈，在屠场止息刀斧，拯救畜牲。鸭鹤承接了稻粱的赐与，犬马蒙受着帷盖的恩惠。下车吮吸李思摩的箭疮，登堂哭临魏征的灵柩。为战亡的士卒哭泣，哀痛震动六军；背填路用的薪柴，精诚感动天地。重视民众的生命，特别关心狱囚。臣见识昏愤，怎能论尽圣功的深远，奢谈天德的高大呢！陛下兼有众多长处，各种优点无不具备，卑臣深深地为陛下珍惜它，爱重它。

《周易》说：“知道进而不知道退，知道存而不知道亡，知道得而不知道失。”又说：“知道进退存亡，又不迷失正道的，只有圣人啊！”由此说来，进里有退的含义，存中有亡的机宜，得内有失的道理，老臣为陛下珍惜的原因，指的就是这些。老子说：“知足就不会招致侮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陛下的威名功德，也可以说是“足”了；拓广疆域，也可以“止”了。那个高丽，是边境的夷族残类，不足以用仁义对待，也不可以常礼责备。古来将他们象鱼鳖一样喂养，应该宽恕他们。

如果一定要灭绝他们的种类，恐怕野兽落入穷困境地就要搏斗。而且陛下每次决杀一个死囚，都必定命令法官再三覆审多次上奏，并要吃素食、停音乐。这就是因为人命关天，感动了圣上仁慈之心的缘故。何况现在这些兵士，没有一点罪过，却无故被驱赶到战阵之间，处于刀锋剑刃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魂魄没有归处；让他们的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灵车而掩泣，抱枯骨而伤心，这就足以使阴阳发生变动，和气受到伤害，实在是天下的冤痛啊。况且“兵”是凶器，“战”是危事，不得已才使用。如果高丽违反臣节，陛下诛讨它是可以的；如果高丽侵扰百姓，陛下灭亡它是可以的；如果高丽会成为中国的长久之患，陛下除掉它是可以的。有其中的一条，虽然日杀万人，也不值得渐愧。现在没有这三条，却烦扰中国，内为前朝旧王雪耻，外替新罗报仇，难道不是所保存的少、所丢失的多吗？

希望陛下遵循皇朝祖先老子“止足”的告诫，来保全万代巍峨的名声。发布甘沛的恩泽，颁下宽大的诏书；顺应阳春散布雨露，允许高丽悔过自新；焚烧凌波的般只，停罢应募的民众，自然华夏与夷族都庆贺依赖，远方肃宁近处安定。臣是老病的三公，早晚就要入地，所遗憾的只是臣竟然没有尘埃露水，来增高山岳增广海洋。谨此竭尽残魂余息，预先代行报恩的忠诚。倘若承蒙录用这些哀鸣，臣就是死而不朽了。

太宗见到表奏，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此人病危成这样，还为国家担忧。”

房玄龄后来病情加剧。太宗于是凿通苑墙开设新门，屡次派遣宫中使臣问候。太宗又亲自前往，握手告别，悲伤不止。皇太子也前去与他诀别。当天授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房遗则为中散大夫，让他生前看到儿子的显贵。不久病故，时年七十岁。太宗命三天不上朝，下册书赠房玄龄官太尉、并州都督，赐谥号为“文昭”，朝廷供丧葬器物，陪葬在昭陵。房玄龄常告诫诸子不能骄奢、沉溺于声色，一定不可以用地位门第去欺凌他人，因此汇集了古今圣贤的家诫格言，写在屏风上，令诸子各取一扇，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能留意这些家诫，就足以保身成名。”又说：“汉朝的袁家历代保有忠节，是我所崇尚的，你们也应该效法。”高宗继位，诏命房玄龄在太宗庙庭中祔祭。

长子遗直承袭了房玄龄的爵位，永徽初年官为礼部尚书、汴州刺史。次子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官拜驸马都尉，后至太府卿、散骑常侍。起初，太宗宠爱高阳公主，因此遗爱受到特别恩泽，与太宗其他女婿的礼仪官秩有极大差异。高阳公主既已骄横放纵，阴谋贬黜遗直而夺取他的封爵，就在永徽年中诬告遗直对她无礼。高宗命令长孙无忌审讯此事，因而获得了公主与遗爱的谋反实情。遗爱被诛死，公主赐自杀，其他诸子流放到岭南。遗直因父亲有功而特予宽宥，革官为平民，停罢了房玄龄在太宗庙庭的祔祭。（黄正建 译）

【原文】

房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曾祖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熊，字子，绎褐州主簿。父彦谦，好学，通涉《五经》，隋涇阳令，《隋书》有传。

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尝从其父至京师。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国祚方永，玄龄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而异之。年十八，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见之深相嗟挹，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父病绵历十旬，玄龄尽心药膳，未尝解衣交睫。父终，酌饮不入口者五日。后补隰城尉。

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既而隐太子见太宗勋德尤盛，转生猜间。太宗尝至隐太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无忌曰：“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无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龄谓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对曰：“国家患难，今古何殊。自非睿圣钦明，不能安辑。大王功盖天地，事钟压纽。神赞所在，匪藉人谋。”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

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隐太子以玄龄、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

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太宗因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许自言。”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闥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初，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神通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可妄诉？”

三年，拜太子少师，固让不受，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

宽平。不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顙请罪，悚惧蹶蹶，若无所容。九年，护高祖山陵制度，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一年，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事竟不行。

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频表请解仆射，诏报曰：“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弘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龄遂以本官就职。时皇太子将行拜礼，备仪以待之，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遂归于家。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又与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锡赉甚优。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谓之曰：“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玄龄遂止。

十七年，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赞曰：“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监修国史如故。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未几，起复本官。太宗

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军戎器械，战士粮廩，并委令处分发遣。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谨慎。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唯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诏藏于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

玄龄尝因微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为元首，臣号股肱，龙跃云兴，不啸而集，苟有时来，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怀拯溺，手提轻剑，仗义而起。平诸寇乱，皆自神功；文经之助，颇由辅翼。为臣之勤，玄龄为最。昔吕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汤；萧何关中，王导江外，方之于斯，可以为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众所同归。而前宫、海陵，凭凶恃乱，干时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悬之急，命视一刻，身糜寸景。玄龄之心，终始无变。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及贞观之始，万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论推与，而勋庸无比，委质惟旧。自非罪状无赦，缙绅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轻示遐弃。陛下必矜玄龄齿发，薄其所为，古者有讽谕大臣遣其致仕，自可

在后，式遵前事，退之以礼，不失善声。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则人尽其力，轻去就则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预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见。”

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其为当时准的如此。

二十二年，驾幸玉华宫。时玄龄旧疾发，诏令卧总留台。及渐笃，追赴宫所，乘担輿入殿，将至御座乃下。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敕遣名医救疗，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减损，太宗即喜见颜色；如闻增剧，便为改容凄怆。玄龄因谓诸子曰：“吾自度危笃，而恩泽转深，若孤负圣君，则死有余责。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主上含怒意决，臣下莫敢犯颜；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遂抗表谏曰：

臣闻兵恶不戢，武贵止戈。当今圣化所覃，无远不届。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详观今古，为中国患者，无如突厥。遂能坐运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卫，执戟行间。其后延陀鸱张，寻就夷灭，铁勒慕义，请置州县，沙漠以北，万里无尘。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吐浑首鼠于积石，偏师薄伐，俱从平荡。高丽历代逋诛，莫能讨击。陛下责其逆乱，弑主虐人，亲总六军，问罪辽、碣。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

诸州，无处不满。雪往代之宿耻，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较德，万倍前王。此圣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

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孝德彰于配天。睹夷狄之将亡，则指期数岁；授将帅之节度，则决机万里。屈指而候驿，视景而望书，符应若神，算无遗策。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远夷单使，一见不忘；小臣之名，未尝再问。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辞穷班、马。文锋既振，则管罄自谐；轻翰暂飞，则花葩竞发。抚万姓以慈，遇群臣以礼。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网。逆耳之谏必听，肤受之诉斯绝。好生之德，焚障塞于江湖；恶杀之仁，息鼓刀于屠肆。鳧鹤荷稻粱之惠，犬马蒙帷盖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疮，登堂临魏征之枢。哭战亡之卒，则哀动六军；负填道之薪，则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尽心于庶狱。臣心识昏愤，岂足论圣功之深远，谈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众美而有之，靡不备具，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爱之宝之。

《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谓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且陛下每决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

食、停音乐者，盖以人命所重，感动圣慈也。况今兵士之徒，无一罪戾，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灵车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变动阴阳，感伤和气，实天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今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王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

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发沛然之恩，降宽大之诏，顺阳春以布泽，许高丽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无尘露，微增海岳。谨罄残魂余息，预代结草之诚。倘蒙录此哀鸣，即臣死且不朽。

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惓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后疾增剧，遂凿苑墙开门，累遣中使候问。上又亲临，握手叙别，悲不自胜。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遗则中散大夫，使及目前见其通显。寻薨，年七十。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

尚，汝宜师之。”高宗嗣位，诏配享太宗庙庭。

子遗直嗣，永徽初为礼部尚书、汴州刺史。次子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鞠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岭表。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停玄龄配享。

李百药传

——《旧唐书》卷七二

【说明】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唐初史学家。其父李德林，在北齐时曾参加修撰国史，成纪、传共二十七篇。入隋，又奉文帝命续修，总计撰成北齐史三十八篇。贞观元年（627），李百药受诏修定《五礼》并承继父业完成《北齐书》。贞观三年，唐太宗又下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李百药仍分撰北齐史，于贞观十年告成，这就是《北齐书》。该书五十卷，即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载了北魏分裂前到北齐灭亡共七十余年间的史事。此书到北宋时已残缺不全。现行五十卷本，是后人据李延寿《北史》辑补的，其中仅十七卷是其旧本。从今本看，李百药叙事简洁，注重政治事件的记述，企求从历史中取得鉴诫的思想表现很突出；但其叙述内容除政治外，经济、文化方面涉及太少，这不仅使一代之史大为偏持，而且由于注意力的片面，就必然使其鉴诫的作用大打折扣了。

李百药，字重规，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儿子。李百药儿童时期体弱多病，他的祖母赵氏就给

他起名百药。七岁的时候就懂得如何写文章。他父亲的好友北齐中书舍人陆义、马元熙曾经去李德林家参加宴会，有一个读徐陵文章的人，说徐陵文章中有“已经收了成周的庄稼，将割琅邪之稻”的话，不知讲的什么事。李百药当时正站在旁边，就上前对那人说：“《传》中称‘邠人收割稻谷’。杜预注解‘邠国在琅邪的开阳’。”陆义等人对李百药的学问记忆感到十分吃惊。

开皇初年，李百药被授职为东宫通事舍人，又迁升太子舍人，兼任东宫学士。有人嫉妒他的才华并陷害他，李百药便借口身体有病，辞去了官职。开皇十九年，朝廷补任他的官职，让他进入仁寿宫，并让他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都很欣赏他的才华，上奏朝廷之后，授任他为礼部员外郎，皇太子杨勇又叫他去做东宫学士。文帝命令李百药修订《五礼》，制定条律法规，撰写《阴阳书》。礼部中的奏议文表，多是百药撰写的。当时炀帝还是扬州的总管，曾召李百药去他那里。百药以病推辞，没有去。炀帝为此非常愤怒。他即位之后，贬罚百药外出任桂州司马。后来，炀帝改州为郡，李百药因此被罢免官职，回归家乡。

大业五年，李百药被授任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他前往会稽戍守，不久又被任命为建安郡丞。在赴任的路上，走到乌程时，恰逢江都出现农民起义，又被沈法兴抓住，让他暂时代理府掾事务。不久沈法兴被李子通打败，李子通便任命李百药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杜伏威攻打、击败李子通后，又任命李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有人在杜伏威面前诽谤他，杜伏威便将他囚禁起来。李百药著《省躬赋》来表述自

己的真实情感，杜伏威也了解到他并没有罪过，于是恢复了他的职位。

杜伏威占据江南之后，唐高祖派去使者，想招抚他。百药劝说伏威投降朝廷，伏威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命令行台仆射辅公祐与百药留守，自己前去京师献降。但杜伏威渡过长江到达历阳时，又在怀疑中后悔自己的行动，便想杀掉百药。于是让他饮用石灰酒，百药用后大泻一场，反而除掉了所有的病根。杜伏威得知百药未死，便给辅公祐写信，命令他杀死百药。幸有伏威养子王雄诞的保护，百药获免一死。后来辅公祐又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在高祖面前谗言，说百药起初说服杜伏降唐，后又与辅公威一起谋反。高祖听后大怒。平定公伏之后，朝廷发现了杜伏威给辅公祐让他杀死李百药的书信，高祖的气愤才稍有缓解，于是发配百药流放泾州。

太宗即位后重视百药的才学名声，贞观元年，召回百药，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赐给他安平县男的爵位。李百药接受诏令，修定《五礼》及条律法规，撰述《齐书》。二年，李百药任职礼部侍郎。朝廷为封建诸侯事召集大臣议论，百药奏上《封建论》，说：

我听说经理国家，保护民众，是统治天下者都要做的事情；尊敬主人，保卫皇上地位的安定，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思索、创立治理安定国家的法规，以光大长治久安帝业的人，万古以来都是如此，他们千思百虑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然而，天命、历数有长短盈缺之别，国家有治理衰乱之异，纵览古今载籍，它们都已论述得很

详细了。这些论述都认为，西周的统治时间超过了命定的气数，而秦国的存在则没有达到命定的时间，因此保存或失去统治的关键，在于国家本身治理得如何。周王朝借鉴夏、殷治理长久的经验，遵遁黄帝、唐尧制定的各项统治措施，建立相互网结、坚如盘石的城堡，从根本上深入、强固统治，虽然后来王朝的纲纪逐渐被废弃，但枝、干仍能相互扶持，这才没有出现背叛周王朝的事情，使得周朝的帝业没有断绝。秦朝则违背了学习古制的教导，抛弃先王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原则，建都华山之下，依仗它的险要，废除诸侯，建置郡守，自己的子弟没有半点封邑，百姓很少有与皇上一起治理国家的忧患，所以当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秦朝帝业便完全崩溃了。

我以为自古以来的皇上帝王，能够成为君主，统治天下，没有不受命上天，在帝王的名录上留下高贵的名声的，他们在缔造自己的王朝的时候，恰遇出现新王的气运，在深切忧虑的时候，刚好碰到上天要开启圣明的时期。因此即使曹操只有被宦官收养的资历，刘邦曾为低贱的小吏，但他们都能成为君王，这并不只是由于他们有觊觎帝位之心，从气数上来推算，天意也是不让他们失去这个机会的。至于被暂时释放的囚徒不能按时归狱，国家的人才也已枯竭，虽然帝尧的光辉照耀四海，大舜的才能使七政都整治得有条有理，（但尧、舜也只能退位），并不只是由于尧、舜一心要退让帝位，而是因为即使尧、舜坚守不放，帝位也是不能稳固的。以尧、舜的

德行，尚不能让他们的后人也繁荣昌盛。由此可以明白，统治时间的长短，必定是由天命所给的机遇决定的，而国政的兴盛和衰败，则是与人事相关联的。兴隆的周代卜算出自己将有三十代君主，统治时间有七百年，虽然后来王道沦落到了极点，但文王、武王的统治规模仍然存在，这不说明帝位的存在及其朝限，早已被高高在上、冥冥不可见的天安排好了吗？至于昭王南征死于楚河之畔，平王东迁，以避西戎的进逼，周王朝的祖业微弱如线，连京城周围的土地都守护不住，这就说明王朝败落的原因，是受累于封建制。残暴的秦朝，其帝位之运短促，执政于帝王系统中的闰位之时，气数恰逢一百零六，因此得以掌握政权。但受命而兴的秦王，德行有异于大禹、商汤；后来继位的二世，才能又不能与太启、诘诵相比。假设李斯、王绾之辈能够开拓四方的疆域，将间、子婴之徒有千乘之兵能够完全发动，又怎能逆转汉高祖勃兴帝业的趋势，抵抗真龙天子的命运！

然而帝业的得失成败，各代有各代的原因。而谈论政事的作者，大多都墨守通常的解释，没有不在感情上不区分今古的差别，在论述事理时看不到古今社会风气的逐渐变异的，都希望在百代帝王之后，仍施行三代的法规。在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在君王的土地和各诸侯国之间，到处都是分封的采邑。这样就是把结绳时代的教化推行在虞、夏之朝，用尧舜时期的象刑治理刘汉及曹魏的末世，纲纪的紊乱，便断然可知了。刻舟求剑，不见得可行；胶柱成文，实在是太糊涂了。这些人

徒劳地知道楚庄王问鼎、晋文公请用天子葬礼，表现出周王对于霸王之师的恐惧；以不加修饰的马和车为天子出丧，反映出王室已失去了分封诸侯国的援助。却不明白赵高弑二世于望夷宫，并不比后羿、寒浞制造的灾乱更厉害；高贵乡公曹髦遭到的杀身之殃，与申侯、缙侯反叛周幽王的残暴行为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由于皇上昏乱，自己改变了自己安全的处境，并不是由于郡守、宰相、公侯，能够造成废除帝王的局面的。况且数代之后，王室将逐渐衰微，与各个分封国的不和也要出现，互相之间将成为仇敌。每家都有不同的习俗，每国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于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每个分封国彼此划清疆界，战争频频爆发。狐骀的那场战争，鲁国战败，鲁国的女子全都身披丧服；秦国攻打晋国的军队，在崤陵大败，没有一支车轮能够返回秦国。这里仅略举一、二，类似的事情不可胜数。陆士衡方才谦卑地说：“把国家政权交给继位的君王，让那些危险有势力的世族占据大城镇，这样天下就会平安，可以以治待乱。”这种说法多么荒谬啊！况且朝廷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于是廉明清正的官员，接受皇上共治国家的期望，被分到各郡，管辖地方州郡的治理。这些人才哪一代没有。这种治理方式，使大地上时而出现祥瑞，上天也不吝惜他的宝藏，民众将官吏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政治同神仙治理的一样清明。曹元首方才神情自得地说，“能够同别人共享欢乐的，别人也必然会分担他的忧愁；能够与别人共享平安的，别人也一定会拯救他的危机。”难道允许把统

治地方的权力委托给诸侯国的侯伯，就能同安共危；交给州郡牧宰，他们同皇上的安乐就不相同了吗？这些话说得多么荒诞啊！

各封君列国，凭借和依赖他们的门第，遗忘了先祖创业的艰难，忽视了与生俱来的尊崇和高贵，他们没有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的。虽然他们有众多的离宫别馆，摩顶凌云，但这些或是劳役人力殆尽而建造起来的，或是为了召集其它诸侯共同寻欢作乐的。陈灵公与仪行父违背礼教，拿夏征舒取乐；卫宣公则父子同娶一个女人，最终酿出诛杀寿、朔二公子的惨祸。（就是这样的诸侯），天子还说他们是自己思虑治理国家的大事，难道果真如此吗？而内朝或外朝的众多官吏，都由朝廷统一选拔，从文人百姓中提升出来，任以官职，用清明的官员去评定他们，每年他们都在各自的职位上辛勤劳作，朝廷还要对他们的工作成效进行考评，以宣明升迁或是黜降。这些官员渴望升迁的心很急切，他们砥砺自己的品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的官员甚至不把俸禄用作自己家用，也不让妻室儿女到自己的官舍中。身居颁布条令的显贵地位，但吃饭也不生火；掌握着军队大权，所穿的衣服也仅是打着补丁的麻衣。南阳太守，穿着破旧的衣服；莱芜县长范冉，家中清贫，久不做饭，以至甑中积聚了大量的尘土。只说各地官员为了私利，索取财物，这与事实是多么的不符啊！总而言之，郡县官员的职位不是世袭，所以选用贤能的路途很宽广；老百姓没有终身不变的主人，所以依附之情便不牢固。这些是愚笨者和聪慧

者都能分辩的道理，怎么能够迷惑人呢！至如诸侯国灭国弑君，扰乱纲常秩序，（这些事在春秋时期大量出现），二百年间很少有安定的岁月。宋国、邾国及其它东夷小国都想成为霸王，于是就杀人来祭祀土地神；鲁国的政局不稳固，于是就常常等待各卿大夫的会盟。纵使西汉哀帝、平帝之际，东汉桓帝、灵帝之时，地方官吏残暴，也必定不会到达这个地步。掌握政治的原则，可以一言以蔽之。

下臣俯伏思量，陛下您掌握政权，统治天下，顺应时运，开启圣明，救亿万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荡涤灾祸隐患于寰宇之内。开创大业，传位后代，祭享天地以立德，发布命令，施行政措，探知万物的精深细微之后才作出结论。我暗自揣度皇上的心意，是怀念往古的制度，将恢复人臣五等的旧制，分封王国，以诸侯为依靠的对象。下臣以为，汉、魏以来，因封国建侯而造成的流弊还没有除尽，尧舜的时代已成过去，在道义上追求完全公正的风尚已发生变革。况且两晋政权并没有完全控制天下，国土分裂；后魏乘机占据中原，于是中国境内华夷杂处。如果重新分割关、河，建立相互阻隔的诸侯国，那么习文者便会又热衷于学习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全都怀有挥舞干戈，发动战争的欲望，天下之人全是狡诈、阴险之辈，浇薄浮华的风气将更为昌盛。隋承运而有国家，但在开皇时期，却凭借外戚的势力。文帝指挥豪杰群英，使用的是有雄材大略、却又心存猜忌的权术；他坐等时运的转移，并非是我朝以武力平定天下

的功绩。隋统治的时间已经经过了二个皇帝，百姓却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恩德。到了隋炀帝时期，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各种英雄豪杰，几乎一个都没有出现。虽然上天赋予他神武之能，削平寇虐，但他频繁出兵，使战士和平民都得不到安宁。

自从陛下仰承顺应您圣贤的父亲的事业，继承受任统治大权，您全部心思都用来思虑如何把国家治理到最好的状态，综理借鉴前代帝王的经验教训。虽然我在官府中没有什么名气，但从您的言谈举止中，我体察到您的功德。我在这里略陈梗概，它实在不过是您所有作为一点皮毛而已。您敬爱父母，恭恭敬敬，虽忙碌辛勤却并不厌倦，这是大舜一样的孝心。您访问安抚宫内小臣，亲尝御膳，这是文王一样的美德。每有御史上交的疑难案件，尚书关于案件诉讼的奏折，无论大小，都要亲自审察，冤枉的和正直的都要给以平反昭雪，废除断趾之法，更易大辟之刑，将恻隐仁义之心，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大禹怜悯罪人的慈悲胸怀。您认真对待直言的进谏，并虚心接受，不嫌弃地位低微和言谈木讷的人，不遗弃山村野夫的各种意见，这是帝尧的求谏方式。您弘奖名教，劝励学徒，已经提拔考取明经的儒生为高级官员，还将升迁学识渊博的儒士为政府卿相，这种劝诱士人上进的方式，是圣人的作为。大臣们认为宫中闷热潮湿，陛下睡觉和吃饭可能会感到不舒适，便请求迁徙奉侍皇上的地方，另选地方营造一个小阁楼。可是您爱惜百姓们创造的财富，最终抑制了忠顺大臣们提出的

建议，不顾天气酷热或寒冷的影响，安然地居住在简陋的房子中。去年出现天灾，农作物欠收，普天之下受饥挨饿，死丧祸乱纷纷出现，仓廩空虚。陛下深切地关心、怜惜民众，勤于施惠、抚恤他们，于是天下竟然没有一人流离失所，更不要说食用藜藿之类的野菜了。陛下为此事撤去了乐队用以悬挂钟鼓的木架，言谈哀伤，容颜凄凉，体貌消瘦。公旦为各族语言的辗转翻译而高兴，大禹为能在所到之处即兴作文而自负。陛下每当周边四夷诚心归附，万里之外的少数民族归心圣德时，必然退而深思反省，专心致志地思虑，唯恐错误地征役中原百姓，平定远方民族。您不愿践踏自己的万古英名，只为保存当前的胜利成果。您内心为国事非常忧虑、辛劳，从不出外游幸，每日早晨上朝，主持政务，接受奏折没有疲倦的时候。您的智慧所及，遍于万物，仁义道德，能够拯救天下。罢朝之后，又留下一些名臣，共同讨论为政得失，彼此肝胆相照，但所谈论者只有政事，决无其它话题。太阳刚刚偏西，就命令才学之士，赐给他们清静悠闲的时间，自由自在地谈论典籍，还有文章诗词、并间有哲学玄言，直到深夜，忘记了疲劳，顾不上睡觉。陛下这四个方面的道义，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君王的作为，实在是自有生民以来，唯一的一个人啊。弘扬风化，昭示四方，的确可在一月之间，遍示天下。然而淳朴与文明之间，尚有阻隔，浮华诡诈的风气还没有改变，这些是由于积习已久，难以很快得以改变。请等待社会风气能够去浮华，崇质朴，以质代文，以刑措之教统一行为，登

临泰山，完成封禅之礼，然后再决定统治疆土的制度，讨论以何种形式赐赏功臣，也不算晚嘛。《易》中说：“天地日月有盈有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消失，何况人呢？”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太宗最后听从了李百药的建议。

贞观四年，李百药被任命为太子右庶子。五年，李百药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在弘教殿为太子讲课，当时太子对书籍还很感兴趣，然而在清静地学习之后，却玩耍过度，百药于是作《赞道赋》来劝说太子，此文很长，此处不载。太宗看到赋后，派使者对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到你献上的赋，详细叙述古代以来有关太子的事情来告诫太子，所说非常正确重要。朕选你来辅弼太子，正是为了这样，这是我举荐你的重任所在，你有好的开端，也一定要让它延续到最后。”于是赐给李百药彩色织物五百段。然而太子却终于因不醒悟而被废。贞观十年，李百药因撰成《齐史》，加官为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不久又任宗正卿。贞观十一年，李百药因撰成《五礼》及律令，爵位晋升为子。数年之后，李百药以年老坚决请求退休，得到朝廷允许。太宗曾创作《帝京篇》，命令百药也一起作一篇，皇上叹服李百药文章的工丽，亲笔写诏说：“爱卿身体虽已老，但才华是多么地实力雄厚，年龄已大，但立意是多么地新颖！”贞观二十二年，李百药去世，时年八十四，谥号为“康”。

李百药作为名臣之子，才行都继承了父亲，四海之内的名流人士，没有不承认他的地位而敬仰他的。文思华美，含蓄深刻，尤其擅长写五言诗，即使是砍柴的少年，放牛的儿

郎，都能吟颂他的诗句。他又喜好引进后生，不知厌倦地提拔扶持他们。他把得到的俸禄，大多分散给需用钱的亲戚邻里。他纯厚的天性也超过了一般人，起初为父母的丧事回到老家时，他光着脚，穿着单衣，行走数千里地，为父母守丧数年，容貌因之毁悴，受到当时人们的称颂。后来告老还乡，他怡然自得，游乐于山水之间，携友作文，以酒论赏，以此舒展他平生的心愿。李百药有文集三十卷，儿子李安期。

(任宝菊 译)

【原文】

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为童儿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义、马元熙尝造德林宴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邠人藉稻’。杜预《注》云‘邠国在琅邪开阳。’”义等大惊异之。

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寿宫，令袭父爵。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诏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台内奏议文表，多百药所撰。时炀帝出镇扬州，尝召之，百药辞疾不赴，炀帝大怒，及即位，出为桂州司马。其后，罢州置郡，因解职还乡里。

大业五年，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属江都难作，复为沈法兴所得，署为掾。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国子

祭酒。及杜伏威攻灭子通，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或有谮谮者，伏威囚之，百药著《省躬赋》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无罪，乃令复职。

伏威既据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抚，百药劝伏威入朝，伏威从之，遣其行台仆射辅公祐与百药留守，遂诣京师。及渡江至历阳，狐疑中悔，将害百药，乃饮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药不死，乃作书与公祐令杀百药，赖伏威养子王雄诞保护获免。公祐反，又授百药吏部侍郎。有谮百药于高祖，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又与辅公祐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祐平，得伏威与公祐令杀百药书，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泾州。

太宗重其才名，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二年，除礼部侍郎。朝廷议将封建诸侯，百药上《封建论》曰：

臣闻经国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阐治定之规，以弘长世之业者，万古不易，百虑同归。然命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乱之异，遐观载籍，论之详矣。咸云周过其数，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于郡国。周氏以监夏、殷之长久，遵黄、唐之并建，维城磐石，深根固本，虽王纲弛废，枝干相持，故使逆节不生，宗祀不绝。秦氏背师古之训，弃先王之道，践华恃险，罢侯置守，子弟无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忧，故一夫号泽，七庙隳祀。

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缔构遇兴王之运，殷忧属启圣之期。虽魏武携养

之资，汉高徒役之贱，非止意有覬觐，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狱讼不归，菁华已竭，虽帝尧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齐七政，非止情存揖让，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勋、重华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后。是知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运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存，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东迁避逼，禋祀如线，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渐，有累于封建焉。暴秦运短闰余，数钟百六。受命之主，德异禹、汤；继世之君，才非启、诵。借使李斯、王绾之辈盛开四履，将闾、子婴之徒俱启千乘，岂能逆帝子之勃兴，抗龙颜之基命者也！

然则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是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既紊，断可知焉。楔舟求剑，未见其可；胶柱成文，弥所多惑。徒知问鼎请隧，有惧霸王之师，白马素车，无复藩篱之援。不悟望夷之衅，未甚羿，浞之灾；高贵之殃，宁异申、缙之酷。乃钦明昏乱，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兴废。且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家殊俗，国异政，强凌弱，众暴寡，疆场彼此，干戈日寻。狐骀之役，女子尽髻；崤陵之师，只轮不返。斯盖略举一隅，其余不可胜数。陆士衡方规规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乱。”何斯言之谬也！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循吏之

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无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爱宝，民称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区区然称：“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岂容委以侯伯，则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则殊其忧乐。何斯言之妄也！

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陈灵则君臣悖礼，共侮征舒；卫宣则父子聚鹿，终诛寿、朔。乃云为己思治，岂若是乎？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门，妻子不之官舍。颁条之贵，食不举火，剖符之重，衣唯补葛。南阳太守，敝布裹身；莱芜县长，凝尘生甑。专云为利图物，何其爽欤！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灭国弑君，乱常干纪，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鲁道有荡，每等衣裳之会。纵使西汉哀、平之际，东洛桓、灵之时，下吏淫暴，必不至此。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

伏惟陛下握纪御天，膺期启圣，救亿兆之焚溺，扫氛褰于寰区。创业垂统，配二仪以立德；发号施令，妙万物而为言。独照宸衷，永怀前古，将复五等而修旧制，建万国以亲诸侯。窃以汉、魏以还，余风之弊未尽；勋、华既往，至公之道斯革。况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

乘时，华夷杂处。重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开皇在运，因藉外家。驱御群英，任雄猜之数；坐移时运，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纪，民不见德。及大业嗣文，世道交丧，一时人物，扫地将尽。虽天纵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劳止未康。

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核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爰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献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真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蕘，帝尧之求谏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竟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廩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流离道路，犹且食啗藜藿。乐撤簋虞言必凄动，貌成癯脊。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

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弘兹风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间，弥纶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诡未移，此由习之永久，难以卒变。请待断斫雕成朴，以质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礼云毕，然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未为晚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美哉斯言也。

太宗竟从其议。

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与左庶子于志宁、中允孔颖达、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时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燕之后，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辞多不载。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彩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废。十年，以撰《齐史》成，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赐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礼》及律令成，进爵为子。后数岁，以年老固请致仕，许之。太宗尝制《帝京篇》，命百药并作，上叹其工，手诏曰：“卿何以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谥曰康。

百药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性好引进后生，提奖不倦。所得俸禄，多散之亲党。又至性过人，初

侍父母丧还乡，徒跣单衣，行数千里，服阕数年，容貌毁悴，为当时所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筑山，文酒谈赏，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颜师古传

——《旧唐书》卷七三

【说明】颜师古（581—645），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初著名经学家、史学家。以博学著称，著述颇丰。他对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为《汉书》作了详细的注释。魏晋之后，《汉书》受到士人的广泛赞誉，研读者甚众，作注者达二十余家。颜师古博采众家，经审慎考订，著成了《汉书注》。其注重点在于扫除阅读《汉书》的文字上的障碍，诸如音读、字义、名物、典故、地理注释多详，同时对《汉书》自身记载的诸矛盾处亦时有所揭，对前人注释之误则各有辩驳。颜师古广揽兼收，又不轻信盲从，宁可存疑，决不武断，使其注成为阅读《汉书》时不能不借助的工具，受到后人的重视，简称其注为“《汉书》颜注”。

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是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孙子，他们的祖先原本居住在琅邪，后世代在江左任官；到颜之推时，他才北上到北周、北齐做官，北齐灭亡后，他开始在中关定居。颜师古的父亲叫颜思鲁，以学术成就闻名于世，武德初年是秦王李世民居府中的记室参军。颜师古从年少

时起，就被传授家学，他博览群书，尤其精训诂学，善于写文章。隋仁寿中，师古受尚书左丞李纲推荐，被授以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看到师古年龄不大，身体又虚弱，便对他说：“安养是一个非常难管理的县，你凭什么去安定治理它？”师古回答到：“割鸡焉用牛刀。”杨素对他的回答感到非常惊奇。师古上任之后，果然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以此闻名。当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他和师古的高祖有旧情，又喜欢师古的才干，所以每当他做出文章后，都让师古评论好坏优劣，与师古相处得非常亲密。不久，师古因事被免职，回到长安，有十年之久的时间没有得到朝廷调用。家中贫穷，他只好以教书为业。

到高祖李渊领导的义军兴起之后，师古到长春宫拜见高祖，被任命为朝散大夫。随后他跟随高祖平定了京城，又被任命为敦煌公府文学，转任起居舍人，又提升为中书舍人，专门管理和负责起草机密文件。当时军中和朝廷里事情很多，所有的重要政策、制度、命令等文件，都由颜师古写成。师古通达各项政务，册文、章奏都做得非常准确，当时的官员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太宗即位之后，提拔师古为中书侍郎，又封琅邪县男。后师古因服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一年多后，师古又因事被免官。

太宗看到现存的古代书籍离成书的年代已很久远了，书中文字多有讹谬，就命令颜师古到秘书省考辨、裁定《五经》文字。师古对《五经》文字有许多校订，全部勘正完后，上奏给朝廷。太宗又指令其它儒生对师古的校订重新加以详细的评议。当时许多儒生对讹谬传习已久，于是都纷纷指责

颜师古的审定本。师古于是大量征引晋、宋以来的古今各种版本，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所有依据，都详细明白，大大出乎那些儒生们的意料之外，使得他们都纷纷叹服师古的审定本。于是太宗让师古兼任通直郎、散骑常侍，并向全国颁布师古审定的《五经》，命令学习者使用研读。

贞观七年，任命师古为秘书少监，专门负责刊正书籍的事。所有的奇书难字，及众人都感到迷惑的字句，师古都根据疑问，一一剖析，详细地讲述文意的来由。这时官府中多推荐年轻有学问的学者做为雠校，颜师古（在举荐官员时），压抑庶族学者，提拔门弟高贵者的子弟，即使这些人是富商大贾也举荐他们。于是社会舆论指责他收受贿赂，朝廷因此（惩罚他）令他出京城为郴州刺史。师古还没有上路，太宗怜惜他的才华，对他说：“卿的学识，确实是值得称道的，但你提拔关系亲近者为官员，就不被舆论认可。如今遭到这样的调任，是你自己招来的。朕思量你从前在职位的作用，不忍心让你出去得那么远，你应该深深地以此事为戒，劝勉自己。”于是又恢复了他秘书少监的官职。师古很自信自己的学识、才华，从年轻时就很早担负了各种任务，后被朝廷一直任用，但当犯有过失而遭黜谴后，他的情绪便非常沮丧。从此后闭门守静，杜绝宾客，在林园亭谢之间放任自己的情趣，戴着麻布帽子，穿着游玩的衣服，但他对古迹及古器的求访，依然兴趣盎然，没有中止。不久，他又奉诏与博士等人撰写《五礼》，贞观十一年，《五礼》完成，朝廷将他的爵升进为子。当时李承乾还是太子，他命令师古注释班固的《汉书》。师古的

《汉书》注释详细明白，深受学者的重视。承乾上表交此书给皇上，太宗诏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给师古织物二百段、良马一匹。

贞观十五年，太宗发下诏令，将祭祀泰山，让负责此事的有关部门及公卿官吏、诸儒博士制定个详细的礼仪规则。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他们参阅多种礼书，考定封禅的礼制，为此议论者竞相提出不同意见。师古上奏说：“我在十一年春撰定《封禅仪注书》，当时经过诸儒学士们的审查，认为适中。”太宗于是诏令公卿官吏决定是否可用，他们大都依从师古的说法，然而祭泰山一事最终没有举行。师古不久又被提升为秘书监、弘文馆学士。贞观十九年，师古跟随皇帝车队巡查东方，中途病故，时年六十五岁，谥号为“戴”。颜师古有文集六十卷。他注解的《汉书》及《急就章》，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永徽三年，颜师古的儿子颜扬庭为符玺郎，扬庭上表奏上师古撰述的《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将此书交付秘书阁，并因此赐赏扬庭帛五十匹。

（任宝菊 译）

【原文】

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历事周、齐，齐灭，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干理闻。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高祖有

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椅摭利病，甚亲昵之。寻坐事免归长安，十年不得调，家贫，以教授为业。

及起义，师古至长春宫谒见，授朝散大夫。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太宗践祚，擢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以母忧去职。服阕，复为中书侍郎。岁余，坐事免。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讎校，师古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诚励也。”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师古既负其才，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及频有罪谴，意甚丧沮。自是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己。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十一年，《礼》成，进爵为子。时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

十五年，太宗下诏，将有事于泰山，所司与公卿并诸儒

博士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师古奏曰：“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是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然而事竟不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年，从驾东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令狐德棻传

——《旧唐书》卷七三

【说明】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著名史学家。他是唐初大修前朝史的发动者。武德四年（621），他上书唐高祖，建议撰修或重修前朝史，深得高祖的赞赏。次年，李渊即颁布了《命萧瑀等人修六代史诏》，任命了各代史书修撰的负责人，后因种种原因而中辍。但这一年令狐德棻购募天下图书的建议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使唐朝廷在数年之后，群书毕备，为此后史学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除承命撰写《周书》外，还负责诸史撰写的组织协调工作。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修晋史，参加写作的有十八人，令狐德棻又是“为首”者，重大举措都由他决定。另外，他还为李延寿审阅过《南史》和《北史》。他自己署名的史书却只有一部《周书》。此书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无表、志，实际上记述了从东、西魏分裂（534）到杨坚代周（581）总计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又将后梁史纳入其中，弥补了前史中西魏、后梁史事的疏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当时南北历史的发展大势。全书“繁简得

宜，文笔亦极简劲”，受到多数人的肯定。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朝鸿胪少卿令狐熙的儿子。他的家族原先居住在敦煌，世代为河西的大族。令狐德棻博涉文史，很早就有名气。大业末年，被任命为药城长，他认为社会纷乱，就没有接受官职。到了义军大旗树起，淮安王神通占据太平宫，自称总管，任用德棻为记室参军。高祖李渊入关后，任用德棻为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德棻转任起居舍人，甚受高祖亲密相待。五年，升为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编撰《艺文类聚》。高祖曾问德棻：“过去，男人戴冠、妇人头上挽髻都竞相攀比高大，这是为什么？”德棻回答道：“在人的身体上，冠是最上面的饰物，所以古人以冠比喻君上。后到东晋末期，君弱臣强，江左的士女们，都上衣小而裙子大。到了宋武帝刘裕摆正君臣秩序之后，君主应有的尊严得到恢复，于是衣服的样式，不久也就改变了。我说的这些，都是近代的事情，可做过去人们对帽子、发式要求的证明。”高祖认为他说得对。

当时正值丧乱之后，图书散逸、丢失很多，令狐德棻上奏请求向民间收购遗存的书籍，对献书的人多给钱帛，并在官府中增加楷书手，让他们工整地抄写。几年之间，众多的图书大略齐备了。德棻曾从容不迫地对高祖说：“我看到近代以来，各朝多无正史，梁、陈及齐，还有文籍存留。至于北周、隋，遭受大业年间的战乱，国家文件、图书有很多遗缺。当今离周、隋不远，许多事从前朝人那里还可访问到，著史尚有凭据，若再过十几年，周、隋的事情恐怕就会湮没无闻

了。陛下您既接受禅让于隋，又承受北周的政权，大唐国家有二祖的基业，都是在北周营造的。如果北周及隋的历史不能在文章、史书中保存下来，如何给现在提供借鉴！以我的愚见，请求同时修撰周、隋历史。”高祖同意了他的奏请，下诏书说：

掌管典籍的记载言论，史官记载事情，他们考察评论朝政得失，探究穷尽变通之理，以此裁量言、事为不同意义的类别，用来惩恶劝善，使后人多识前古往事，并给后人留下借鉴。伏羲以后，接着就是周、秦，两汉又继承他们的余绪，以后又是三国受命于天，一直到晋、宋，这期间记载史事的文籍都很完备。自从有魏向南迁徙，抓住时机建立帝国，周、隋禅让帝位，历代相承，梁氏建立邦国，跨据淮海，齐国拥有政权，陈国营建皇室宗亲，他们没有不自称正统，延续他们每年的祭祀的。他们的徽号各不相同，但都制定自己的礼义制度。至于先祖发迹，开拓基业，承接前代的终结，将换代的事祀告上天，其间有高超的谋略，贤明的政治，众多的名臣奇士，他们创立学说，建立显赫的功绩，每一代都不缺少这样的人。然而这些业绩并没有被编入书籍，纪传体史也都缺少，时间已过去得不短了，有关过去的民谣风俗已在流传中发生错讹，前代的余烈遗风，瞬息之间就会被埋没。朕掌握政权，统治天下，一心想爱护人民，让社会长治久安，不久前才制定了典章制度，要让它们成为永久遵循的法则。我看到那些将要湮灭埋没的业绩，心中深感怜惜和悲伤，因此考虑要把过去的业绩編集起来，这件

事必须依赖能够直笔的良史。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待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你们这些人务必仔细研核史料，广博地采集过去的各种史实，这次编撰的目的是要成为后世著史的典范，必须书法无隐。

萧瑀等接受诏命，经过数年之年，这件事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因而作罢。

贞观三年，太宗重新下令修撰前朝诸史，于是命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魏征还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为修撰各部前代史的总监。大家认为，魏史既然有魏收、魏澹二家史书，就已经很详备了，于是就不再重新修撰。德棻又上奏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帮助自己修撰周史，德棻还全面掌管梁、陈、齐、隋诸史在体例、内容分类方面的统一、协调工作。武德已来开创修撰史书端绪的，是从德棻开始的。贞观六年，令狐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为彭阳男。贞观十年，他因为修撰周史被赏赐绢四百匹。十一年，德棻修成《新礼》，爵晋升为子。又因为他撰成《氏族志》，朝廷赏赐他帛二百匹。十五年，德棻转任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谋反失败之后，按照惯例，令狐德棻被免去官职。贞观十八年，他又被朝廷起用，任命为雅州刺史，后又因公事

被免职。不久，皇上诏令要重新修撰《晋书》，房玄龄奏请德棻参予修撰，当时同修者共有十八人，他们一起推举德棻为主管人，《晋书》的编撰体例大都是由德棻最后裁决的。《晋书》撰成之后，德棻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令狐德棻又受诏撰定律令，又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大唐国史及《五代史志》。不久又迁为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

当时高宗刚刚继位，留心于为政之道，他曾在中华殿召集宰臣及弘文馆学士，问道：“什么是王道、霸道？它们的出现谁先谁后？”德棻回答道：“王道以德治天下，霸道用刑治天下。自三王以上，都施行王道；只有秦始皇任用霸术；汉朝是将王道、霸道交杂使用；魏晋以下，王道和霸道全都没有了。如想施行它们，王道是最好的，但施行起来也最为艰难。”高宗问道：“现在施行的各项政治措施，以哪一项为最关键的？”德棻回答道：“古代人治理国家，以清静人心，精简事务，为基本方针。当今天下没有需要戒备、忧虑的事情，五谷丰登，国家收取赋敛很轻，征役也很少，这种做法合乎古人治国的大道。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莫过于此了。”高宗说：“为政之道没有比无为而治更高的策略了。”接着他又问道：“大禹、商汤为何能创建国家？夏桀、商纣为何亡国？”德棻回答道：“《传》上讲：‘大禹、商汤把罪过归于自己，因此他们的国家能够生气勃发地建立起来；夏桀、商纣把罪过全归于别人，因此他们的国家在瞬息之间就灭亡了。’夏桀、商纣被妹喜、妲己迷惑，诛杀进谏的忠臣，制造炮烙这种严酷的刑法，这就是他们灭亡的原由。”高宗非常高兴，集会散后，

高宗向前来中华殿议事的大臣们各赐以缙彩。

永徽四年，德棻被提升为国子祭酒，因为修撰贞观十三年以后的实录有功，受赐织物四百段，并让他兼任崇贤馆学士。不久，德棻又修撰《高宗实录》三十卷，于是他的爵位又被晋升为公。龙朔二年，他上表请求退休，得到皇上允许，给他加衔为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德棻在家中去世，时年八十四。谥号为“宪”。德棻晚年，在著述方面尤其勤奋，国家凡有修撰的事，他都全部参予了。（任宝菊 译）

【原文】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先居敦煌，代为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业末为药城长，以世乱不就职。及义旗建，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自称总管，以德棻为记室参军。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高祖问德棻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佐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

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同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

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曰：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牒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待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征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璡、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迁礼

部侍郎，兼修国史，赐爵彭阳男。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礼》成，进爵为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赐帛二百匹。十五年，转太子右庶子，承乾败，随例除名，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书成，除秘书少监。

永徽元年，又受诏撰定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

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德棻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为要？”德棻对曰：“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道，莫过于此。”高宗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又问曰：“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德棻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于妹喜、妲己，诛戮谏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悦，既罢，各赐以缙彩。

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

姚思廉传

——《旧唐书》卷七三

【说明】姚思廉（557-637），字简之，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唐初著名史学家。其父姚察（553-606），任陈朝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曾修《梁书》。入隋后，又曾奉命撰梁、陈之史，未竟而卒。姚思廉继承父业，从隋大业初年即开始续补，经二十余年，至唐贞观三年（629），才受唐太宗诏独撰梁、陈二史，于贞观十年奏上。《梁书》共五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志，记述了萧齐末年和萧梁皇朝五十余年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状况。其中姚察所著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陈书》三十六卷，包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三十余年的历史。其中姚思廉的新作居多。二书相较《梁书》比《陈书》无论内容和文字上都稍胜一筹。在材料上，二书多因承旧史，留下了不少曲笔之处。但梁、陈二代事迹，别的书籍记载极少，所以这两部书至今仍被看成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著作。

姚思廉，字简之，是雍州万年人。他的父亲姚察，是陈

朝的吏部尚书，后入隋历任太子内舍人、秘书丞、北绛公，他兼有儒学、史学两个领域的学识，在陈、隋两代都很受器重。陈朝灭亡之后，姚察从吴兴迁往关中地区。思廉年少时跟随父亲学习汉史，能够完全把他父学的学识传递下去，他勤学寡欲，从来没有谈到有关家人、产业之类的事情。姚思廉仕陈时为扬州主簿，入隋之后为汉王府参军，后因服父丧退職。起初，姚察在陈时曾修撰梁、陈二朝的史书，但未能最后完成，他临终嘱托思廉一定要继承并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父亲去世后接着又是母亲去世，姚思廉便在父母墓旁修筑一个茅庐，由于哀伤过度，他消瘦得比别人都厉害。服丧期满后，补官河间郡司法书佐。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言，皇上诏令允许他续成《梁史》、《陈史》。炀帝又让起居舍人崔祖濬修撰《区宇图志》。

思廉后来成为代王杨侑的侍读，不久遭遇义师平定京城。代王的府僚纷纷逃奔，只有思廉陪伴代王，不离其侧。唐兵将登上王府殿堂，思廉厉声说道：“唐公高举正义之旗，本意在于安定王室，卿等不应该对代王无礼。”大家都很敬服他的话，于是在殿堂的台阶下排列兵士。高祖听到这件事后，认为思廉很正直，允许他扶侍杨侑到顺阳阁下，他流着眼泪，行过拜礼，才离开了杨侑。看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叹地说：“姚思廉是忠烈之士啊。仁义之人才有勇气，就是说的姚思廉吧！”

高祖即皇位之后，授姚思廉为秦王府文学。后太宗征伐徐圆朗，思廉当时在洛阳，太宗曾从容地谈到隋朝灭亡的事情，（对姚思廉的行为）感慨万分说：“姚思廉不惧怕兵刃，敢于宣明大节，即使在古代寻找这样的人，忠义的程度又能比

他多多少呢!”于是遣使赠送给他三百段礼物,并有书信,说:“思念您的知节晓义的气度,故赠给您这些东西。”不久就引荐姚思廉为文学馆学士。太宗进入礼部之后,姚思廉被授官太子洗马。

贞观初年,姚思廉升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他的画像被收入《十八学士图》,朝廷又让文学褚亮为他作赞,歌颂道:“志向艰难,用心勤奋,所记君言,都为实录。临危不惧,殉身为义,古代余风,可励民俗。”贞观三年,姚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共同修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用谢灵等诸家梁史续写完父亲未成之稿,并对陈朝史事进行推究、删改、补充傅縡、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然为二书的总论作了最后裁定,但其编次、删改,都是思廉的功劳,朝廷于是赐给思廉彩绢五百段,并加官为通直散骑常侍。

姚思廉因是秦王府旧僚,深受太宗礼遇,政有得失,就经常地遣使秘密上奏,他对政事评论直言不隐。太宗将游览九成宫,思廉谏道:“到离宫游玩,是秦皇、汉武做的事,本不是尧、舜、禹、汤这些圣明君主所做的事。”言词非常恳切。太宗解释说:“朕有气疾,炎热天气中便会加剧,并非我性情本身爱好游赏。”于是赐思廉帛五十匹。贞观九年,授思廉散骑常侍,赐爵为丰城县男。贞观十一年思廉去世,太宗深感悲伤和惋惜,以至停止朝事一天,追赠思廉为太常卿,谥号为“康”,并在昭陵一带赐给他墓地。(任宝菊 译)

【原文】

姚思廉字简之,雍州万年人。父察,陈吏部尚书,入隋

历太子内舍人、秘书丞、北绛公，学兼儒史，见重于二代。陈亡，察自吴兴始迁关中。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丁父忧解职。初，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丁继母忧，庐于墓侧，毁瘠加人。服阕，补河间郡司法书佐。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

后为代王侑侍读，会义师克京城，侑府僚奔骇，唯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高祖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谓乎！”

高祖受禅，授秦王文学。后太宗征徐圆朗，思廉时在洛阳，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遗之，书曰：“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寻引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

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写其形像列于《十八学士图》，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志苦精勤，纪言实录。归危殉义，余风励俗。”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灵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傅濬、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赐彩绢五百段，加通直散骑常侍。

思廉以藩邸之旧，深被礼遇，政有得失，常遣密奏之，思

廉亦直言无隐。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因赐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吴兢传

——《旧唐书》卷一〇二

【说明】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代史学家。他从武则天时期起长期担任史职，达四十余年，参加国史的修撰，又私撰了《唐史》、《唐春秋》、梁、齐、周、陈、隋史等史书。惜留传至今的仅一部《贞观政要》。他叙事简核，直书不讳，以“董狐笔法”闻名当世。

吴兢，是汴州浚仪人。他志向坚定，勤奋好学，因而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都非常器重他。等到魏、朱二人做了相辅，便推荐吴兢，说他具有史家才能，能够在皇上的左右承担职务。因此皇上命令吴兢到史馆临时任职，修撰国史。几个月后，任命他为右拾遗内供奉。神龙年间，他升任右补阙。当他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成《则天实录》之后，又转任起居郎。不久又升任水部郎中，但由于母亲去世，便辞职回乡服丧。开元三年，服丧期满，便直言上疏说：“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从停职返乡至今，都没有忘怀修史之事，请皇上准许我完成剩余的任务。”皇上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同以前一样，担任修史工作。不久他兼任修文

馆学士，又先后担任卫尉少卿、右庶子的职务。吴兢任史职近三十年，叙事简明扼要，当时人们都器重、称赞他。但吴兢晚年的著述却过于简略。开元十七年，《国史》还没有修成，吴兢被贬罚出任荆州司马，皇上允许他随身携带未成史稿。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时，向朝廷献上吴兢撰述的《国史》六十五卷。后来，吴兢又先后担任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衔银青光禄大夫，又升为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定初年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又进入朝廷为恒王的老师。

吴兢曾经因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过于冗繁，就另外又编著了《梁史》、《齐史》、《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但这些著述又过于疏略。吴兢晚年，体力衰耗，走路弯腰躬背，但他依然希望能重新担任史官。李林甫认为他太老了，就没再用他。天宝八年，吴兢死于家中，当时有八十多岁。吴兢死后，他的儿子将他撰著的《唐史》八十多卷进献给朝廷。这部书记事有许多错误，不及他在壮年时的著述。吴兢家中藏书很多，他曾自己给这些书做了一个目录，称作《吴氏西斋书目》。（任宝菊 译）

【原文】

吴兢，汴州浚仪人也。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服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数十卷，自停职还家，匪忘纸札，乞终余功。”乃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

少卿、左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国史》未成，十七年，出为荊州司马，制许以史稿自随。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奏取兢所撰《国史》，得六十五卷。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宝初改官名，为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

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衰耗，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

韦述传

——《旧唐书》卷一〇二

【说明】韦述（？～757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史学家。他在玄宗时代担任史职二十余年，在令狐德棻和吴兢草修的基础上，撰成了《国史》一百一十三卷，“事简而记详”，为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提供了丰富而简明的材料。他还撰写了《百家类例》等谱学著作，是个较有成就的谱学家。韦述博识、勤奋，著史坚持直书，受到时人和后代的敬重。

韦述，是司农卿韦弘机的曾孙。父亲叫韦景骏，任房州刺史。韦述小的时候，聪慧繁捷，笃志文学。家中有藏书二千卷，韦述在还是儿童的时候，便记诵、阅览完毕，为此人们感到非常惊异。景龙年间，景骏为肥县县令，韦述跟随父亲到了任上。洺州刺史元行冲，是韦述父亲姑姑的儿子，是当时的大儒，常常随身带着好几车书。韦述到了他的书斋之中，便废寝忘食的看书。元行冲感到奇怪，便与他交谈起来。谈话从经学讲到史学，韦述全都了如指掌，并能深知其中的深刻含义，就像是得到过名师的指点一样。元行冲又用写作

文章来检查他，韦述拿起纸笔便写成了。元行冲非常高兴，理让他与自己同睡一床，说：“这可是我外家的宝贝啊。”韦述后西入潼关，应进士举。当时他还很小，外表看起来很不起眼。负责考试的员外郎宋之问问他：“韦学士你小时候做过什么事啊？”韦述回答说：“我爱好著书。撰有《唐春秋》三十卷，遗憾的是还没有写完。至于我文章写得如何，就恭敬地等待您公正的考试了。”之问说道：“我就是来搜寻高才博学之人的，果然得到了司马迁，班固一样的才子。”韦述在这年考中了进士。

开元五年，韦述担任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接受皇上命令整理编排图书，并得皇上允许同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韦述等二十六人，一起在秘阁中详细编录四部图书。不久马怀素去世，元行冲代理他的职务，五年后完成了这项任务，一共有目录二百卷。韦述喜好谱学，他在秘阁中看到常侍柳冲以前撰写的《姓族系录》二百卷，就在干完自己份内的事之后，抄录这部书，每次到黄昏时才拿着抄本回家。如此经过了一年，终于把这部书全部抄完。这样他对百家姓氏的源流，就知道得更加详细了。于是他根据柳冲《系录》关于唐代的记录，另外写成了《开元谱》二十卷。韦述志向坚定，专心学术，不知疲倦，如此可见一斑。

后来韦述转任右补阙，中书令张说掌管集贤院的事务，他引荐韦述为直学士，升任起居舍人。张说很器重有文采、有学问的人，因此韦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等，经常到他家中。赵冬曦的哥哥冬日，弟弟和璧、

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韦述的弟弟迪、逌、迥、记、巡也是六个人，都应试并考中词学科。张说说：“赵氏、韦氏兄弟，都是当今的优秀人材。”开元十八年，韦述兼掌史官事务，转任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在集贤院任直学士和掌史官事务同从前一样。到了张九龄任中书令，他曾在集贤院中与韦述同职，裴耀卿为侍中，他就是韦述的舅舅，他们互相都很推重，一谈起话来就要谈很长时间。开元二十七年，转任国子司业，停止掌理史事。不久又重新兼任史职，担任集贤院学士。天宝初年，他先后担任左、右庶子，加衔银青光禄大夫。九年之后，兼职为礼仪使。这年又升为尚书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韦述在集贤院有四十年，担任史职有二十年。他非常喜欢读书、写书，手不释卷。国史从令狐德棻开始著述，一直到吴兢，虽然没有间断修撰，但最终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具有统一宗旨、体例的国史。到了韦述担任史官，才开始制定类例，补充遗漏，续写后面的部分，著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加上《史例》一卷。《国史》记载历史，条理简明，记述得却很详细。说明韦述完全具备优秀史家的才能，兰陵萧颖士认为他是谯周、陈寿一类的史家。韦述早年以儒学渊博成为杰出学者，深受当时人们的宗仰。但他却是一位纯厚长者，淡泊于权势利禄。只要是志趣相投，无论出身贵贱，他都以礼相待。韦述家中藏书二万卷，都由他亲自校定文字版本，即使是御府的图书也比不上的他精善。凡属古今朝臣与历代知名人士的画，魏晋以后数百卷草书、隶书的真迹，古碑、古器、药方、制度法令、钱谱、玺谱之类，以及当代名公的书

信、题词，他都全部收藏。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叛贼攻陷两京，玄宗奔逃蜀地，韦述怀抱《国史》躲藏在南山中，但他的全部收藏及家产，却被抢掠、焚毁殆尽。韦述自己也陷于叛贼之手，被授官职。至德二年，大唐收复两京，（由于韦述曾在叛贼军中作官，）三司给他定罪，判他流放渝州。在渝州他被刺史薛舒压制迫害，于是绝食而死。他的外甥萧直是太尉李光弼的判官，广德二年，萧直因为上奏谈论事情符合皇上的心意，便（顺势）上疏为韦述辩护，认为他在苍黄逃奔的时候，还能保存《国史》，使得圣朝伟大的著作，没有遗落散失，以此功补过，应该得到皇上的恩赦和宽恕。皇上于是追赠韦述为右散骑常侍。

有人议论说，自唐开国以来，从氏族的角度看，韦氏这一族人是最兴旺发达的。在孝友方面，韦承庆、韦嗣立是最突出的；通晓音律，则韦万石是最突出的；精通礼仪，则韦叔夏是最突出的；学识渊博，有史学才能的，要以韦述为最突出了。韦述的著述有《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共著书二百余卷，都在世上流行。

（任宝菊 译）

【原文】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景龙中，景骏为肥乡令，述从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行冲大悦，引

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宝也。”举进士，西入关。时述甚少，仪形眇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韦述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迁、固。”是岁登科。

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其笃志忘倦，皆此类也。

转右补阙，中书令张说专集贤院事，引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赵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记、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说曰：“赵、韦昆季，今今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转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学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张九龄为中书令，即集贤之同职，裴耀卿为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语必移晷。二十七年，转国子司业，停知史事。俄而复兼史职，充集贤学士。天宝初，历左右庶子，加银青光禄大夫。九载，兼充礼仪使。其载迁尚书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

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讷周、陈寿之流。述早以儒术进，当代宗仰，而纯厚长者，澹于势利，道之同者，无间贵贱，皆礼接之。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槧，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年，收两京，三司议罪，流于渝州，为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广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朝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所撰《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凡著书二百余卷，皆行于代。